

炎黄春秋

第 **4** 期
2011年

人权六十年：从否定到回归
天津文革中的“二二一”事件
大跃进前后的社会控制
走出秦城的周扬
立陶宛的农业集体化

目 录

求实篇

- 1 人权六十年：从否定到回归 郭道晖
8 “大跃进”前后的社会控制 尹曙生
13 从票证兴废看中国经济 林培山

亲历记

- 16 天津文革中的“二二一”事件 王 辉
21 亲历“《解放日报》事件” 赵元三
26 “打倒阎王，解放小鬼”时的感受 郝怀明
31 我采访了波尔布特 谢文清
32 猜出粉碎“四人帮”之后 陈启森

一家言

- 34 我国高校发展的三个问题 朱九思
39 民主政治建设需要改变思维 蔡 霞
42 评地方政府的公司化倾向 宫希魁

人物志

- 48 走出秦城的周扬 周 密
53 朱瑞与“宁都暴动” 郑建英

争鸣录

- 59 对主粮转基因的忧虑 丛亚平
65 对《四渡赤水评价考》的看法 张幸仔

怀人篇

- 67 谭启龙的饥荒调查 肖 磊
69 追思童大林 林开明
73 冯森龄：那个年代的好记者 戴国强
76 他离科学最高殿堂那么近 萧功秦

往事录

- 77 娄烦土改及纠偏 张贵桃
80 一个右派的“饥饿改造” 吴传斗
82 一个小干部的三起三落 李世华

故纸堆

- 85 董时进致信毛泽东谈土改 董时进

海外事

- 89 立陶宛的农业集体化 蒋华志

编读窗

- 94 读者来信摘登 文 扬 等

顾 问：

杜润生 于光远 李 锐

编 委 会 (以姓氏笔画为序)：

方 实	王俊义	冯 健	冯其庸
卢跃刚	曲润海	何 方	吴 象
吴明瑜	宋木文	张文彬	张岂之
张希清	张荣华	张惠卿	杜 光
杜导正(召集人)	李一鑫	李大同	
李冰封	李宝光	李维民	杨天石
杨奎松	杨继绳(副召集人)	沈志华	
苏双碧	邵燕祥	周瑞金	金冲及
赵德润	保育钧	郭道晖	资中筠
钟沛璋	凌 云	展 江	秦 晖
袁 鹰	袁伟时	高尚全	陶斯亮
钱理群	章诒和	萧蔚彬	彭 迪
韩 钢	董 健	曾彦修	鲁 諝
雷 颐	魏久明		

社 委 会：

杜导正(主任) 吴 思(副主任) 杨继绳
李 晨 徐庆全 胡竞成 张晓鸥

社 长：

杜导正

法定代表人、常务社长、总编辑：

吴 思

副 社 长：杨继绳 李 晨

副 总 编 辑：徐庆全 执行主编：洪振快

社 长 助 理：胡竞成 张晓鸥 杜明明

总 经 理：李 晨

副总经理兼网络总监：张晓鸥

理 事 长：杜导正

副 理 事 长：莊其環 李 琼

理 事：白建钢

秘 书 长：吴 思

副 秘 书 长：杜明明

主管、主办单位：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

本刊常年法律顾问：

张思之(吴奕超律师事务所律师 010-68083211)

步凌云(北京市华一律师事务所 010-85869163)

国外总发行：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

(北京399信箱)

国际标准连续出版刊号：ISSN1003—1170

国外发行代号：1274M

国内总发行：北京报刊发行局

国内统一刊号：CN11—2817/K

国内邮发代号：82—507

订购处：全国各地邮局(所)

印刷：唐山市润丰印务有限公司

社址：北京市西城区月坛南街69号 邮编：100045

本 刊 网 址：http://www.yhcqw.com

本刊电子信箱：yanhcq@sina.com

yanhcq@gmail.com

发行部邮箱：yhcqfxb01@126.com

电话：发行部：010—68532048 68539058

编辑室：010—68534879 68523512

财务室：68525374 办公室：68522852

传 真：010—68532569

广告经营许可证：京西工商广字0296号

出版日期：每月4日 定价：8.00元

人权六十年：从否定到回归

○ 郭道晖

人权，本义是“人该有之”和“人皆有之”的权利，即人人应有的权利。解放后，我国人权事业从人权禁区到人权入宪，走过了60多年艰难曲折的崎岖道路。回顾这一历程，反思其经验教训，对今后人权事业的健康发展，很有必要。

一、1949～1978年人权蒙难的历史

建国前夕由全国政协第一次会议通过的、作为临时宪法的“共同纲领”，是中国人民反独裁争民主争人权的胜利成果。共同纲领反映了在国民党暴政下刚翻身的人民的要求。其中对人权的保障，有几点在中国宪法史上也是少有的。如明文确认了思想自由、新闻自由、通讯自由、迁徙自由和鼓励、扶助私营经济等等。前几项还列入第1章总纲中。但是，建国后，从1949年到1978年，年年都有政治运动，这些政治运动，无例外地都是侵犯人权的运动，而以“反右”、“大跃进”、“文革”为最甚，折磨、残害、饥荒致死的人数以千万计，无辜受难者和被株连者的生命权、财产权、政治自由权、人身自由权、人格权、诉讼权受侵犯和剥夺的程度，可谓触目惊心，亘古少有。

有侵权也就有维权斗争。这期间也有一些党内外志士仁人挺身而出，为捍卫人权而进行坚持不懈的斗争。1957年“反右”前知识界的“大鸣大放”，其中对解放初如“反胡风”、“肃反”等政治运动中严重侵犯人权的行为的批评控诉，就是一次声势浩大的人民维权行动，是人民行使对执政党的监督权和言论自由、批评建议权利的合法斗争，是知识分子为挣脱文化专制主义和教条主义的思想控制的一次公然抗争和思想解放的尝试；是中国人民百多年来追求民主自由与人权的宪政运动的一个高峰和一次挫折。1976年天安门的“四五”运动，也是一次要民主争人权的运动，

“它为后来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奠定了伟大的群众基础。”（见《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此外还有个别志士仁人的抗争。如胡风30万言上书质疑毛泽东否定人性的“五把刀子”；梁漱溟为处于“九地之下”的农民争权利而不屈不挠同毛泽东当庭抗辩；彭德怀为饥饿的农民鼓与呼而以身相殉；林昭、张志新等烈士为坚持真理而献出年轻生命；遇罗克批判“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对联而撰写的《出身论》，振聋发聩，时人称之为上世纪60年代中国的“人权宣言”。即使像老舍、翦伯赞、傅雷等许多人被逼自杀，也是一种曲线的维权斗争——维护人格的尊严，义不受辱。

二、1978～1990年的人权斗争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把执政党的指导思想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变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是一个很大的转变。虽然在主流意识形态上，仍然把人权作为资产阶级的口号加以批判，但在实践上，有的领导人吸取过去的教训，已开始正视清偿历年侵犯人权和公民基本权利的政治债。胡耀邦大刀阔斧推行全国规模的平反冤假错案，受益者数千万人。这是中国历史上空前规模的人权还债的政治运动，对收拾党心民心，起了很大的作用。

鉴于“文革”中知识分子和广大干部遭受人身自由和人格尊严的残酷迫害，主持立法的全国人大法制委员会主任彭真，以其切身的体验，在1979年制定刑法时特别要求单列“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一章，其第一条规定“保护公民的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和其他权利，不受任何人、任何机关非法侵犯。”1982年修改宪法时，

在公民基本权利与义务一章中,确认了许多公民权利和自由,包括以前各次修宪时没有列入的一条:“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禁止用任何方法对公民进行侮辱、诽谤和诬告陷害。”这是新中国在人权保障方面的进步。

这期间,理论界在开展真理标准讨论的思想解放运动中,开始有人试探性地鼓吹人权。如1979年北京大学哲学系美学教授朱光潜率先发表文章《关于人性论、人道主义、人情味和共同美的问题》。1980年华东师范大学文艺学教授钱谷融重新发表自己在1957年受到全国批判的文章《论〈文学是人学〉一文的自我批判》,实质是为人权辩护。再有《中国青年报》开展了“潘晓问题”的大讨论,质疑过去主流意识形态关于人生价值观的片面宣传教育。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汝信,于1980年8月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人道主义就是修正主义吗?——对人道主义的再认识》,提出“人道主义就是主张要把人当做人来看待,人本身就是人的最高目的,人的价值也就在于他自身”。他们当中最突出的是《人民日报》副总编辑王若水和人民出版社总编辑的薛德震,从马克思主义哲学高度论述人,由他们通过人民出版社编辑出版了《人是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一书,一年半之后又出版了另一本书《关于人的学说的哲学探讨》。上世纪80年代初期法学界也开始打破人权禁区,社科院法学所的李步云于1978年12月6日,在《人民日报》发表了《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的文章,这是法学界思想解放的标志性文章之一。1979年10月30日,他的《论我国罪犯的法律地位》也发表在《人民日报》上。文章提出,凡是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的人都是公民,罪犯也是公民,不能诬告陷害,不能刑讯逼供,其配偶要求离婚也应该征求罪犯的意见。这篇文章发表后,引起了一些仍然坚持阶级斗争旧思维的人士、特别是监狱管理干部的抗议。我当时正在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委员会办公室工作,看到了许多来自这些干部的信,质问作者“立场站到哪里去了?!”“罪犯也有权利,我们以后怎么管理?!”

此外,有的法学家还发表了鼓呼司法独立、质疑阶级斗争法学的文章。我也曾撰文批评政法界和法学界倡言以两类矛盾论的政治哲学来指

导法律实务,评析所谓“审判中划分两类矛盾”等错误理论。法学界还展开了关于人治与法治、政策与法律、法的阶级性与共同性、法文化的继承性等问题的大讨论,对澄清长期以来阶级斗争法学观,树立权利本位观、法治观起了启蒙作用。

但也有的法学者,1979年在《北京日报》以“人权是资产阶级口号”的通栏大标题发表批判人权的文章。有的法学者则主要是批判地介绍外国人权发展历史和人权观点,并不承认中国也有人权问题,主张用“公民权利”取代“人权”的概念。

这时期人权辩论的一个高峰和一桩震动全国的事件是,1983年3月7日,在中共中央党校举行的纪念马克思逝世100周年大会上,中宣部前副部长周扬作了《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的报告,其核心思想是谈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他在报告中检讨了1966年之前的“十七年”,在“人道主义与人性问题的研究”上曾经走过的一段弯路,公开承认:“那个时候,人性、人道主义,往往作为批判的对象,而不能作为科学研究和讨论的对象。在一个很长的时间内,我们一直把人道主义一概当做修正主义批判,认为人道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绝对不相容。这种批判有很大片面性,有些甚至是错误的。……‘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四人帮’一伙人把对人性论、人道主义的错误批判,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为他们推行灭绝人性、惨无人道的封建法西斯主义制造舆论根据。过去对人性论、人道主义的错误批判,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带来了严重后果。”

这个报告是建国后几十年来、乃至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第一次对人权和人道主义的全面反思和突破,其中还谈到社会主义也可能异化。他的演讲当场受到热烈欢迎,掌声经久不息。我有幸参加了这个会,亲历其境。

周扬这个报告随即在《人民日报》全文刊载,这本来是对人权禁区的一次试探性的突破,不料竟遭到几位身居要津的理论权威的反,紧接着发表大量文章猛烈批判。其中胡乔木1984年1月3日在中央党校(与周扬作报告的同一地点)发表演说《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后来发表在《红旗》杂志上面,并出版单行本),其中完全否定了将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融合起来的任何

努力,并将有关讨论说成是“根本性质的错误观点,不仅会引起思想混乱,而且会产生消极的政治后果”,“诱发对于社会主义的不信任情绪”。这场突然爆发的争论,随即演化为1983年10月中央全会后开展的“反精神污染”的政治运动。由于党中央主要领导人胡耀邦等及时“叫停”,才没有重复过去“反右”的错误。总共才持续了“28天”,是历次政治运动最短命的。

这期间,中央一些领导人刚从受“文革”迫害的阴影中走出来,从党和国家的前途和自身的权益考量,曾经积极支持批判“两个凡是”和开展真理问题讨论,亦即抛弃晚年毛泽东错误路线的某些方针政策,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主张推行政治体制改革。但可惜的是,他们没有完全摆脱专政思维和对人权思想的顾忌。

三、1991年开始的人权禁区解冻

(一)开始承认“多数人的人权”

邓小平在1985年6月6日同“大陆与台湾”学术研讨会主席团全体成员谈话时,向台湾学者说:“你们对处理这几个人有不同的意见,从人权的观点提出问题。这就要问,什么是人权?首先一条,是多少人的人权?是少数人的人权,还是多数人的人权,全国人民的人权?西方世界的所谓‘人权’和我们讲的人权,本质上是两回事,观点不同。”(邓小平:《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25页。)

他这里首次肯定地提出人权问题,迈出了承认人权的重要一步。对他提出的问题的回答应当是:人权是指所有人、每个人应有的权利。保障人权也往往要强调保护少数人,或虽是多数却是弱势群体的权利。

(二)人权禁区的解冻

这是从应对外国对我国人权状况日益责难的压力下开始的。

1990年11月10日,中宣部理论局召开了一次有关人权问题的小型专家座谈会。我参加了这次会。会上,理论局的负责人传达了政府领导人有关人权问题的一个批示,要求批判外国宣扬的“人权无国界论”。但是,与会的专家学者却发

表了一些不同意见。

我在发言中提出讨论人权问题应当把握的几个原则:一是在人权的性质与评价上,要实事求是,作具体的历史分析,不能笼统说资产阶级人权(包括西方文艺复兴时代和资产阶级革命时代启蒙思想家的人权思想)“都是欺骗”。二是在人权的法律地位上,既要讲人权的国内性,又要讲国际性,要看到存在人权无国界与有国界两种情况,要把承认人权有国际性(国际合作、国际保护)同反对借人权干涉别国内政加以区别对待。即使对待人权的国际干涉,也要具体分析国际法所允许的合法制裁、人道主义干涉同非法干涉的区别。三是在对人权的评价与态度上,既要理直气壮地高举社会主义人权旗帜,又要实事求是地正视我国人权保障制度还有缺陷,有待改善。四是在人权的实现上,既要讲理想,又要讲现实。人权是人人应当享有的应有权利,具理想色彩,又受现实的经济结构和文化发展条件所制约。要通过社会斗争、最终是通过发展生产力来逐步实现。我还提出应贯彻“双百”方针,打破禁区,鼓励对人权理论的学术探讨。(摘自郭道晖:《人权禁区是怎样突破的》,载郭道晖等主编《当代中国法学争鸣实录》,湖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375~381页)

会上其他专家学者也作了类似的发言。

过了3个月,即1991年3月2日,中宣部再次召开人权问题小型座谈会。这次还有一位副部长参加。会上这位副部长传达了党中央领导人有关人权问题的一个批示,其中提到美国肯尼迪人权中心给中国科学院院长周光召的一封信,说信中根据一些道听途说,对我国的人权状况进行攻击,说我国成千上万人的命运受到非人道的对待。也由于我国一些丧失国格的外逃者的渲染,连达赖也成为人权斗士,我们倒成了专制魔王。其实,即使按西方的标准,他们自己也有许多违反人权的现象,必要时应当加以揭露。从理论上讲,人权有它的阶级属性。当然这样讲,西方人士不易接受。总之,这个问题联系到民主问题,要认真对付一下,建议对人权作一番研究,回避不了。

会上大家借应对西方的挑战为由,大讲对人权问题不能再采取回避态度,要求开展我国人权的状况与问题的研究。会上落实了由中宣部理论局拟就的8个研究课题,当场确定了负责主持研

研究的单位,立即着手收集资料,编写一套“人权研究资料丛书”。两年后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了7本,为以后深入研究提供了参考。

这次会议可说是未受领导上原始意图所局限,把人权研究的闸门打开了。在以后蓬勃展开的人权讨论中,已不限于只是对付外国人对我国人权状况的挑战,而且是对人权的理论与实际问题本身展开了全面的探讨。

会后10天,我所主编的《中国法学》编辑部和
中国法学会研究部于3月12日联合召开了“如何开展人权与法制问题的理论研究”座谈会。到会的近20位专家学者一致认为,研究人权问题首先必须进一步解放思想,消除不必要的思想顾虑。不能只局限于批判资产阶级人权理论,还应当汲取古今中外人权思想中属于人类共同文明成果的精华,参照当代国际法公认的准则,贯彻“双百”方针,创造不同学术观点争鸣的学术环境。

这次会后,其他单位随后也开了一系列人权讨论会。如中国人民大学(4月20日)、北大(5月4日)、中国社科院法学所(6月21日)、北京市宪法学会(7月16日)、中国政法大学等都先后举行了人权理论讨论会。此外,人民日报社、光明日报社也都召开了座谈会。我参加了几乎所有上述会议。真是“京城无处不飞花,争谈人权成佳话”。

在此高潮中,11月1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正式发表了第一份《中国的人权状况》白皮书。11月4日,中宣部又召开了较大规模的人权讨论会,中宣部副部长聂大江还对讨论作了总结发言。自此,谈论人权已形成一股新潮。

讨论中也引发了种种不同观点的争鸣。譬如人权是天赋权利还是“国赋”、“法赋”或“商赋”(商品经济所赋)权利?人权是法定权利,还是首先是一种非法定的道德权利、应有权利?人权的主体,是个人还是集体,二者谁为本位?人权起源于资本主义商品经济时代,还是原始社会就有了自然存在的人权因素?人权只有阶级性还是主要体现于它的普遍性、共同性?国家主权是否必定高于人权?等等。《中国法学》从1991年第4期起开辟了“人权与法制研究”专栏,对人权的各种观点进行了连续一年多的讨论,还就人权的主体问题展开过不同观点的争鸣。

人权禁区的突破和人权讨论的开展,还基于

1992年初邓小平南方谈话的发表,提出“主要是反‘左’”的政治方针,扭转了“反和平演变”和纠缠于“姓社姓资”僵化教条的紧张局面。

四、开始迈向正视人权的艰难旅程

从1991年下半年开始,中国政府每年发表一份中国人权状况的白皮书,介绍中国在人权各方面的成就、现实状况和保护措施的情况,并阐明中国政府在人权和人权保护方面的立场与观点。应当说这主要是为了回应西方国家对中国人权问题的挑战,但也间接地或多或少承认了中国在人权方面存在问题。例如,在1991年第一份白皮书《中国人权状况》中列出中国人权的10个方面状况,并附带提到中国人权保护方面的不足,这也是对人权保护的公开承诺。

1997年,中共十五大正式确认“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基本方略(1999年3月第九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进一步将它写入宪法)。1997年中共中央在十五大的政治报告中,也开始谈及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的一项民主任务是“尊重和保障人权”。

1998年江泽民在当时的美国总统克林顿访华时宣告:“尽管双方对人权问题的看法分歧,但中国政府庄严地承诺要促进和保护人权和基本自由”。(转引自冯林主编:《中国公民人权读本》,经济日报出版社1998年版,第485页)1999年,江泽民在英国剑桥大学发表演讲,说中国政府也在努力要把保护人权自由作为政府的一个工作目标。总理朱镕基也说过:“中国尊重国际社会关于人权的普遍性原则,同时认为,促进和保护人权必须与各国国情相结合。”(见2001年2月12日《人民日报》第1版报道:《朱镕基总理与加拿大克雷蒂安总理会谈》)他在接见来华的美国国务卿奥尔布莱特时,后者质疑中国人权状况,他以“我争取人权的斗争比你早十年”(指解放前他参加争民主争人权的革命学生运动),把她挡了回去。

中国领导人上述关于人权的表态,表明他们已不再讳言人权,开始正视人权问题。不过大都是对外国人说的,对内还不能说已成为国策。在实际生活中,中国国内侵犯人权的事情仍时有发生。

直到中共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

中共中央提出了“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战略构想,将尊重和保障人权作为其中的重要内容。2004年第十届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通过的宪法修正案,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条款纳入宪法,使我国人权由禁区跃上宪法的神圣地位,成为宪法的最高原则。这是具有重大意义的宪政进步。此后这一原则也纳入国家“十一五”发展规划纲要和《中国共产党章程》。2009年4月13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了《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09~2010年)》。

这一时期来,通过人民人权意识的增强和各种不同利益群体的权利呼唤与专家的立法参与,全国人大的立法中,逐渐重视了在立法中贯彻民主精神和对人权与公民权的保障,如民事立法中制定了一些不同社会利益群体的权益保障法,在行政立法中制定了行政复议、行政诉讼等保障公民权利的行政救济法,在刑法中确认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罪行法定、罪刑相当三原则,在刑事诉讼法中部分地吸收了无罪推定原则,等等。这表明了我国立法指导思想确有一些进步。

在人权的国际合作方面,截至2009年4月,中国政府已先后参加了25项国际人权公约。(见《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09~2010年)》)其中最重要的是1998年,中国政府签署了《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并经全国人大正式批准;后来又由政府签署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人大尚未批准)。从此,中国的人权事业融入了国际合作和国际监督的大环境之中。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在国际人权事业中被要求承担相称的国际义务与责任。近年中国军队参与国外维和行动和反海盗护航,就是承担国际人权保护义务的初步体现。不过,我国在立法和司法上与上述国际条约的规定和要求还有较大的差距。

当今执政党的最高领导人的历次讲话中也一再肯定人权的重要地位与普世价值。胡锦涛2006年4月在耶鲁大学的演讲中说:“我们将大力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依法保障人民享有自由、民主和人权,实现社会公平和正义,使13亿中国人民过上幸福生活。”他在2008年的新年贺词中又说:“我们衷心希望各国人民自由、平等、和谐、幸福地生活在同一个蓝天之下,共享人类和平与发展的成果。”最近,胡锦涛访问美国在回答外国

记者问时,再次宣示中国要改进人权工作。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2007年2月发表的题为《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任务和我国对外政策的几个问题》一文中,明确指出:“科学、民主、法制、自由、人权,并非资本主义所独有,而是人类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共同追求的价值观和共同创造的文明成果。”在同年全国人大会上答记者问时,再次重申了同样的观点。这些都说明,促进人权事业已成为国家建设和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话题,也是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

毋庸讳言,我国人权状况迄今仍然存在许多缺陷和弊病。近年在法治上也出现时进时退、停滞甚或倒退的现象。立法上仍有违反人权的规定(如侵犯人权的劳教制度与法规迄今没有废除)。在事关公民和社会组织的宪法基本权利与自由的立法上,犹疑不前。公民的言论、出版自由、学术研究、文艺创作与文化活动自由、舆论监督权利、对国家机关及其官员的批评检举控告权利等专项立法拖延不决。对弱势群体缺少生存照顾的人权立法保障。这就不可能在根本上保证和促进宪法和散见于法律中的原则的实现。此外,行政执法中存在大量侵权行为,特别是在房屋拆迁、土地征收、城市管理等方面,执法专横、暴力掠夺、欺压百姓的行为,时有发生,从而引起尖锐的社会矛盾和冲突;司法还没有完全独立,有些地方司法机关甚至蜕化为贪官污吏的专政机器和“打手”,制造许多违法侵权的冤假错案,导致群体性事件此起彼伏。

2008年一些报刊和理论界人士还曾大批人权、民主、自由的“普世价值”,这表明人权道路上还布满荆棘。

毕竟,保障人权已是宪法规定的国家义务,妄图否定和侵犯人权,是违宪行为。中国人权保障事业任重道远,有待几代人的不懈奋斗!

五、保障人权必须克服的观念障碍

反思我国60年人权发展的道路崎岖,举步维艰的原因,最主要的是执政党在人权理论和实践上长期存在指导思想上的偏颇,只有进一步转变观念,才可望推进我国人权事业的健康发展。

(一)走出指导思想上误区

1. 树立执政党的新思维

按毛泽东的观点,中国革命的首要问题是分清“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贯彻的是阶级斗争观,否定博爱的人权观。两军对阵,不应当去“爱”敌人,名正言顺。但成为执政党以后,还一味坚持这种阶级斗争是非观,声言“我们决不施仁政”,就会动摇执政的合法性和人道主义基础。

作为革命党与作为执政党的最大区别是:革命党可以只代表一定的阶级和群体;而执政党是经全民选举产生的(体现为执政党的领导干部通过代表全民的人大被选为国家领导人),不能只对某个阶级或部分国民负责,也不只对国民的多数负责,而要对全民负责。我们通常习惯于讲我们代表“95%以上的人民”或“最广大的人民”的利益,而不说“全民”。对那5%的人的人权要不要负责保护?须知人权主体是指“每个人”,而不论其阶级成分或人数多少。而在我国,上世纪50年代全国人口以6亿计,5%就是3000万;现今13亿人的5%,是6500万,岂是“少数”?把他们打入另册,划为异类,成为人民之外的敌人或贱民,是对人权的最大侵犯。即使是对所谓“阶级敌人”,如果其未被法律剥夺的应有人权和法定权利受到非法侵犯,执政党和政府也应出面予以纠正和救济,否则就会破坏执政的法治基础。

一种主流观念是,强调我们保护的是多数人的人权,不是少数人的人权,似乎这显示了我们对待人权的民主性、阶级性和正义性。诚然这比只保护少数人的特权,特别是只保护社会强势群体的特权,要民主和正当。但是,既是讲人权,就应当是每个人即所有人、人人皆有的权利,而不能只以保护多数为满足。民主的共和精神要求一视同仁,和衷共济,特别还要求“保护少数”。如果以保护多数为借口去压迫少数,就会变成“多数暴政”。进一步说,迫切要求得到人权保护的,往往是社会中被边缘化、被歧视的弱势群体。在出现两极分化的当代中国,保障弱势群体的人权,已是一个严重的迫切的任务。

2. 转到“以人为本”

虽然改革开放30年来,执政党的治国方策已经转变到“以经济为中心”,但阶级斗争为纲的余毒仍不时漂游在政治意识形态的上空。中央领

导人提出要“以人为本”,是在人权观念上的一大进步。但实践上并没有完全改变长期以来的“以党为本”、以“领袖为本”、“以官为本”的积弊。

“以人为本”要以每个人为本,即以人人为本。不能限于某一群体的人;更不能以特殊利益集团或权贵资产者集团为本。要扬弃只强调国家权力和国家利益至上、而抹煞个人权益的国家主义本位观;要纠正集体权益高于个体权益、个体权益要无条件地服从国家和集体权益的片面权利观,树立个体的人权和公民基本权利高于国家权力,集体权利与个体权利平等对待,不受任何权力侵犯的宪法原则。即使为了国家或集体正当公益而要求牺牲个体权益时,也要给个人相应的补偿或赔偿。

“以人为本”还须进一步追问:人以什么为本?或:以人的什么价值为本?马克思说:“人是人的最高本质”,“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以人为本”就是要确认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主体;人自身是衡量一切事物的尺度和标准;满足人的物质与精神需要是人的一切活动的出发点与归宿。这也逻辑地得出,人的自主性与自由是人的最高本质要求;人是目的,而不只是手段;一切为了人和人的需要。

自由是人之所以成为人的必要条件,人的自主性与自由是人的最高本质要求,是高于其他人性需要和人权位阶的核心价值。自由使人成为人格独立自主的主体,从而激发人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力,促使人类文明发展的动力。西方社会崇尚自由精神,这是近代西方物质文明远远超出世界其他地方获得迅速发展的动因。

3. 在政治伦理上需要有宽容、平等、仁爱的精神

不能容忍异见和多元,强求思想、舆论一律。在官场和社会上处处讲求政治的、行政的、社会的阶级对立和等级差别,处处形成阶级和等级特权,连排座次都等级森严。

我国古代墨子主张“兼爱”,法国大革命中提出“博爱”的口号,都是体现“以人为本”的精神。古代帝王要“兼并天下”,我们“以人为本”则应当是兼爱天下,兼容天下,兼善天下。既然倡导以“人类的解放”为理想,就应当有海纳百川、兼容异己的政治胸怀。而不是荡平天下,搞“横扫一

切”的斗争哲学。我们应当依宪法和法律去“团结一切必须团结的人”，以“泽被全民”，保障所有人的、没有被法院宣判剥夺的、合法的权利。

4. 克服形而上学思维和言胜于行的陋习

我国人权发展过程中一些似是而非的论点，诸如否定敌人、坏人享有人权的阶级论，非此即彼的“两类矛盾论”，排除少数人的人权的多数论，反对人权的普世价值的唯国情论，以法定的权利排斥法外人权的取代论，集体人权高于个体人权的颠倒论，等等，这些除了是基于利益的倾向性导致观念的谬误外，也都有思维方法上的形而上学的绝对化、僵化和教条主义影响。

此外，言行不一、言胜于行甚至瞒上欺下、媚上压下的现象，近年有恶劣的发展，使党和政府的公信力下降。

改善我国的人权事业除了从转变观念入手外，更根本的当然还是实行宪政改革，厉行法治，完善制约权力、保障人权的法制。

(二) 依靠进步的社会动力

在上世纪80年代初，中国人权状况的进步，主要动力来自党内高层干部，他们从自己在“文革”中备受迫害的切身经历出发，懂得保障人权，特别是人格尊严、人身自由的可贵，从而促成保障人权的民主法制的初步建立。到了今天，中国的特殊利益集团正在形成，有的地方甚至有形成网络的贪官污吏群体，这些人抱着既得权益不愿放弃，他们已经不是推动人权进步的动力，而是阻力，有些还与黑社会勾结，成为反动的力量。

现在推动人权进步的力量，在我看来，主要是人民群众的维权活动和公民社会的发展。2003年的孙志刚事件就非常具有代表性，这个被侵权个案经媒体和互联网揭露和传播，北京的几个博士上书全国人大，在强大的社会舆论的压力（亦即社会权力）督促下，国务院取消了侵犯人权的收容审查条例，改为社会救助条例。这是民间维权力量推动人权保障的标志性事件。显然，公民社会自下而上运用社会权力将是推动中国人权保障的进步的主要动力。

现今我国互联网的网民有4亿多，他们已初步形成虚拟的公民社会，成为日益强大的民意群体。互联网突破传统上对言论自由的不合理的限制，促成分散的个人在网上形成有共同追求和相

互联系的意见群体，形成社会舆论乃至集体行动，促使形成中国社会民众由下而上影响政治的渠道。这是这几年来网络参政呈现出来的路径特点。网络社群在2009年里开始直接介入现实，近年公民网上维权行动发挥了重要作用。2007年，互联网上揭露山西黑砖窑的信息、华南虎照打假事件，2008年三鹿“毒奶”事件，在全国引起巨大反响，迫使政府问责有关部门，向全国公众道歉。……这些都显示网络舆论对政府的监督威力。湖北“邓玉娇事件”曝光，网民组成邓玉娇后援团赶到巴东县，就是组织化的网民从虚拟跨入现实的标记。再是网民“人肉搜索”使天价烟局长周久耕落马并被司法追究；“史上最牛团长夫人”掌掴女讲解员，网络压力使夫妇双双被撤职。上海“钓鱼执法”事件，通过互联网网民的追索，形成强大的舆论干预，从而得到有关党政部门的重视和比较公正的处理，都是很有典型意义的案例。网络的威力，使官员也不敢怠慢。网络的开放透明能使恶人作恶时心存顾忌，使正义多一个实现通道。网络舆论在揭露官员的侵权行为和贪腐现象，监督政府依法执政等方面，正在发挥国家权力不可代替的巨大作用。以致党和政府的领导人胡锦涛、温家宝都亲临互联网，直接与网民对话、沟通，为联系群众、了解民情、尊重民意开辟了新的渠道。

更高的维权层面还在于，基于人权入宪规定国家成为“尊重和保障人权”的义务主体，保障人权不仅是国家权力的道义基础，而且成为所有国家机关和政府官员必须履行的强制性宪法义务。这就要求国家权力的设立、配置和运行，都应当有利于所有人的人权的实现；要求制定和切实执行保障公民政治权利和自由的立法；要求国家积极地创设条件，加强社会保障，保障公民的各项民生权利，改善弱势群体的人权状况。这些宪政举措必须落实为党政机关和官员的具体行动。今后国家机关对保障人权不作为，就是失职；侵犯人权就是违宪，应当受到追究。

这样官民协力、上下互动，我国人权事业就有希望。■

（作者现任北京大学宪法行政法导师组成员，广州大学人权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最高人民检察院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等职）

（责任编辑 杨继绳）

“大跃进”前后的社会控制

○ 尹曙生

“大跃进”以后，全国大饥荒，饿死了几千万人。饿死这么多人，为什么没有出现大规模的动乱？这是因为，国家采取了严密而严厉的社会控制措施。

1949年，中国共产党接管的是一个千疮百孔的中国。仅武装土匪（有的就是国民党残兵败将，啸聚为匪）就有200多万，还有特务、恶霸、潜伏下来的国民党军政人员、反动会道门头子，活动猖獗，社会治安混乱。经过3年的剿匪、反霸、土改、镇压反革命运动，逮捕、拘留了280多万人，其中判处死刑的有70多万，判处有期徒刑的120多万，其余判处管制、戴反革命分子帽子，交群众监督改造。正如毛泽东在镇压反革命后所说的：“还有反革命，但是不多了”。在大规模镇压反革命的同时，进行了土地改革，农民分得了土地，劳动积极性空前高涨，农业生产得到迅速恢复，农民生活水平迅速提高。以安徽省为例，三年镇反，共逮捕各类反革命分子110164人，其中判处死刑的32876人，死缓2328人，有期徒刑49332人，其余判处管制或戴帽释放。当时安徽只有2700万人，逮捕、处死这么多人，引起的震慑作用是可想而知的。即使还有个别漏网的反革命，在强大的专政机器面前，他们也不敢轻举妄动。1950年安徽发生各类刑事案件1.6万多起，到1952年、1953年下降到5000多起。再加上禁毒、禁娼、禁赌，社会治安良好。当时，从中央到地方领导都认为，大规模的、群众性的镇压反革命运动已经结束，公安机关要转入经常性的侦查破案工作，维护社会治安。

可是好景不长。急于向社会主义过渡，引起了社会震动。

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不仅在党内有不同意见，农民和工商业者，更是不愿意。尤其是农民，通过土地改革分得了田地，过上了两三年的好日子，就要搞互助合作，他们是心不甘、情不愿的。于是，反抗、斗争，

不断出现，治安案件、刑事案件大幅度上升，群体性事件时有发生，农村干群关系也突然紧张起来。1956年安徽省刑事案件发案数就比1954年增加2倍。

针对突然出现的动荡的社会秩序，当政者们不从自己的执行的方针路线上找原因，而是从没有肃清的“残余反革命”方面找原因。1955年3月21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说：“国内残余反革命势力的活动还很猖獗，我们必须有针对性、有分析地、实事求是地再给他们几个打击。”1955年4月21日，国务院召开第九次全体会议，听取公安部副部长徐子荣关于《公安部1954年工作的简要总结和1955年工作要点的报告》，根据这个报告精神，随后给中共中央专门写报告说：“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与社会主义改造的进展，镇压反革命分子的斗争，不仅没有缓和和减弱，而且是更加紧张和更加复杂了”；反革命分子“利用一些群众对农业合作化的不满和工作中出现的缺点，造谣惑众，制造骚乱和反革命暴乱；资产阶级中坚决反抗社会主义改造的分子进行报复破坏活动；一部分反动富农破坏社会主义改造和农村各项中心工作。”5月27日中共中央批转公安部的报告，在批语中指出：“为了保卫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事业的安全”，必须“动员全党和全体人民加强同反革命分子和各种犯罪分子的斗争，严厉镇压一切敢于破坏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事业的反革命分子和犯罪分子”，“目前要着重反对该捕不捕、该判不判、重罪轻判和该杀不杀的右倾情绪”。

根据中央的指示，第二次在全国范围内的镇压反革命运动开展起来了（现在各种史书只写1950年至1953年的镇压反革命运动，而不写1955年部署开展的第二次镇压反革命运动）。于是，各省（市）向中央报告并得到批准的镇压反革命计划，包括捕人、杀人具体数据。安徽省上报中央并得到批准的反革命捕人数是：1955年2.5万

人、1956年4万、1957年3万左右。由于时间紧迫,安徽1955年捕人任务很难完成,所以省公安厅10月28日发出《关于统一集中搜捕反革命分子和各种刑事犯罪分子的具体实施意见》,要求采取集中统一行动在10月底采取“摸一批捉一批的办法,逮捕人数不得低于5000名。11月份,实行全党动手,全面动员,统一行动,集中搜捕,拟逮捕1万名左右。”结果1955年全年共逮捕27611名“反革命分子”(其中有1419人没有任何批准手续),这些所谓“反革命分子”绝大多数都是抵制、反对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农民和抵制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工商界人士。

用镇压反革命运动的手段推动政治运动的开展,从此就成了中国对社会进行控制的模式,尽管名称不一定叫“镇压反革命运动”,但是实质是一样的,比如“四清”运动中划分四个阶段,其中最后阶段就是对敌斗争阶段;“文化大革命”中的“清理阶级队伍”和“一打三反”,也是镇压反革命。

经过大规模镇压,慑于强大的政治压力,敢于公开抵制和反对社会主义改造的人少了,所以1956年3月24日安徽省公安厅向省委和公安部报告说:“原来计划逮捕反革命分子和其他犯罪分子4万名的计划,要适当减少62.5%至75%,即修订改为1万至1.5万名。”而实际上1956年逮捕了2.5万多名“反革命”,大多数是反对农业合作化和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人。

高压政策一时见效,但是并没有消除反抗和斗争。从1955年至1957年安徽省较大规模的群体性事件仍然不断发生。仅暗杀农村基层干部事件就有100多起,被害者114人,而作案者大多数是普通农民。1955年4月6日到9日,萧县发生5起大规模群体性聚众抢粮事件,哄抢粮食24万斤,打砸四个区、乡政府和粮站,被殴打干部39人,其中14人伤势严重。公安厅给省委、公安部的报告说:“发生抢粮的原因是:主要是粮食定产偏高,统购数字偏大,群众留粮过少,粮食供应先松后紧,以及干部强迫命令,激起群众不满,反革命分子乘机煽动所致。事件发生后,省、地、县委立即派出干部前去处理,调去公安干部、公安部队维持治安,运去大批粮食供应急需。本着有问题要解决,有错误要承认;对参加抢粮的‘反

坏分子’要逮捕,对罪大恶极的要镇压;对参加抢粮的群众要批判的处理方针。首先解决存在的问题,至5月25日止,除原订4400万斤粮食(返还)销售计划外,再赶运粮食1050万斤,以满足供应。同时,逮捕参加抢粮的‘反坏分子’108人,对其中为首煽动闹事的4名‘反坏分子’,于5月13日分别在该县四个抢粮点公审枪决;对干部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实事求是地进行检查承认,事态平息。”

这起大规模抢粮事件完全是地方政府的责任。先是虚报农业生产合作社粮食产量,然后实行高征购,强迫(包括打骂、捆绑、非法关押)农民卖粮,等到农民没有饭吃时,又向农民返销粮食,来回折腾;返销的粮食少,不能维持生活,有的人家一天只吃一顿饭,向干部反映,受到申斥。激起群众愤怒。被逮捕的108个“反坏分子”,包括那4个被枪决的人,原来的身份,都不是“四类分子”,而是农民。只是他们带头抢粮,并殴打干部,打砸区、乡政府,被定性为新生的“反革命”、“坏分子”。

因抢粮而被枪毙,并没有阻止人们的反抗。1956年8月至1957年3月,安徽发生暴乱16起,有3000多农民参加,公开反对农业合作化,反对统购统销政策,以县、乡政府为主要攻击对象。暴乱少则十几人,多则几百人、上千人。1957年2月22日,肥西、舒城两县接壤地发生暴乱,暴乱者提出的口号是“要饭吃,要土地”,“现在的政府不是人民政府”。暴乱者打死民警2人,打伤1人,抢去手枪3支,子弹70余发,参与者400多人,99%是农民。两县公安干警和省公安厅派去的武装民警,将其包围,发生枪战,当场打死49人,抓获34人,投案自首者10人,为首的农民程千发自杀,其余的人逃跑外地。

由于加入农业生产合作社后,农民收入大量减少,吃不饱饭,为了生存,不得不偷盗、哄抢,那种“农民就是饿死也不偷不抢”的说法,完全是神话。1957年4月2日,安徽省公安厅向省委、公安部《关于当前社会治安的情况报告》说:“本年1、2两个月,我省无为、肥西、宿县、蒙城、枞阳等县,先后发生群众性闹事89起,哄抢粮食事件271起,参与群众4.5万人,抢去粮食599654斤,柴草39.2万斤,被打干部169人。产生上述事件

的直接原因,是部分地区灾情严重(托词——笔者),群众生活困难;有些乡社干部工作方法简单生硬,强迫命令,引起群众不满;有些‘反坏分子’利用群众生活困难和干部的某些错误,趁机进行煽动。”

3月25日,宣城县8个农业生产合作社495户、659个农民到粮站哄抢粮食,抢走粮食38049斤,打伤粮站干部5人,公安厅长邢浩亲自带领干警前去制止处理,逮捕为首者11人,勒令参与哄抢的群众自动退回被抢粮食(退回1万多斤),同时,要求当地政府退还多征购的粮食5万斤,发放贷款8000多元,给没钱买粮的群众买粮。由于邢浩采取比较务实的政策,较好地处理了这起事件。

据统计,从1955年至1961年5年多时间,发生20人以上大的群众性哄抢粮食事件就1300多起,可以用此起彼伏来形容,其中有30多人为此被判处死刑,而且都是普通农民。改革开放30年来,尤其是在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安徽省没有发生一起群众性哄抢粮食事件。这就充分证明,农业集体化,公社化弄得民不聊生,群众饿得没有办法,才会哄抢粮食。

1957年4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不久“反右派”斗争就开展起来了。毛泽东对右派分子的“进攻”做出了极为严重的估计(见5月13日他写的《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并在一个批语中,要求公安机关,“严密注意敌情动向,尤其要注意农村敌情动向,使右派分子在工农群众中彻底孤立起来”。公安部于8月底9月初在北京召开全国公安厅、局长座谈会,认为在“整风”运动中“客观上形成了右派分子与反革命相呼应、海外敌人与国内敌人相呼应的局面”。其特点是:“反革命(右派)分子搞宣传、搞组织、搞武装活动,地主富农分子煽动农民闹事、退社,搞反攻倒算。”会议要求“进一步再给残余反革命势力一次有力打击”,坚决地“逮捕一批,管制一批,劳教一批,批斗戴帽子一批”等14项措施。毛泽东批准公安部计划,于是在会后不到三个月时间,又一次镇压反革命运动开始了,全国逮捕的人数大大超过1956年全年的总和,仅被判处管制的人数就有120万人之多。

安徽省委在全省进行全民社会主义教育运

动,从1957年10月到12月,在8277个农业生产合作社开展社会主义教育大辩论。省公安厅根据全国公安厅、局长会议精神,配合这次大辩论,挖“新、老反革命”,逮捕12274名“反革命”,管制1074名,劳教855名,戴“反坏分子”帽子1565名,斗争6518名,关押审查2338名。在大辩论中被迫自杀的845人。在这些被打击的人中,绝大多数是农民。

近几年出版的一些社科类书籍,仍然把农业合作化运动当做了了不起的事情记载下来,这是不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的。绝大多数农民是不愿意合作化、吃大锅饭的,因为合作化后,他们的生活水平大大下降了。他们怀恋土改后那两三年美好的日子。我家就是一个例子。解放前种地主家地,交租子,加上苛捐杂税,不得温饱。土改后分了地,从1951年到1954年,温饱没有任何问题,我也才有可能上学读书。大哥因为解放前家里穷困,小学未毕业辍学,解放后参加土改工作队,土改结束后被吸收当了干部;二哥是文盲,在家劳动,他听党的话,积极拥护互助合作,先当互助组长,后当农业生产合作社副社长。我父亲坚决反对他将家里的土地入社,父子俩经常为此吵嘴打架。我那时在舒城中学读书,一次从学校回家,看见母亲坐在床上哭泣,问为什么?母亲说,你父亲被合作社的人叫去辩论,今天肯定要挨打,被辩论的人,没有不挨打的。我说你放心,他们不会打他,二哥是副社长,这点面子他们是会给的;再说,大哥在城里工作,恐怕没有人敢对他动手;你以后要多劝劝父亲,不要拖二哥后腿,不然他的副社长怎么当?全农业生产合作社的人都在看咱们家,如果我们家退社,全社不就跨了吗?

二哥当晚没敢回家,第二天回家时,父亲拿着扁担打他,追了1里多路没有追上,悻悻地回到家里。在我和母亲的劝解下,父亲的气才逐渐消了。父亲也想开了,退社已经不可能了。闯过父亲这一关,二哥一直在农村当基层干部,当大队党支部书记就有20年,是党在农村得力的依靠对象,直到上世纪80年代中期老了才退下来。

关于“大跃进”时期对社会的控制,笔者在《公安工作“大跃进”》一文(载《炎黄春秋》2010年第1期)中已经做了详细记载,这里再作一些补充。

1958年,按照经过毛泽东批准的公安工作

计划要点,为了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三面红旗”的发展不受干扰,要求公安机关“把应该逮捕的人逮捕起来,把应该拘留的人拘留起来”,于是从中央到地方,层层下达捕人计划指标,对那些反抗抵制人,和暂时没有反抗、抵制而将来有可能反抗、抵制的人,有可能犯罪和潜在犯罪的人,统统关进看守所、拘留所、劳教队、集训队,不让他们有反抗的机会。拘、捕人不再是政法机关一家的事,党委、政府、人民公社甚至生产大队领导人都有权决定捕人、抓人,公社也可以组织劳改队。所以1958年到1960年三年时间,安徽仅公安机关正式拘捕的人就有17万多人,集训、劳教了20多万人,比1950年到1953年大“镇反”抓的人还要多。县里、公社、生产大队自己办的劳改队抓的人,比这还要多得多。比如定远县,不仅县里私设劳改农场,公社、大队也有小劳改队;全县23个公社中,就有13个公社设了劳改队,先后劳改了2160人;县劳改队劳改了4023人,死在劳改队的就有1280人。这种无法无天的随意关押人民群众的行为,成了“大跃进”时期进行社会控制的主要手段。

“大跃进”时期对社会进行控制的第二个手段,就是对那些出身好的农民,因抵制人民公社、抵制“大跃进”、抵制共产风、抵制吃食堂等等行为,给他们戴地主、富农帽子不合适,于是就给他们戴上“新生的反革命”和“坏分子”帽子。仅据萧县、砀山、五河、凤阳、无为五县在1979年摘“四类分子”帽子时统计,就有3.7万多普通农民在“大跃进”年代被戴上“坏分子”帽子的。据安徽省公安厅1954年统计资料,安徽省一共有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33.7万多人(那时还没有“坏分子”罪名。1956年3月10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解释及处理政策界限的暂行规定》,把“政治骗子、投敌叛变分子、流氓分子、品质极端恶劣的蜕化变质分子”定为“坏分子”范畴,从此才有“坏分子”这个罪名)。到1958年底,地、富、反、坏分子扩张到71万多人。这就意味着在合作化、“大跃进”运动中给38万人带上“四类分子”帽子。这些被打入另册的人,在农村任人宰割,也是饿死最多的群体。到1979年中央决定为全部“四类分子”摘帽时,安徽只剩下29万多“四类分子”,这就意味着死了42万

“四类分子”。绝大多数是在“大跃进”时期被整死、饿死的。

“四类分子”在农村是专政对象,反面教员,谁都可以任意欺辱。他们的家属子女也受到种种歧视。为了不被戴上“四类分子”帽子,成为专政对象,农民即使有满腔怨恨,也只好隐忍。但是,铤而走险者并不鲜见。1958年8月14日,公安厅发出《关于当前敌情和打击措施的意见》中说:“破坏农业合作化案件逐渐增多,仅5至7月,就杀死、杀伤社队干部41人。”11月5日,公安厅向省委汇报的“敌情动态”上说:“阶级敌人仍然不断进行破坏活动,主要表现在:一,造谣。利用部分群众不明政策和落后心理,大肆造谣说:人民公社化就是一切财产都要归公(一点也不造谣,完全是真实情况——笔者),以致一些地方群众把家禽家畜统统杀掉,有的砍光自留地里的农作物(这也属于敌情动态,是阶级敌人进行破坏活动,要打击——笔者);二,凶杀。全省7至9月共发生64起,其中有对社队干部不满杀害干部的15起15人;三,纵火。全省7至9月共发生针对人民公社纵火34起;四,投毒。7至9月,针对人民公社食堂投毒的12起。”

1959年、1960年这类案件继续发生。仅1960年12月到1961年2月两个月时间,全省发生哄抢、盗窃国家粮库粮食事件847起,损失粮食、山芋180万斤。据对淮南、芜湖、马鞍山三市和和南陵、六安等13个县调查,参与哄抢者5495人,都是普通农民,都是因为断炊、断粮,家里都有饿死的人。1960年12月27日一天就发生抢粮28起,在抢粮过程中杀死干部和仓库管理员26人。作案者全是农民。有个别“四类分子”被逼急了,也要反抗。1960年1月4日,霍邱县河口公社一个生产队长,到戴上“反革命分子”帽子的刘某家搜查粮食,刘一家四口一起动手,将他捆绑,然后将其杀死。刘家原有7口人,已经饿死3口。这个生产队长还要去他家搜查粮食,把他们惹急了。刘某夫妇被判死刑,另2人关押期间死在看守所。这一户人家死绝了。

“大跃进”时期对社会控制的第三个手段,就是把社员死死控制起来,让他们无可逃遁。按照“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的原则,让他们从事农业生产、大炼钢铁、兴修水利,干部

严格管理,劳动场所有民兵看守;有的地方男女分开住宿,夫妻不能过正常生活,稍有不满意者,即遭到批斗,甚至戴上“反革命”、“坏分子”帽子,或送到劳改队。公社社员完全失去人身自由、行动自由。公共食堂普及后,社员家里锅碗盆勺被没收,或拿去炼铁,稍有反抗行为,动辄不给饭吃,逼得他们不得不就范。也有被逼急了铤而走险进行犯罪活动的。仅1959年8月到1960年1月,安徽省就发生食堂投毒案46起,有17人中毒死亡,公安厅为此发过3次通报,要求保卫人民公社食堂安全。另外发生9起凶杀案件,社员饿极了,到食堂抢饭吃,遭到阻拦,杀死15位公共食堂管理员、炊事员。

“大跃进”时期对社会控制的第四个手段,就是广设收容审查站,把逃难的群众拦截、遣送回来,不让他们有逃生的机会。

从1958年到1960年底,国务院、公安部先后发出4次通知和1次电话会议,要求全国各地,做好收容遣送工作,不要让农民盲目流入城市,尤其是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影响国家形象。安徽省委、省政府、公安厅,发过6次通知,1次电话会议,提出严格要求,对此项工作抓得不力者要受处分。这样,安徽就在全省城乡、边沿结合部,先后设立100多个收容遣送站;全省公安派出所随时发现外流人员随时扣留,送收容审查站收容遣送。据38个县市不完全统计,三年中先后收容遣送40.8万人。有的人被收容后,没有立即遣送,而是给收容单位干活、做苦力。被收容的人吃不饱饭,还要做重体力活,加上打骂、虐待,不少人死在收容遣送站,而没能回家。仅宿县1960年在收容审查中就扣押3005名外流人员,长期不放,无偿劳动,死在收容所的237人。1960年12月,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室给安徽省委转来一封“探亲记”的人民来信,反映他1960年10月9日到合肥探亲,被合肥市胜利路派出所莫名其妙抓进收容所,尽管他百般说明自己是来探亲,而且提出亲戚家庭住址、门牌号码,收容所就是不放人,直到11月8日,他才趁看管人松懈,逃跑出来。接到中央转来的信,引起省委、公安厅重视,派专人到合肥收容遣送站检查,据对照花名册的24300名被收容审查的人员了解,有6527人不应收容,占总数的26.8%(其实99%都是不应收容

的——笔者)。其中有2314人是外出必须路过合肥的,1950人是到合肥探亲访友的,809人是到合肥看病的,554人是到合肥购物的;还有的人就是合肥市的机关、学校职工、学生,因晚上看戏、到澡堂洗澡回去较晚,被当做外流人收容审查。大蜀山收容点对不服收容、申述理由的人进行体罚,打死3人,非法没收被收容人员现金2537.53元,金戒指8个,公债券50元。

除了收容审查外,安徽省对社会控制还有一条“死招”,就是不断地搜山,把人民群众为了活命的一线希望也给掐断了。安徽省西部和南部都是山区。在饥饿、死亡面前,不少人逃往山区,去找野生动、植物充饥。省委指示公安机关,要不断搜山,把逃亡的“地富反坏”抓回来接受改造。1958年5月,徽州地区8个县抽调2800人次,进行搜山行动,查出6700外流人员。1958年7月12日省公安厅向省委报告说,1月至5月全省36个山区县共查出外流人员25613名。7月19日公安厅发出简报称:据15个山区县市统计,在198个乡镇,71个(边沿)结合处,11个新建村,76个山凹,115个山洞,查处外来人员72817人,其中有地富反坏分子2914名。

1960年安徽人口大量死亡,政府不是想办法救人,而是兴师动众,继续组织人员大规模搜山。4月1日,“皖南地区第一季度清山(搜山)工作总结”称:“共组织基层干部、民兵、治安积极分子等60余万人,计搜查山头448个,山洞2426个,山洼7607处,山冲447处,孤庙417处。”动用这么多人,“战果”如何呢?“扣审反坏嫌疑分子1606人,经查实有地主23人、反革命12人,盲目外流人员300余人。”

出动60余万人次,搜查出所谓1000多“反坏分子”嫌疑人,结果只有23个地主,12个反革命,他们没有现行破坏活动,为了活命,为什么不能到山里找活路?而那1000多群众不是饿急了,谁愿意到深山老林去风餐露宿?

“大跃进”时期安徽饿死了那么多人,同不断进行以“镇压反革命”为名而野蛮进行社会控制,密切相关。

(作者为安徽省公安厅原常务副厅长)

(责任编辑 杨继绳)

从票证兴废看中国经济

○ 林培山



那个年代城镇居民购粮的凭证

在清理久未翻腾的抽屉时,发现了早已被遗忘的上个世纪印制和发放的一些票证。细细查看,有不同面额的全国通用粮票、地方粮票、面票、米票、油票,不同年份的购粮证、购猪肉证、购煤证、购天然气证、购货证等,真是种类繁多,丰富多彩。遗憾的是,没有找到布票。后来据老伴回忆,所以没有找到布票,是布票行将停用前用它买了床单。

在清查的过程中,不禁引发了从票证发放到其“退休”那段不寻常历史的回忆与思考,从而更清楚地回味到党在领导各族人民建设社会主义走过的艰辛道路和改革开放给人民生活带来天翻地覆的变化。

这些票证中,“资历”最老的要算粮本和粮票了。据我的记忆,粮本和粮票是上个世纪50年代初,大约是1953年实行粮食统购统销的产物,一直延续到90年代初,经历了近半个世纪的历程,在粮食敞开供应后才退出了历史舞台。其他票证是以后陆续诞生的,特别是1960年到1962年历史上称之为“三年困难时期”,各种票证可以说是相当“健全”了,吃喝的东西,除了水几乎没有不凭票证供应的了;穿的衣服、铺盖的被褥、烧的煤、用的肥皂等,无不是定量凭票证供应。

《购货证》的实际供应品种是:粉丝、

粉条、淀粉、麻酱、食碱、鸡蛋、火柴等。《购煤证》、《液化气换气证》和《天然气用气证》,反映了由用蜂窝煤烧饭,到用液化气再到用天然气的历史发展过程。

凭票供应的物品数量标准都较低,而且大都是落实到人头的。以粮食定量为例,就地区而论,城市与乡镇、大城市与中小城市略有差别;以人而论,重体力劳动、一般体力劳动、脑力劳动、老人小孩都区别对待。机关干部属脑力劳动者,一般每月定量在26~28斤之间。至于粗细粮比例,各地有各地的规定。油、肉的供应标准也都是以人头而定,地区之间、城市之间以及城市与乡镇之间也有差别。北京是每人每月猪肉半斤,食油半斤,春节、国庆节另发补助票。

在三年困难时期,为了渡过难关,人们想了不少办法。1960年7月,《人民日报》曾发表过《大量生产小球藻》的社论,于是生产“小球藻”、“人造蛋白”、“植物蛋白”等一度很热闹。中央也曾转发过“苞米食用增量法”,以此推广“做饭技术革新运动”,但也以无果而终。真正对度荒起过一些作用的,是许多单位设法搞了一些副食生产。当时我在中央监委工作,因营养不良,不少同事患了浮肿病。我们夫妻俩都因浮肿而被送到万寿路招待所休养过。中监委和中组部的领导,为了给职工增加一点营养,决定抽出人员到黑龙江



与城镇居民生活息息相关的各种票证



计划经济年代的各种票证

省北安地区与省委组织部合办农场，开荒种大豆，我是其中的一员。经过一年的艰苦劳动，生产了几万斤大豆，为机关渡过难关起了一定作用。在此期间，中央为了保护骨干队伍顺利过关，行政13级以上干部每人每月增发一斤肉、蛋票；14~17级干部增发一斤糖、豆票。所以，当时有了所谓“肉蛋”干部和“糖豆”干部之说。

粮食是维持人生命的主要食物，因此，在凭票证定量供应的年代，不少家庭买回口粮后，都用碗量一量，以便按定量做饭，防止超支。吃饭时，多是先尽着孩子吃饱，大人再分着吃。在食堂就餐的职工，也是按定量花饭票，不敢超量，而且常常是进食堂时很高兴，吃完饭还不想走，因为总觉得肚子里还欠缺一点。职工若调动工作，或由这个城镇搬到另一城镇，粮食供应成了一种必须转接的关系，要到粮管部门办理转接手续。临时到外地出差、探亲，也须领取或兑换全国通用粮票，否则将会“饿饭”。从这个意义上说，当时粮票的“身价”，比人民币还高，因为你有钱无粮票并不能买到饭吃。1980年代末，副食品供应逐渐改善，人们的粮食消耗逐渐减少，有些人手上有节余的粮票，于是用粮票换日用品等小东西也逐渐流行开来。由此看来，粮票在民间私交中好像又成了有价票券。

对于副食品，那时人们的想法与现在人们的想法也不完全一样。现在人们买肉总是想买瘦一点的，最好像“通脊”一类纯瘦肉，而那时人们总是想买肥一点的，能买着“大油”更好。这倒不是人们不懂得肥肉对人体不如瘦肉好，而是因为当时所吃食物缺乏油水所致。买蔬菜如果有挑选的

余地，就尽量买那些出熟菜率高一点的，含水多的一下锅就变得很少的，尽量少买或不买。这是因为人们首先考虑的不是营养搭配问题，而是填饱肚子更重要。

造成物资如此匮乏，人民生活如此困难，既有天灾，也有人祸，主要是人祸。据资料记载，1960年粮食和棉花产量跌落到1951年的水平，油料产量跌落到建国时的水平，轻工业产品也大幅降低。1960年与1957年相比，城乡人民平均粮食消费量减少19.4%，植物油人均消费量减少23%，猪肉减少70%。这就是所以必须采取凭票证定量供应措施的经济缘由。

生产水平回落，除了连续严重的自然灾害外，主要在经济建设的指导思想上发生了“左”的错误，急于求成。在所有制方面和生产关系上的“急于过渡”，无偿地剥夺农民、无偿地占有他人劳动成果，严重地伤害了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在建设速度上追求高指标、高速度的所谓“大干快上”，轻率地发动“大跃进”运动，造成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等错误严重泛滥，对社会生产力、经济建设的严重破坏。

从1960年起，中央先后采取了一系列政策上的调整，情况很快有了好转。1960年11月，中央决定恢复了农民的自留地；1961年元月，中央八届九中全会通过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国民经济调整方针；同年6月又决定解散了农村的公共食堂。在诸多措施实施之后，生产有了较快的发展，供应情况有了明显的改善。可是还没有等到可以取消票证的程度，又来了那“史无前例”的年代，十年浩劫，天下大乱，是非颠倒，喊的是“抓革命促生产”，实际是“停产闹革命”，不但把刚刚恢复的生产破坏了，而且把原来的老底子也挖空了，致使整个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这就是使那些票证得以“长寿”的政治原因。

从保障人民顺利渡过难关，确保社会稳定的角度来看，票证可以说是功不可没。不难设想，在吃、穿、用物资极度匮乏的情况下，如果不采取凭票证定量供应的办法，必然是物价飞涨，人心浮动，社会动荡，广大人民群众吃的苦头会更多更大。凭票证定量供应生活必需品，虽然标准较低，但有保证，人们心里还是踏实的。所以在那个时期，尽管日子过得艰难，但是听到的牢骚、怪话并

不比现在多,这是因为广大群众支持党和政府的举措,相信在党和政府的正确领导下,上下齐努力,一定能渡过难关,迎来好日子。在笔者看来,当年实行凭票证定量供应,也是一种“以人为本”的思想体现,其意义就在于它能使人民得到最低生活保障。

票证的完全彻底“退休”,是改革开放,生产发展的结果。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的基本路线,这是党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进行又一次伟大革命的正确路线。在这个基本路线指引下,高举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经济建设得到了持续快速发展。有资料记载,1952年国内生产总值为679亿元,到2008年增长为300670亿元,中国目前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大国。国家财政收入,1950年为62亿元,2008年增至61317亿元,有关官员最近透露,2010年有望达到8万亿元,为世界第二,仅次于美国。外汇储备为世界第一,到2008年底达到19460亿美元。粮食产量2008年达到52870.9万吨,比1949年增长3.7倍,用占世界10%的耕地,养活了占世界20%的人口。现在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了小康水平。国力大大

增强,物资供应充足,人民生活得到显著改善,票证自然就没有了“用武之地”,只能告退。

从实施票证史实的回顾中,使我们更深刻地感到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改革开放的重要性。我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说的好:“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他还说:“如果现在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是死路一条。”胡锦涛总书记在新进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候补委员学习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研讨班讲话中说:“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改革开放符合党心民心、顺应时代潮流,方向和道路是完全正确的,成效和功绩不容否定,停顿和倒退没有出路。”这些教导,既是历史经验的科学总结,也是我们今后行动的指针。■

(责任编辑 杨继绳)



SIEMENS

西门子助听器

Hearing Aids

服务热线:010-84608877

SW 声望听力
www.sw-tl.com

请认准西门子听力集团授权证书 西门子听力仪器(苏州)有限公司

新华社广告登记证:京字0509第2461324号 新华社国内要闻部 广告登记证:京字0509第2461324号
注:请认准西门子标识/请详细阅读产品说明书或向服务人员索取下附页和说明 请认准广告(代)第201004048号

天津文革中的“二二一”事件

。 王 辉

突如其来的绝密会议

1968年2月21日，我上班不久，就听到一个绝密的消息，那就是市革命委员会一大批人，昨天神不知鬼不觉地都去北京参加什么会议了。我那时任天津市革委会办事组秘书组组长，市革命委员会委员和许多群众代表都去北京开会，我为什么一无所知呢？当时秘书组有两位军队干部，他们也不知道情况。当时市革委会副主任江枫的杨秘书也来秘书组打听此事，秘书组同样告诉他不知道。他发牢骚说，哪有这样的事情呀，通知领导人去开会而不告诉秘书！江枫原来是公安局长，是“革命干部”参加领导班子的代表。这才时过两个多月，人们和杨秘书做梦也不会想到江枫要出事了！

后来得知，这次去北京开会是由支左联络站组织人分头通知的。市革委秘书组管会务的王水田直接到市革委委员家挨户通知，只通知本人21日上午9时到干部俱乐部开会，也不说什么内容，只告知多带点衣服。（王本人也一无所知）听说他们到了俱乐部静静等候，快吃午饭时给每人发一袋面包充饥，下午统一乘解放军的大篷车进京，先去第二炮兵司令部那里住下，晚上去京西宾馆开会。参加这次会议的有天津市革命委员会委员和天津市革命群众代表以及驻津部队、文艺系统代表约千余人。

人们在“文革”中扮演的角色是复杂的。革命委员会委员和群众代表在前一段闹革命时一度成了“主人”，而参加这次活动直到开会前居然一无所知，又成了只会喊口号的工具。

其实，不仅是一般群众代表，就是时任中共天津市党的核心小组组长、天津市革命委员会主任的解学恭对此会事先也是一无所知。据跟随解学恭的秘书回忆，他随同解赴京开会时，因为当

时他的家在北京，想给家里打个电话，可是京西宾馆各个房间的电话一律卡断，服务台的电话又不准使用。解学恭等人先到的京西宾馆，可是人家不让进，还要在外面等候，估计就是还没有来得及处理好电话问题。

这件事为什么搞得如此神秘？原来是后来担任天津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的王曼恬，给江青写了一封告密信，说天津市出现了“黑会”和“黑戏”。她所说的“黑会”是指1967年全国造反高潮中，各地一些文艺界的造反派联合在天津召开的“全国工农兵文艺战士座谈会”。王曼恬说这个会议是阴谋夺文艺界的权，后面有黑手，就是天津的方纪和孙振。她所说的“黑戏”是指天津人民话剧院“11·3”革命造反派排演的《新时代的“狂人”》。这个戏是以当时闻名全国的“陈里宁事件”编排的。陈里宁原是湖南省湘潭县委办公室的一个工作人员。从六十年代初期起，他就给中央写信、撰写文章批判刘少奇，后来被公安部作为反革命要案审查，再后来被关进北京秦城监狱。大约在1965年，公安部认为陈里宁有精神病，遂把他从监狱转到精神病医院治疗。文化大革命开始，一些高等学校的红卫兵了解到苏联克格勃对待政治犯的一种重要手段就是把人关在精神病院加以迫害。受到这个启发，这群红卫兵就到精神病院查找这类病历，很快发现了陈里宁，向中央文革小组反映。戚本禹赞扬说：这个人很了不起，那么早就看出刘少奇是“修正主义者”，我自愧不如。1967年初“陈里宁事件”被披露后，全国各地的群众普遍地将“陈里宁事件”诉诸舞台，形成了“文革”中的一次重大的群众性自发文艺运动。其中最为轰动、影响最大的是天津人民话剧院“11·3”革命造反派排演的六场话剧《新时代的“狂人”》。该版本在六十几天内共演出了47场（包括在北京12场），观众达五万余人。不料，陈里宁又被发现还有攻击毛泽东的言行，

很快打成了反革命。

王曼恬是毛泽东表兄王星臣的女儿。她的信触动了江青敏感的神经。“文革”中江青是“文化革命的旗手”，她岂能容忍别人染指文艺界，而且还敢妄称夺权。陈伯达出狱后曾在回忆录中写到：“在天津刚有些秩序时，江青听了她在天津的一个耳目的话，就夜间叫几十辆大卡车，把天津那时所有活动分子都弄到北京来，我阻止此事已来不及，还被迫去参加。此会一结束，天津市副市长王亢之回到天津自杀，天津市公安局长江枫被禁闭。”

中央首长接见

1968年2月21日晚9时半至11时半，周总理、陈伯达、康生、江青、姚文元、谢富治、吴法宪、汪东兴、叶群等人以及中国人民解放军各总部、各军兵种和北京部队负责人接见了天津赴京的代表。周总理、陈伯达、康生、江青、姚文元在会上讲话。

这次会见异乎寻常地由江青主持。江青开门见山地提出所谓“二黑”问题。江青一出场就说：“同志们好，向同志们致敬！向同志们问好！”会上热烈鼓掌，向江青同志致敬、向江青同志学习的口号不绝于耳。江青首先问大家：“在你们天津，去年‘全国工农兵文艺战士代表座谈会’，有这么一个黑会，知道吗？（众答：知道。）黑的！还有一个黑的戏，叫做什么《新时代的‘狂人’》，有没有？（众答：有。）黑的！今天就想和同志们谈一谈。这是个什么原因，讲讲道理。”其实，在场的有多少人知道这所谓“二黑”？可是群起响应。群众不仅是会喊口号的工具，而且是盲从的、一呼百诺的、指到哪里就打到哪里工具。

陈伯达接着讲话，他浓重的福建口音很难懂，由叶群做翻译。陈伯达首先迎合江青讲了所谓“黑会”、“黑戏”问题。他特别点了一些人的名。他说：“在我们国家内，有周扬为代表的一条文艺黑线，它在全国有相当的一个黑网。比如在天津，他就有一伙，像方纪、孙振、白桦、李超、董杨等等。”陈伯达所说的白桦、李超并不是文艺界的人士。白桦是市委常委、宣传部长，“文革”开始就受到揭发批判。李超原为市委组织部干部处处长，

后任市委政法部副部长，他与文艺界并没有关系。陈伯达在1964年来天津专程去小站地区的西右营看周扬，之后又抓了“小站‘四清’”的典型，与王亢之、方纪、江枫本来都熟识，而且也是了解的。但如今江青抓这些人的问题，陈伯达见风使舵，极力开脱自己。他说：“我在天津做了一些事情，一些‘四清’问题的事情，当然在这里就接触到一些人……像方纪之流他们去年不知是什么道理，到北京来，因为过去在‘四清’工作中碰见过他们，认识了他们，因此我也跟他们谈了话，我那时跟他们说过三条，要他们不要登台呀，不要伸手呀，不要上当呀，你们这些小报里都反映了……但是方纪他们还是要表演呐，还是要登台呀，我跟他们说是一回事，他们反其道而行之又是一回事……”陈伯达进而又说“我最近和一些同志谈过、说过，天津虽然建立了革命委员会，但是个别的也不能排除有反复的可能，也有一些变色龙，变颜色，有些小的爬虫，为了适应它的需要，时而变这样的颜色，时而变那样的颜色。我想，我们大家要提高警惕，在毛主席的领导下，在光焰无际的毛泽东思想照耀下，我们充满信心，我们是能够战胜一切的。”

姚文元接着讲话，重点批判了方纪及其作品《来访者》和孙振及其小说《战斗的青春》，并且批判了王昌定《创造需要才能》的文章。

江青接着讲话，点了天津文艺界许多人的名字，其中有孙振、杨润身、王昌定、袁静、董阳、邵文宝、张贺明、滑富强、王静、李启厚、尹淑坤等。她还点了河北省献县、深泽县有大叛徒集团，这里又牵连一大批人。因为深泽县、献县都是冀中老根据地，在这里参加革命的老干部很多，市委书记处书记王亢之、宋景毅都是深泽县的。江青的讲话，实际上诬陷王亢之等人是叛徒。她还说：“由于方纪他们到北京来坐的汽车就是公安局的，我有确凿的证据，因此建议，上次我和总理就点过你们天津文化界、公检法，现在我着重地建议，公检法的问题，应该彻底揭开。”在谈到公检法时，江青还说什么“过去还有一个什么许建国”。许建国是解放天津进城后的第一任公安局长，后任副市长，再后调上海市任副市长兼公安局长，后来转入外交部出国任驻外大使。江青接着又颠倒黑白地说：“这个公检

法如果不把盖子揭开，害苦了人了，他们不是专了资产阶级政，他是专了我们的政。主席、林副主席、我走到哪儿，他们都盯梢，他们都装窃听器。这允许吗？（众答：不允许。呼口号）要不要打倒他们？（众答：要。呼口号）”据我所知，中央领导人来津都是公安局局长亲自出来负责保卫工作，怎么又成了“盯梢”呢？再有，何时何地何人装过什么窃听器呢？江青还说：“你们那里有这么一个组织，整总理的黑材料，整康老的黑材料，整伯达同志的黑材料，整我的黑材料，请整！”这更是信口雌黄，天津哪里有人整中央领导人的“黑材料”呢？江青像个疯狂的人，而群众也跟着疯狂地喊口号。

康生接着讲话。他在批判“黑会”“黑戏”中又点了尹淑坤、李启厚的名字，说：“这个剧本的编剧者叫尹淑坤的，有没有在座？（众答：已揪出）（江青：好！）（呼口号）还有一个演出负责人叫李启厚，在不在呀？（众答：没有）也揭出来没有？（众答：没有。有人说：回去就揪。有人说：揪他阻力。江青插话：不怕阻力！不怕！）……”

最后是周恩来讲。他首先说：“让我首先代表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最亲密的战友林副主席，问你们好！（长时间热烈鼓掌，高呼口号）祝同志们好！（热烈鼓掌，呼口号）”他在讲话中除表示完全同意以上讲话批判“黑会”“黑戏”外，还特别表示重视江青的讲话。他说：“去年9月5日江青同志刚讲了三条：我们拥护支持加强巩固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帅的党中央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加强和巩固我们伟大的人民解放军；加强和巩固我们新生的力量革命委员会。讲话之后，就在同一时期，天津有一小撮刘邓陶的死党和陆定一、周扬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他们就要挣扎……尤其是江青同志在11月9日和12日讲了文艺界要清理队伍，要阵线分明，要阶级斗争阵线分明，树立队伍，抓坏人，这样的指示以后，天津文艺界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他们要搞他的黑会，这清清楚楚是垂死挣扎吗？”他还说：“刚才江青同志说得很好，就是要改造公检法……”正是在这次会后，天津立即开展了批判“二黑”（黑会、黑戏）及“一砸”（砸烂公检法）运动。“揪出变色龙、小爬虫”的标语遍布大街小巷。

市革命委员会的改组

这次“二二一”接见之后，新成立的革命委员会随即进行了一次改组。当时，在天津市革命委员会常委组成人员中，被结合进来的原天津市的地方领导干部只有江枫、王亢之、范永中、王占瀛等人。江枫、王亢之、范永中都是在小站地区参加过“四清”的，因为陈伯达当年“红”了，当了中央文革小组组长，他们参加小站“四清”也成了“光荣经历”，被早早结合进市革命委员会。陈伯达对江枫、王亢之、方纪等人本来是支持的，但是江青态度一变，陈随即迎合，这几个人便成为牺牲品。江枫在散会后立即被隔离审查。王亢之在从北京返回的当天住在招待所中，服安眠药自杀。范永中是原市外贸局局长，革委会成立时担任办事组组长，不久就因所谓政治历史问题被隔离审查。

当时原天津地方干部参加领导核心的就是江枫。江枫是1938年参加革命的老干部，长期从事公安工作，从1960年开始任市公安局局长。天津解放时，江枫属于来自于晋察冀社会部和冀中公安局的那一部分人，他们主要负责政治保卫工作；市委书记万晓塘带着来自于冀鲁豫公安局的一些人，主要负责经济保卫工作。据说两批来自于不同山头的人马，过去就有矛盾，可是人们都得按组织原则行事，相安无事。“文革”开始后，鼓动人们造反，故矛盾激化了。支持江枫的一些人成立了公安局“造反总部”，反对江枫的一些人成立了“政法公社”。前者反市委，后者保市委。万晓塘心脏病猝死后，江枫最早提出怀疑是自杀的。1967年2月14日，奉国务院、中央军委命令，天津警备区接管天津市公安局，成立天津市公安局军事管制委员会。市公安局军管会成立后，即宣布公安局的“天津政法公社”为反动组织，勒令解散。之后成立“干代会”时，公安“造反总部”又成了“干代会”的主要成员，成为江枫进入市革委领导的重要支持力量。当时江枫参加了市革筹小组。在中共中央、中央文革1967年一次接见天津市代表时，周总理曾给江枫写过纸条，要他揭发万张集团的问题，并在会上表扬过江枫。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公安部长的谢富治在京召见过江枫，动员他揭发万张集团的问题。从江枫在“文革”中的命运就不难看出，当年他是

靠中央、中央文革支持起家的，而后又被江青打倒的。江枫是老公安局局长，精通业务，但个性强，对以万晓塘为首的市委有不满情绪，在一定气候下起来造反。记得在“四清”时，赵武成认为公安局右倾，找江枫谈话进行批评，江枫在市委大厅碰见我时，皱着眉头说不理解到底是怎么回事。他在革筹小组又因为个性太强，与驻军负责人发生过顶撞，把他拿下来，正符合驻军的意愿。把他清除掉之后，除了上边还有个解学恭以外，天津市实际上是军人一统天下了。江枫从这次会后一直被“监护”审查，直到1971年12月，因心脏病突发逝世。1978年1月，中共天津市委对江枫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江青、陈伯达的迫害予以平反。



王曼恬在天津小靳庄

当时天津市极少数起来参加造反的领导干部，其后几乎都没有逃脱被打倒的命运。人们都知道是王曼恬向江青写密信引发了“二二一”事件，但是光凭王曼恬一个人恐怕也起不了这么大的作用。

近年来在关于“文革”的研究中，有人说在“文革”中有两股势力，或者说是两个集团，一个是江青、张春桥、康生、陈伯达等人，其中江、张和王洪文、姚文元关系最密切，后来他们被称为“四人帮”；一个是以林彪为首的少数军队高层。后者与“四人帮”的矛盾不断激化，毛泽东采取措施，林彪出逃丧生，这股力量被粉碎。陈伯达由于向林彪势力靠拢，首先被打倒，“文革”的进程似乎证明了这一点。

王曼恬也没有好结局

王曼恬当时凭借她的特殊关系，向江青写密信告发天津的“二黑”问题，成了“有功之臣”。按照江青的旨意，王曼恬从此上台，担任中共天津市革命委员会核心小组成员、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成立市委后又担任市委书记。

她在上世纪70年代初期又调国务院文化组任副组长，来往于津京两地工作。她为什么到中央文化组任职呢？据吴德回忆，当年吴德兼任国务院文化组组长，由于把持文化组的于会泳等人都是江青的亲信，吴德工作起来很困难。当时万里给吴德出主意，可以把王曼恬调到文化组来。万里说王曼恬是王海容的姑姑，和毛主席是亲戚，能和毛主席见得上面、说得上话。有一次王曼恬到北京，吴德找她谈了这个问题，提出文化组要请她兼职，她在天津的工作可以不动，每星期来一两次参加文化组的工作则可。她说她本人同意，但要请示毛主席。吴德说那是不是就由

你给毛主席写一封信，看一看毛主席有什么意见。后来，王曼恬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把在文化组兼职的事情报告了，毛主席同意。这样，王曼恬在京兼职，工作于京津两地。据吴德回忆，王曼恬在文化组表现还是比较好的，向毛主席反映了一些情况，帮助解决了文化组的一些问题。有几次于会泳、刘庆棠、浩亮等在文化组整人，王曼恬一说话，他们就缩回去了。

粉碎“四人帮”以后，于会泳等人接受审查，王曼恬不再赴京工作。在清查工作中，王曼恬的问题成为重点。从1976年12月开始，市委常委开会清理自身的问题，每次都是解学恭先讲，然后王曼恬讲。市委先后召开过六次常委会、常委扩大会议和一次全委扩大会议，让王曼恬讲清问题，她讲来讲去，一些问题始终也说不清楚。王曼恬对于清查她的问题思想抵触很大。1977年1月4日下午，她在办公室服安眠药自杀。当年市委书记都在市委大楼小院内办公，每人一间小办公室，一张单人床，中午在办公室休息。那天下午上班多时，警卫人员才发现王的办公室紧闭未开，打开门后发现她昏倒在床上，立即送医院抢救，才没有死成。

为了防止王曼恬再次自杀，市委将王曼恬自

杀未遂的情况和她的态度向华国锋、党中央作了报告,并提出对王曼恬实行隔离审查。报告发出后,市委随即指定由市直机关党委和市委警卫处负责人共同组成了20多人的看护小组,对王曼恬采取保护性措施。解学恭对看护小组提出三条具体意见:一是防止自杀,确保万无一失;二是政治上要划清界限;三是生活上要给予适当照顾。

1月10日市委正式成立王曼恬问题调查小组,由我主持的清查办公室负责。1月18日至26日,经市委批准,文化局、市直机关、文教系统、天大、南大等五个单位开大会对王曼恬进行面对面揭发批判。王曼恬于1月22日给解学恭写信,说批判和报纸文章的调子越来越高,再加上对她实行看护,她感到“精神上受不了”。1月27日晚,王曼恬以和值班人员谈家常、讲故事的办法,麻痹了值班人员。20时她向值班人员要了两片安宁片、一片安眠酮服下,20时15分王熄灯并将门用方凳顶上。值班人员为防止意外,又将凳子搬开,将门半启。20时15分王睡觉不打呼噜引起值班人员怀疑,推门进屋见王没有动静,21时10分又拉亮电灯,见王用被子蒙着头仍无动静。21时40分,值班人员揭开被子见王脸色不好,怀疑其心脏病发作,找来医生检查发现瞳孔放大,呼吸脉搏已经停止,随即采取药物和人工抢救措施,但为时已晚。经医生、法医、现场检验人员确证,王曼恬死亡,是用一条毛巾和床单边缘布条勒在脖子上自缢身死的。

王曼恬自杀的当晚,市委书记王一、赵武成和我都分别赶到现场。王一当晚在家里已经服了安眠药,我们一起听值班人员汇报时,他情不自禁地摆着头。我是第一次看到自缢的,听说“吊死鬼”都吐出舌头,其状甚惨。可王曼恬只是脸色有些青紫,舌尖微向外吐,像因病而死的人一样安详。原来她将毛巾、布条的一头拴在床头栏杆上,一头往脖子上一勒,身子往下一滑就断气了。听说女一中以前有一位女校长,被审查时就是在床上用这种方法自缢的。王曼恬当时曾在该校担任教务主任,看来她是了解这种自杀方法的。无独有偶,时隔14年,1991年5月14日,在北京保外就医的江青也是用同样的方法自杀身亡。江青用几个手帕结成一个绳套,套在浴盆上方的铁架上,而后用被子和枕头垫在脚下。

王曼恬自杀身亡后,我和市委清查办公室的人员一起到她家清理她的信件等各种资料。令我深有感触的是,我虽然身为办公厅主任,在她生前却从未登过她的家门。她虽然主管文教工作,但是工作上我同她联系也不少,因为她这个人有时管得很宽,什么事情都喜欢过问。例如1975年秋一个周日的早晨,我正在家中休息,突然接到王曼恬的电话,说引河桥附近一家工厂的工业污水排入农田,要我马上去解决一下。我立即找市建委管治理环境污染的人,一起去现场察看解决。那时觉得王曼恬虽然水平不高,但在工作上敬业的,而且敢说话、敢负责。1973年国务院决定将河北省所辖的蓟县、宝坻、武清、静海、宁河划归天津市,这对于天津往后的发展非常有利。但在国务院尚未决定之前,这又是一件难度很大的事情。王曼恬受解学恭的委托,跑到国务院直接找李先念副总理,再三陈述理由,终于办成了这件事。“文革”初期军队干部一统天下,各级领导核心主要控制在军队干部手中。因为王曼恬有特殊的政治背景,军队干部对她另眼相看,遇事也要让她三分。

当年我们查出,王曼恬自1968年3月到1976年10月给江青等人的信件33封、电话记录23份。她的主要问题,就是上述向江青写密信制造了所谓1968年“二二一”事件,后果严重。其次是由于她在中央文化组兼职,经常给天津传些上边的小道消息,特别是1976年她积极鼓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再次就是她对江青以及中央文革的一切指示积极紧跟。当时市委把王曼恬定为“四人帮”死党,并把王作山、张继尧、陈相文列为王曼恬的资产阶级帮派体系,现在看来根据都是不足的。我们评价一个人,不能脱离具体的历史环境。当年几亿人都对毛泽东狂热地崇拜,王曼恬肯定要比别人更多几分愚忠。毛泽东逝世时,我见到她比任何人都要悲痛。说她跟着江青积极参与“评法批儒”,反对周恩来,其实在周逝世的时候,我见到王曼恬也是伤心流泪的。可是在清查中说王曼恬“疯狂地反对我们敬爱的周总理”,显然是“欲加之罪”了。■

(本文作者文化大革命期间在天津市革委会工作,现为天津社会科学院名誉院长)

(责任编辑 杨继绳)

亲历“《解放日报》事件”

○ 赵元三

1966年11月底，发生了震惊全国的“《解放日报》事件”。这个事件是在怎样的大背景下发生的？经过事实与真相如何？

笔者是事件亲历者，事后又做了核实、研究，现忆述于下。

1. 上海红卫兵：要批上海市委的“资反路线”

(1)《红卫战报》：“《解放日报》是市委推行资反路线的工具”

在上海市各界革命造反派和北京来沪各路红卫兵声讨上海市委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同时，上海的红卫兵也被鼓动起来了，他们也要揭露、批判市委的资反路线。在上海各路红卫兵组织中，最大的一个是“红卫兵上海市大专院校革命委员会”（简称“红革会”）。该组织以复旦大学为中心，几乎囊括了华东师范大学、上海师范学院、上海第一、第二医学院等上海各著名高校的红卫兵造反派。主要负责人有复旦大学的学生马立新，还有劳元一等。其他红卫兵造反组织还有同济大学的“东方红”（负责人陈敢峰等），交通大学的“反到底”（负责人严步东等），以及中学系统的“中学红代会”、“中申会”等。

“红革会”和上海红卫兵总司令部合办了一张报纸叫《红卫战报》，对开一大张。办报人都是各高校大学生中的笔杆子。其中有一个人叫吴鸿业，复旦大学新闻系高年级学生，曾来解放日报社实习过。《红卫战报》1966年11月下旬一期即第九期刊登了一篇揭露、批判上海市委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长篇文章。另外，《红卫战报》认为，《解放日报》作为市委机关报，已变成市委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工具。

(2)“红革会”：要求《解放日报》附送《红卫战报》

照中央精神，各地的红卫兵报纸，由各地方的新闻、出版、教育部门负责免费印刷。《红卫战报》是由解放日报社代印的。发行，原来由“红革会”自己负责。

“红革会”于11月27日，向上海市邮政局报刊发行处提出，11月28日出版的《红卫战报》第九期同《解放日报》一起发行。理由：A、因为这一期《红卫战报》刊登了批判上海市委资反路线的重要文章；B、市委应该端正态度，自我消毒，改正错误；C、《解放日报》已成市委推行资反路线的工具，也应该以实际行动改正错误；D、造反报由《解放日报》附送，已有先例——此前，“上海市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简称“红总司”），以批判市委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为理由，要求把他们出版的《革命造反报》，夹在《解放日报》里一起发行。市委欣然同意，并于11月25日照办不误。

就在这时，《红卫战报》第九期60余万份已经印好，“红革会”提出照先例将这期报纸与《解放日报》一起发行。不料，却遭到上海市委、解放日报社党委、邮局的断然拒绝。拒绝的理由是：《革命造反报》与《解放日报》一起发行是“市委没有认真听取邮电局职工和《解放日报》广大读者的意见，贸然同意”，“这种不合理的做法，受到各方面的强烈反对”，“市委主要领导人当场做了检讨”，“邮电部门还就这件事做了检查”；所以，不能再同意《红卫战报》与《解放日报》一起发行了。

“红革会”要求遭拒绝，愤愤不平。他们再找市委领导联系，已联系不上了。找解放日报社党委，党委书记马达已“失踪”，只有一个前不久刚提拔为副总编辑的党委委员王树人在主持日常工作。王树人为人温和，言语不多，说是书记联系不上，他自己没肩膀答应附送。他既不敢说市委不同意，也不敢说报社党委不同意，只是同红卫兵打打太极拳而已。“红革会”眼看着已印好的60多万份第九期《红卫战报》无法发行，逐渐情

绪焦躁不安起来了。

(3) 市委坚拒附送,红卫兵进驻解放日报社

1966年11月29日黄昏,我刚在报社食堂吃过晚饭,有同仁告诉我,报社来了一小批红卫兵,与党委继续交涉附送《红卫战报》的事宜。只见三楼会议室里有十几个红卫兵,大礼堂、总编室门口走动的也有七八个,总共不过二十几个红卫兵。仔细看他们的袖章,大多为“红革会”的,部分为“红总司”的,少数为北京来的。他们是来继续谈判的。报社一方有王树人,以及“文革筹”的负责人,几位支部书记。有两个红卫兵不断走到别的办公室,用电话将谈判情况向“红革会”总部汇报。

我挤入谈判现场旁听,红卫兵反复强调:今天,他们是奉“红革会”总部之命,来落实《红卫战报》随当天《解放日报》一起发行的事。否则,我们将采取进一步的革命措施。谈判一直持续到半夜子时,仍然没有进展和结果。

零点敲过,二十余位红卫兵谈判代表态度突然强硬起来,嗓门也大起来。他们说:你们报社党委必须尽快答应红卫兵的合理要求;否则,我们的忍耐已经到了极限;我们将要采取革命行动与措施,使你们30日的《解放日报》也不能发行。

解放日报社党委代表们听了红卫兵最后一句话,感到压力了。因为《解放日报》的印报车间主体就在底层,若30日印好的《解放日报》当天发送不出去,就要出大事情了。上海《解放日报》自1949年5月创刊以来,没有一天停止出版或发行过。如果有一天人为地中止出版或发行,就是一个严重的政治事件。这样的事件一旦发生,责任由谁来负呢?

报社党委谈判代表一面继续与红卫兵谈判代表周旋,一边派人溜到有直线和红机(保密机)的房间,与马达秘密联系。马达感到事态严重了,在秘密地点又向市委第一书记陈丕显做了汇报。陈丕显与曹荻秋商议后,叫秘书避开中央文革小组,向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陶铸做了请示。一个月后就被毛泽东、周恩来赶下台去的陶铸指示:“群众组织的报纸与党报是两种不同性质的报纸,这是个原则问题,要顶住。《解放日报》就是停刊一个月,也不能同《红卫战报》一起发行”。陈、曹坚决地执行了陶铸指示。

30日凌晨一时,陶铸的指示,陈、曹的意旨,

通过马达传达到报社党委谈判代表耳中。党委坚决地回绝了红卫兵的要求,谈判到此宣告结束。报社内气氛一下子紧张起来。空气里弥漫着一种神秘莫测、将要发生大地震的味道。

30日凌晨一时半,一队红卫兵,约五十余人,排着整齐行列,由汉口路274号报社大门进入。进入报社后,把印报车间大门,沿马路的发报间门洞、供卡车进出的弄堂的大门封锁起来。这样,即将开机印刷的11月30日的《解放日报》就不能装上邮车,也不能运送到市内、市外去了。

30日清晨四时许,我感到今夜不能睡觉了。我到食堂去买了一碗稀粥、两个馒头、一碟酱菜。囫囵吞下后,即跑到274号大门外去。见大门东首发报间有一辆绿色邮车,在等待后知道无法装成捆报纸了,即无奈地开走了。五分钟之后,又开来另一辆邮车,同样被红卫兵告知:今天有特殊情况,不能发报,又无奈地开走了。

30日清晨六时报社周围出现一些察看情况的稀疏的人群。有些像公安文保便装人员,也有一些别着“工人赤卫队”、“工人造反派”袖章的人。这些人都在四外逡巡,察看动静。

30日清晨八时,进入报社的一批红卫兵,约有20余人,他们用过早餐后,接替了夜里封锁发报间的红卫兵。夜里封锁发报间的红卫兵分批用过早点后,陆续到报社编辑部、工管部大楼走廊去看大字报,有些人还把其中一些抄下来。

(4) “我们要看《解放日报》”和“我们要保卫党报”

30日上午九时,报社日班职工600多人上班到齐,纷纷相告昨夜今晨报社内发生的事变。有的惊讶,有的默然,有的气愤,有的深思,有更多的人拿起电话,把消息传给社外的亲朋好友,或有关方面。还有社内的红卫兵也不断同总部、外界联系。解放日报社内部的事变很快就传遍了全上海的党政机关、新闻单位、各群众组织。报社周围马路上围观的人越来越多了。各种政治倾向的人物和群众组织都把触角伸到汉口路274号的围墙内外来了。

最令人注目的是号称有80万队员的“上海工人赤卫队”,在解放日报社周围出现了。“上海工人赤卫队”,我们上面介绍过,是市委一、二把手陈丕显、曹荻秋支持下成立的一个工人群众组

织。他们的政治倾向是保卫上海市委。当时被称为“保皇派”。在不久后发生的“康平路事件”中就有最突出的亮相。

从11月30日起至12月2日，报社四周围观的群众越来越多，工人赤卫队的人也越来越多。工人赤卫队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在报社周围建筑物上装了十几个高音喇叭，日夜轮番广播宣传他们的观点，或高呼口号，或向报社内的“红革会”红卫兵和“工总司”属下的工人造反队进行喊话、策反、劝降。大喊大叫“我们要看《解放日报》！”、“我们要保卫《解放日报》！”、“我们要保卫党报！”的口号。寓意是你们必须从解放日报社内撤出来，否则我们要攻进去把你们赶出来！后来就干脆直喊：“你们必须从解放日报社内撤出来，不要影响党报编报、印刷、发行！”有的还喊：“你们必须尽快从里面撤出来，否则后果自负！”

报社内部当时被称为“保皇派”的骨干人物，多次乘社内红卫兵不备，向社外的工人赤卫队打手势示意，甚至喊话，要他们攻进报社来。12月1日下午一时，汉口路286号报社侧门曾一度被冲破，涌进数十名赤卫队员。

2. 红卫兵争取内外援军

陆续进驻解放日报社内部的“红革会”红卫兵，总共只有一二百名，“工总司”进来的工人造反队员只有一二十名。他们的处境十分艰难与危险：外有成千上万的工人赤卫队员包围，他们随时都有冲进来的可能；内有跟解放日报社党委跑的一批骨干人员，他们坚决反对红卫兵进入报社，不断给红卫兵出难题，设障碍，甚至利用报社内工人对付红卫兵，特别是想开门迎接赤卫队员入内把红卫兵强行逐出报社。一场攻守之战、流血冲突，随时都有可能发生。

红卫兵亟须内外两重力量支援，才能坚守下来，以实现他们的目的。

（1）解放日报社造反派宣布“支持红卫兵的革命行动”

红卫兵试图同解放日报社革命造反派联系，以争取他们的支持。30日上午，“解放日报革命造反联合司令部”领导机构“中心组”召集会议，听取了各方面的汇报，研究了局势，做出了支持

红卫兵的决议。我是“中心组”成员，参加了会议。会议决议：红卫兵批判上海市委、解放日报社党委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方向是正确的；要求将《红卫战报》第九期与《解放日报》一起发行是合情合理的；工人赤卫队包围报社、围攻红卫兵是错误的，是市委挑动群众斗群众；解放日报社“革命造反联合司令部”坚决支持红卫兵的革命行动。以上决议以《四点声明》的形式，在报社内部用大字报公布，又排成铅字、手工印成小传单数百份，向报社内外群众中散发，立即受到红卫兵的热烈欢迎。

（2）解放日报社冒出“红色造反兵团”和“工人赤卫队”

解放日报社党委背后有陈、曹的支持，陈、曹之背后还有陶铸的支持。他们支使一些紧跟党委的骨干分子，以编辑部为主体，成立了“解放日报红色造反兵团”；以工厂部为主体，成立了“解放日报工人赤卫队”。二者分别与“解放日报革命造反联合司令部”和“解放日报工人革命造反大队”相对抗。他们的直接目的是将红卫兵从报社内部驱逐出去。

报社的“红色造反兵团”和“工人赤卫队”以“报社革命职工”名义发出一个“最最紧急呼吁”，要求红卫兵三条：“一、非解放日报社职工立即撤出报社；二、《红卫战报》发行办法再继续协商；三、在没有达成一致协议前，《解放日报》可以迟几天发行。”红卫兵对此不予理睬。

（3）“工总司”和红卫兵增援“红革会”

从11月30日早晨八时起，不断有小股“红革会”红卫兵和“工总司”属下的工人造反队员进入报社。但数量不多。当获悉赤卫队总部准备发起内外结合的总攻时，“工总司”和“红革会”实施了一次大规模的增援行动。

12月2日深夜至3日凌晨，“工总司”调来大批工人造反队员，还有“首都三司”、“清华井冈山”、“红三司”、“同济东方红”、“交大反到底”等京沪红卫兵造反组织，约有五六百人，冲破赤卫队的薄弱的封锁线，进入报社。报社内的红卫兵和工人造反队员总数激增增至1000余人，超过了解放日报社全体职工的数量。这就使报社食堂的伙食供应增加了一倍多的任务。再加大楼被封锁进出，蔬菜运不进，所以，除保证每人每天三顿

米、面主食外，八天九夜的蔬菜很少，只好以咸鱼唱主角了。

增援部队进来后，和报社内先进来的红卫兵和工人造反队员一起，成立守卫报社的指挥机构，叫“火线指挥部”。“火线指挥部”指示，不仅对报社外面围攻的工人赤卫队采取针锋相对的强硬措施，而且对报社内部企图阻止、破坏防卫的行为，派人严密监视，一经发现，严肃处理。早在前两天，已有三个紧跟党委的人物被他们盯上了。一个是夜班编辑部的支部书记丁××，红卫兵说他挑动群众斗群众，同他辩论了几个小时。文艺部编辑王××，对报社外面围攻的人群说：“同志们，我是解放日报社的，我欢迎你们上来！”红卫兵指出他挑动外面群众进来“群众斗群众”，同他辩论了半天加一个晚上。还有一个编辑史×，拿了手提喇叭到党委办公室窗口向围攻的人群喊话，红卫兵说他煽动群众冲击大楼，在夜里开会对他批判。

（4）激烈的攻守之战

“《解放日报》事件”历时八天九夜。从外到里、从里至外，从形式到内容，可归结为四个字：攻守之战。

外面的赤卫队和一部分群众，要攻进汉口路274号和286号两座连体大楼，把占据大楼的红卫兵和工人造反队员赶出去，恢复《解放日报》的发行。而大楼里的“火线指挥部”则是指挥红卫兵和工人造反队员守住大楼队，阻止《解放日报》发行，直至市委答应要求为止。

外面想从哪些途径攻进来呢？一是门，二是窗，三是顶。里面则针锋相对，守门、守窗、守顶。门有五个：274号门，286号门，发报间的门，发报间门与274号门之间有一个供大卡车进出的弄堂门，还有286号的后门。这些门，在11月30日红卫兵进驻当日就都防守起来了。但防守不严。12月1日中午一点钟左右，286号门一度被冲开，人群直往里涌，朝楼梯上冲。好不容易才重新封堵起来，并把冲进来的人劝说或推了出去。2日，又发生赤卫队用卡车上的又厚又重的跳板冲击274号门的激烈的攻防之战。工人造反队用竹竿从二楼窗口反击进攻者，迫使他们中止了攻门行动。“火线指挥部”总结了两天的教训，加固门防的工事，把防汛用的器材翻出来，加固门防。有

很厚的木板、顶梁柱，还有沙袋。另外，还预防万一人群冲进来，开启消防龙头去冲进入者。窗的攻守战，主要在二层和三层窗口展开。工人赤卫队多次用长梯架到报社汉口路朝南房间的窗口，试图破窗而入。有两次，红卫兵把长梯推翻，使长梯带人倒向马路南侧去了。工人赤卫队用的武器是多种多样的，铁棍、木棒、铁锹、杠棒等等。而楼内红卫兵的武器则是工人撬滚筒纸（新闻纸）用的带小弯的铁棒，还有一些钢筋、铁条，再就是各办公室都有的扫帚了。新来的工人造反队员中有几个是复员军人，他们经过军事训练，有些战斗知识。他们提出要控制制高点——楼顶。286号楼顶有一个100多平方米的平台，他们说这里必须日夜设观察哨，观察大楼四周、马路动静，特别是要注意从其他民房向报社大楼发起的偷袭或进攻。因为报社大楼西、北两面都是同民房相连的。

攻守之战，每天都有发生，只是规模大小不同而已。十几个高音喇叭不停地喊叫，使人心烦意乱。“红革会”和工人造反队几次在半夜里冲出大楼，偷拆、强拆高音喇叭。如交电公司的喇叭被拆走了十多个。

八天九夜的攻守之战有没有伤亡？亡，绝对没有。伤，有的。但没有见过现场统计。解放日报社保守组织“红色造反兵团”的传单中有这样的话：“许多群众被他们击破头，打伤了鼻子、眼睛，有的被打得昏迷过去。前来拉救受伤者的救护车日有数起。”

大楼里增员到1000余人后，办公室已变成熙熙攘攘的闹市。大楼四外的马路上围观群众已达日均三四万人。

上海市民的舆论已达到沸点了。上海的第一号报纸——市委机关报，居然四、五天见不着面了，这是17年来闻所未闻的特大新闻！党报怎么样了？上海市党委怎么样了？

3. 韩哲一、李干城到报社劝和

（1）“火线指挥部”坚持要市委出面谈判

从11月29日夜开始，三天三夜过去了，红卫兵不仅没见到任何市委负责人，甚至连报社党委负责人马达的面也没有见到。“火线指挥部”认为，报社党委已无权代表任何人谈判了，必须由

《解放日报》的主管机关——中共中央华东局和中共上海市委派来代表到报社谈判。

直等到12月2日晚，中共中共华东局第三书记韩哲一、上海市副市长李干城和市委宣传部副部长蒋文焕来到报社。他们的车子在离解放日报社不远的马路上停下，由保卫人员护卫下，穿过人山人海，走到汉口路286号后门。后门也是封死的，但在门的中部挖了一个洞，足可供一个人进出。韩哲一等一行人就是从这个门洞中进入解放日报社的。

(2) 韩、李以劝为守，不答应红卫兵要求

韩哲一等一行到报社来，与其说是谈判，不如说是劝说。“谈判”者，双方都准备好、带来条件。火线指挥部一方的主要条件是明摆着的——就是要《解放日报》附送第九期《红卫战报》。但韩哲一等一行恰恰没有带来同意这个条件的市委意旨。韩等三人对“火线指挥部”的条件既不敢否定，也不敢答应，只是劝说你们先撤离《解放日报》再继续谈。韩哲一谈了一天一夜，说身体不适，先行退去。李干城与蒋文焕又续谈了一天，也无果而离去。总的来说，还是和平谈判，文明谈判。当时的谈判都做了录音。

4. 中央文革的指示

“《解放日报》事件”发生后，情况通过各种渠道迅速传到北京中南海，立即引起中央的关注。这些渠道中，非官方的北京来沪红卫兵，《解放军报》来沪记者等，起了重要作用。这些渠道上报的情况，同市委上报中央的情况，立场、观点大相径庭。他们认为：《红卫战报》批评市委的资反路线、批评解放日报社执行了市委的资反路线，大方向是正确的；红卫兵要求《红卫战报》与《解放日报》一起发行是合理要求；而市委拒绝红卫兵要求，怂恿赤卫队围攻红卫兵，是推行资反路线，势必引起大规模的群众斗群众。

中央文革小组经过六天对事态的观察，对各方面情况的分析，得出结论：上海“红革会”等红卫兵组织通过《红卫战报》批判上海市委、解放日报社党委的“资反路线”，大方向是革命的、正确的；红卫兵要求《解放日报》附送《红卫战报》是合理的；“《解放日报》事件”是因市委拒绝红卫兵合

理要求而引起的；红卫兵进驻解放日报社的行动是革命行动。

12月5日晚，中央文革小组向中共上海市委发出指示：申明以上意见，并责成上海市委，端正态度，不要同红卫兵和上海工人造反派对立，要答应他们的革命要求，支持他们的革命行动，动员包围报社的群众组织撤离，进驻报社的红卫兵和工人造反派自然也会撤离。

当晚，上海市委研究了中央文革小组的指示，认为应当执行中央文革小组的指示，停止执行陶铸以前的指示，否则后果不堪设想。当即派出市委书记处书记王一平、市委常委宋季文，赶到解放日报社，同“火线指挥部”进行谈判。这是一次真正的谈判。“红革会”以《三项决议》的形式表述了自己的要求。“工总司”则以《四项要求》的形式表示了自己的条件。王一平、宋季文分别、联名在这两个文件上签字，并写上“同意”。这就算答应了红卫兵与工人造反派的“革命要求”，“《解放日报》事件”终于走上了解决问题的途径。

“三项决议”包括：“《红卫战报》第九期与《解放日报》同时发行，发到每个订户（包括零售户）；‘允许我们查阅有关文化大革命中的社论底稿和其他材料、指示等等’”。“四项要求”第二项：“市委必须责成有关方面采取有效措施，使其他群众组织不要干涉革命造反派组织的革命行动。如果干涉革命造反派的行动，我们将坚决采取必要措施。”第三项“‘《解放日报》事件’产生的一切严重后果，由上海市委负责。事后，上海市委必须向我们革命造反派做公开检查。”

5. 外兵撤离

1966年12月7日，《解放日报》恢复发行。八天的《解放日报》陆续送到读者手中。《红卫战报》第九期也随报附送到读者手中。

9日清晨，进驻解放日报社内的各个革命造反组织，包括“红革会”、“工总司”，以及“首都三司”、“清华井冈山”、“红三司”、“同济东方红”等撤离解放日报社。■

（作者为解放日报原编辑）

（责任编辑 杨继绳）

“打倒阎王，解放小鬼”时的感受

○ 郝怀明

1966年2月，一边是彭真他们在起草《汇报提纲》，通称《二月提纲》，一边是毛泽东导演江青主演炮制《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可谓针锋相对。4月10日，《纪要》以中央文件名义发出。中共中央的批语盛赞《纪要》说：“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是一个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座谈会。经过毛主席三次亲自修改的座谈会纪要，对当前文艺战线上阶级斗争的许多根本问题，作了正确的分析，提出了正确的方针、政策，是一个很好的、很重要的文件。”表示“中央完全同意这个文件。它不仅适合于军队，也适合于地方，适合于整个文艺战线。”

《纪要》中最具震撼力的是这样两段话，这样两段一反常态与客观事实完全不符的话。

一段是：

毛主席的前三篇著作（笔者注：即《新民主主义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看了〈逼上梁山〉以后写给延安平剧院的信》）发表到现在已经二十几年了，后两篇（笔者注：即《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也已经发表近十年了。但是，文艺界在建国后的十五年来，却基本上没有执行，被一条与毛主席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黑线专了我们的政，这条黑线就是资产阶级的文艺思想、现代修正主义的文艺思想和所谓三十年代的文艺的结合。“写真实”论、“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论、“现实主义的深化”论、反“题材决定”论、“中间人物”论、反“火药味”论、“时代精神汇合”论，等等，就是他们的代表性论点，而这些论点，大抵都是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早已批判过的。电影界还有人提出所谓“离经叛道”论，就是离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之经，叛人民革命战争之道。在这股资产阶级、现代修正主义文艺思想逆流的影响或控制下，十几年来，真正歌颂工农兵的英雄人物，为工农兵服务的好的或者基本

上好的作品也有，但是不多；不少是中间状态的作品；还有一批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毒草。我们一定要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坚决进行一场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大革命，彻底搞掉这条黑线。搞掉这条黑线之后，还会有将来的黑线，还得再斗争。所以，这是一场艰巨、复杂、长期的斗争，要经过几十年甚至几百年的努力。这是关系到我国革命前途的大事，也是关系到世界革命前途的大事。

一段是：

要破除对所谓三十年代文艺的迷信。那时，左翼文艺运动政治上是王明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组织上是关门主义和宗派主义，文艺思想实际上是俄国资产阶级文艺评论家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以及戏剧方面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思想，他们是俄国沙皇时代民主主义者，他们的思想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是资产阶级思想。……三十年代也有好的，那就是以鲁迅为首的战斗的左翼文艺运动。到了三十年代后期，那时左翼的某些领导人在王明右倾投降主义路线的影响下，背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观点，提出了“国防文学”的口号。这个口号，就是资产阶级的口号，而“民族革命战线的大众文学”这个无产阶级的口号，却是鲁迅提出的。有些左翼文艺工作者，特别是鲁迅，也提出了文艺要为工农服务和工农自己创作文艺的口号，但是并没有系统地解决文艺同工农兵相结合这个根本问题，绝大多数还是资产阶级民族民主主义者，有些人民主革命这一关就没有过去，有些人没有过好社会主义这一关（文中的粗体字为毛泽东修改时所加）。

毛泽东对周扬历来十分器重。早在1945年党的七大时，他就对周扬说，这次你就不进中委了，现在是打仗，部队的同志要多进一些。1956年党的八大上，毛泽东亲自出马，在会上为周扬说项。他说，大家都知道梅兰芳，咱们党内的梅兰

芳就是周扬。周扬当选为八大中央候补委员。现在呢？却把他说成是一个“专了我们的政”的“与毛主席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黑线”的大坏蛋了。

此时，周扬因患肺癌切掉一叶肺，正在外地疗养。当他得知《纪要》的内容后，感到大惑不解。他非常清楚，自己一向对毛泽东十分崇敬甚至达到了崇拜的地步，从延安以来，直到建国以后这些年中，自己一直是在党中央、毛主席、周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的领导下工作，自己写的一些有影响的文章，都是经毛泽东看过甚至改过的，工作中有缺点有错误，检查改正就是了，但说自己反对毛主席，反党反社会主义，执行的是一条“与毛主席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这是不可能的嘛！

在文艺处工作多年的“笔杆子”李曙光（黎之）的感觉是紧张、震惊、不解和反感。他在回忆中写道：“被专政的‘我们’指哪些人？部队、党中央、毛主席？整个党被专了政，这问题太大了。在堂堂党中央、毛主席的领导下，竟然有一条黑线专了‘我们的政’。这有点接近局部政变了，这怎能不令人紧张、震惊。”“当时我想，执行毛泽东文艺路线中的错误，周扬当然是主要负责人。但是，纵使周扬有三头六臂，他也无法专了‘我们’的政。这专政者到底是谁呢？！只记得江青曾经说过，文艺的一些问题，不好批，一批往往批到总理头上。《纪要》放手来批了，批谁呢？！不敢深想。”（黎之：《文坛风云录》，河南人民出版社，第485、486页）“文革”中几次三番试图搬倒周恩来，看来并非事出偶然。

我对《纪要》中的许多说法当时也疑惑不解。作为一个大学中文系的学生，毕业后曾经从事过中国现代文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周扬的许多著作，我都认真读过并奉为工作的指针。在我的心目中，周扬就是党在思想文化战线的代言人，是毛泽东文艺路线的忠实的、创造性的阐发者和执行者，是党在文艺战线威望很高的领导人，是我们许多年轻人崇拜的理论权威。现在，突然间，周扬却成了“专了我们的政”的“与毛主席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的“总代表”，我真有五雷轰顶之感，思想上一下怎么也转不过这个弯来。至于说这条“黑线专了我们的政”，我就

更不明白了，这怎么可能呢？上有党中央、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有那么多的高级党政领导干部、共产党员，政权在我们党的手里，即使真的有那样一条“黑线”，那也不大可能让它“专了我们的政”呀？早就把它给打掉了。就拿所举的“黑八论”来说吧，无论哪一条，不是当时就被批判过吗？怎么能说“专了我们的政”呢？这是不是有点危言耸听呢？至于30年代“两个口号”的论争，那已是几十年前的事情了，鲁迅当年就说过两个口号可以并存，茅盾也说过两个口号非对立而为相辅，周扬后来也一再检讨自己那时年轻，对鲁迅的伟大认识不够，许多事情处理得不好，两个口号都有它的优点，也有它的缺点，应该互相配合，互相补充，不应互相反对，互相攻击。这段历史早已过去了，按说也已大体取得了共识，怎么现在又翻腾出来，说周扬提出“国防文学”的口号是资产阶级的口号，是王明“右倾投降主义路线”的产物，这样一来，把大家在这个问题上已经形成的共识又给颠覆了。这两个问题，是文件的核心之点，我的思想认识确实跟不大上，想不太通。我不敢再去多想，再想那就更跟不上了；更不能随便去说，一说那就有“反党”的危险了。好在我不在文艺处工作，没有这方面的揭发和批判的任务，无须我瞎积极。

从2月3日至4月5日，《解放军报》连续发表了7篇专论“突出政治”的社论，在毛泽东支持下，林彪在全军全党全国刮起了一股“突出政治”风，为极“左”思潮推波助澜。部里印发了部分专论，让大家学习。过去几年中我们一直在讲“政治和经济的统一”，“政治和业务的统一”，这些正确原则，现在都受到了批判和否定。我怎么也想不通，但又不敢说。

毛泽东对中宣部的批判，《纪要》的出笼，中宣部的厄运已然注定，但领导上还是力求努力跟上。此时，对吴晗进行政治诬陷的文章，戚本禹的《〈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的反动实质》，关锋、林杰的《〈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两株大毒草》已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红旗》杂志发表，“左派”们风光无限。4月18日，《解放军报》发表社论《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积极参加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全国转播，各报转载，全面公布了《纪要》的观点和内

容，号召批判所谓“文艺黑线”。北京市委也跟风而上，以示积极，在《北京日报》上加上《北京日报》、《前线》杂志的编者按语，以三个版的篇幅发表了吴晗、邓拓、廖沫沙的材料。但很快，中央书记处就下令首都各报不得转载，说北京市委毫无自我批评精神。在中宣部，就我接触到的而言，也有一件小事，就是秘书长童大林把我们教育处几个年轻同志找去，出了几个题目，要我们分别写点文章，批判吴晗等人的教育思想。童大林从1960年以来一直协助陆定一进行教育试验，创办了北京景山学校，对教育很有研究。我们几个写好后交给了他，由他送《北京日报》。结果一篇也没有发表，几个月后全给退了回来。“阎王殿”罪孽深重，已处于被告席，也不想自己是什么单位的人，属于哪个“司令部”的，还想发表文章批吴晗和“三家村”，给“阎王殿”涂脂抹粉！不发也好，这倒使我们减少了一次胡批乱批的错误。

4月9日至12日，中央书记处开会，康生传达了毛泽东3月底在上海的谈话，批评了彭真、陆定一，决定起草一个撤销、批判《二月提纲》的党内通知，还决定成立文化革命文件起草小组，直到这时，毛泽东才走出“秘密”状态，他的观点才为第一线工作的中央领导集体所了解。4月2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基本通过由康生、陈伯达主持起草，经毛泽东7次修改定稿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并决定提交即将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通过。

5月4日至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北京召开。前几天的会议，陆定一被排除在外，没有参加。鉴于中央正在处理他的夫人严慰冰给林彪、叶群写匿名信的问题，他应该避开。周恩来也对他讲，最好到外地去，时间越长越好。他从3月6日离开北京，在上海呆了一天，即赴江西，在那里呆了很长时间，重点考察了江西劳动大学，上了革命故地井冈山，然后来到安徽。此时他正在合肥。

陆定一在南昌的时候，就看到了那个《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他觉得，“这个《纪要》打得是‘部队文艺工作’的幌子，实际上却要管全党全国的文艺工作。自己长期以来就是意识形态、文化教育领域的领导人，去年1月以来又接替沈

雁冰兼任文化部部长，如果说文艺界被一条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政，自己就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这一次可能在劫难逃了。他不知道这个《纪要》产生的背景和经过，但有一点他是很清楚的：这个《纪要》和《二月提纲》是针锋相对的、分庭抗礼的。”“陆定一深感问题的严重，他立即写信给中宣部副部长张子意和许立群，要求在中宣部开展批评，首先是对他自己进行批评，愈尖锐愈好，并请他们把批评意见转告他。”（陈清泉 宋广渭著：《陆定一传》，中共党史出版社，第493~494页）

4月30日，公安部副部长杨奇清和张子意受党中央之命前来合肥向陆定一传达：他的夫人严慰冰是“反革命分子”，已于4月28日被逮捕，并向他宣布了五条必须遵守的纪律，要他不要将此事泄露，不与严家的人来往，在外地逗留得久些，不要立即回京。

5月6日，杨奇清、张子意离开合肥没几天，陆定一突然接到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打来的电话，根据毛泽东的意见，让他立即回京参加政治局扩大会议。

5月8日，陆定一乘坐特地派来接他的飞机回到北京。令他没有想到的是，他已不能回到他多年的居所中南海增福堂，而是住进了一个新的住处：宣武门附近的安儿胡同1号。那里还住有一个班的战士，戒备森严。他立刻明白：自己被软禁了。

此次随同陆定一出行的中宣部教育处徐汝京2007年9月9日在谈到当年情况时，曾对笔者这样说：“名义上是让陆定一到南方去休养，实际上是不让他参加中央的会议。这次出去，陆定一经常同我们一起散步，谈笑话，聊天，后来就闷闷不乐了。在合肥，有一天，红机子（保密电话）响了一个晚上，总理与他通了话。气氛很紧张，陆定一彻夜未眠。第二天，一天闷闷不乐。平时我们下棋，他不下，就站在旁边看。这天，他呆在屋子里不出来。我问陆定一怎么样啊？有位同志回答：有心事。我猜疑说：是不是要打仗啦？大约在‘五一’前，杨奇清来到合肥，陆的警卫员也换了，原来的警卫员带走了。杨对我们说，你们的任务已经完成了，可以回去了。当天我就和一位同志先回京了，比陆定一早回来几天。陆定一回来下飞机就被软禁了。”

陆定一回京后过了一两天，就接到中央办公厅的通知，让他参加正在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对于会议的情况，笔者这样的小干部当时当然是一无所知。看到5月8日的《解放军报》上发表了“高炬”的文章《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开火》，《光明日报》上发表了“何明”的文章《擦亮眼睛，辨别真伪》，“何明”就是关锋，“高炬”是谁呢？当时听说是江青，后来知道不是。当时只觉得文章火药味十足，口气很大，气氛是越来越紧张了。

5月19日，部里印发了这次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简称《五一六通知》）及其附件《一九六五年九月到一九六六年五月文化战线两条道路斗争大事记》，这时，我们才知道了一点这次会议的内容，知道了毛泽东关于“中宣部是阎王殿”，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的指示。中宣部怎么一下子就成了“阎王殿”了？陆定一成了“大阎王”了？就像在我们头上爆炸了一颗原子弹！

《通知》宣布：中央决定撤销1966年2月12日批转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撤销原来的“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及其办事机构，重新设立文化革命小组，隶属于政治局常委之下。《通知》对《二月提纲》进行了尖锐的批判，说它是“反对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反对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的文化革命路线，打击无产阶级左派，包庇资产阶级右派，为资产阶级复辟作舆论准备。”《通知》说：“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

“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的“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是谁呢？我也猜想，但想不出。敌情太严重了，太可怕了！我没有也不敢更多去想。

这次会议还决定停止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的中央书记处书记职务，撤销彭真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和市长职务，撤销陆定一中央宣传部

部长职务，调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任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兼中央宣传部部长。

5月24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陆定一同志和杨尚昆同志错误问题的说明》。同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决定成立审查委员会，对彭、罗、陆、杨进行专案审查。《说明》对陆定一的所谓“错误”，讲了三个方面：陆的妻子严慰冰是“现行反革命分子”，她写匿名信攻击和辱骂林彪及其一家，陆同她有“密切牵连”；陆“猖狂地反对毛泽东思想”，把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骂成是“实用主义”、“庸俗化”、“简单化”，大反斯大林，大反教条主义，同党中央、毛主席唱对台戏；陆在文化革命的问题上同彭真完全一致，垄断中宣部的工作，打击左派，包庇右派，替资本主义复辟制造舆论。“文革”中对陆定一的揭批，大体就是围绕着这几个方面进行的。

会上怎么批判陆定一的，他怎么检查的，讲了些什么，当时我和部内绝大多数同志一点也不了解。大约两个月后，我们看到了林彪在这次会上的讲话，即那个有名的大念“政变经”的“5·18讲话”。他在这篇讲话中捕风捉影、凭空诬陷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要搞“反革命政变”。他说：“最近有很多鬼事，鬼现象，要引起注意。可能发生反革命政变，要杀人，要篡夺政权。要搞资产阶级复辟，要把社会主义这一套搞掉。有很多现象，很多材料，我在这里不去详细说了。你们经过反罗瑞卿、反彭真、反陆定一和他的老婆，反杨尚昆，可以嗅到一点味道，火药的味道。”“他们现在就想杀人，用种种手法杀人。陆定一就是一个，陆定一的老婆就是一个。……罗瑞卿就是一个。彭真手段比他们更隐蔽更狡猾。”他的名言是“有了政权……就有了一切。没有政权，就丧失一切。”“永远不要忘记了政权。要念念不忘政权。”“我想用自己的习惯语言，政权就是镇压之权。”显然，在林彪看来，严慰冰的那封匿名信，是最触动他的“阶级仇恨”那根神经的了。

关于严慰冰写匿名信的具体内容，在中宣部“文革”中，一点也没有透露过，大家一概不知，直到“文革”结束多年以后，才从有关文章著述中知道，不过是个个人生活方面的问题，也了解到在这次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那荒诞的一幕。那天，陆定一在会上检讨，会前，每个席位上放了一张林

彪手迹的复印件，字有核桃大，内容是这样的：

我证明：

（一）叶群在和我结婚时，是纯洁的处女，婚后一贯正派；

（二）叶群和王实味根本没有恋爱过；

（三）老虎、豆豆是我与叶群的亲生子女；

（四）严慰冰的反革命信，所谈的一切全是造谣。

林彪

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四日

在如此庄严的会议上，竟然发了“处女证明书”这样的东西，亦可谓天下奇闻、今古奇观了。就在那次政治局会议上，林彪质问陆定一：“你跟你老婆勾结在一起，用写匿名信的办法，长期诬陷叶群同志和我的全家，目的是什么？讲清楚！”陆定一回答说：“严慰冰写匿名信，我不知道，她既没有跟我商量过，也没有给我看过，我本人也没有发现。”林彪猛地拍桌子吼道：“你不老实！你老婆的事，你会不知道？！”陆定一平静地对答：“丈夫不知道老婆的事，不是很多吗？”林彪听出了他的言外之意，顿时恼羞成怒、暴跳如雷：“我今天要是带手枪来，一枪崩死你！”

陆定一在会上受到猛烈的批判，他的辩解被打断，情急之中只能高呼：“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以此抗争。

许立群、林默涵列席了这次政治局扩大会议。许的感觉是“会上气氛很恐怖”。林的感觉是林彪的讲话“充满一股杀气”，他的那个“处女证明”“真是丑不堪闻！”

严慰冰的匿名信，反对的是叶群，讲的是生活问题，根本说不上是“反革命”，且同陆定一无关，更不能构成陆定一的“罪行”。对于严的匿名信的内容，在中宣部“文革”中始终一个字的实情都没有透露过，只是一味臭骂狠批其“极其恶毒”。政治斗争暗箱操作，群众的知情权被剥夺，只能跟着“上面”的意图瞎批胡斗。

5月2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名单的通知，说中央决定成立中央文化革命小组，隶属于中央政治局常委领导下。组长：陈伯达，顾问：康生，副组长：江青、王任重、刘志坚、张春桥，组员：谢镗忠、尹达、王力、关锋、戚本禹、穆欣、姚文元。华北、东北、西北、西南四大行政区

参加的成员（四人）确定后另行通知。成立隶属于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的中央文革小组，实际上是剥夺了中央政治局、中央书记处领导“文化大革命”的权力。

毛泽东钦定中宣部是“阎王殿”，陆定一、周扬等都成了要“打倒”的“阎王”，这一切来得如此突然，如此猛烈，一下子把中宣部许多干部给打懵了。“忽喇喇似大厦倾，昏惨惨似灯将尽。”不同阶层的人们怀着各种不同的心态等待着这场特大的狂风暴雨的来临。“阎王”们惴惴不安，他们不明白毛泽东为什么要这样对待中宣部，这样对待他们，这样做会带来什么后果，但他们又不能起而反抗，面对灭顶之灾，只能听任命运的摆布。许多中层以上干部也直感大难临头了。李佩珊生前曾对笔者回忆说，当时在武清县搞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中宣部的同志听到《五一六通知》传达，毛主席说“中宣部是阎王殿”时，干部处处长赵进（他曾是党的七大代表）在发言时不禁失声哭了起来，他们几位中层干部也跟着流下了眼泪。他们想不通，陆定一、周扬，几十年来一直是党中央意识形态方面的最高指挥官，毛主席的路线的忠实执行者，怎么一下子就成了“阎王”？他们这一层干部几十年来跟着部长们兢兢业业地为党工作，他们不知道中宣部究竟干了什么坏事，不知道等待着自己的将是怎样的命运，看看再说吧。还有一些人，或者因为过去在这个或那个问题上同领导有分歧，受到排挤、打击，未受重用，感到怀才不遇，或者“胸怀大志”，意有所图，现在机会来了，出头之日到了。他们在观察，蓄势待发，准备行动了。对于刚刚调进中宣部不久的许多年轻干部、大学生，以及机关事务管理处的基层干部、工人来说，他们自认为当属被“解放”的“小鬼”之列。他们涉世不深，没有粘上多少“阎王殿”的“鬼”气，他们要造反，要自己解放自己了。

5月30日晚，中宣部收发室7位同志，他们多为复员转业军人，贴出第一张大字报，向“阎王殿”开火了。在“文革”中冲锋陷阵的《红旗》杂志社的同志立即贴出大字报，欢呼收发室同志的革命行动，予以坚决支持，煽动中宣部的“小鬼”起来造“阎王殿”的反。从此，“阎王殿”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了。■

（责任编辑 徐庆全）

我采访了波尔布特

。 谢文清



波尔布特(1928~1998)

1974年2月间,我被任命为中国新闻代表团团长,率领一个由八人组成的新闻代表团访问战乱中的柬埔寨。代表团中有《人民日报》、《解放军报》、新闻纪录电影厂等单位的记者。副团长是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的黄群同志。当时,越南战争已到决战阶段,西贡的阮文绍政权已岌岌可危。美国举国上下反战情绪十分强烈。柬埔寨的金边朗诺政权同西贡政权是同病相怜,都是风雨飘摇,惶惶不可终日。我们是柬埔寨游击队“红色高棉”接待的第一个外国新闻代表团。我们先乘飞机到河内,然后沿“胡志明小道”经老挝进入柬埔寨解放区。这是一次比较危险同时也比较有趣的访问,因为“红色高棉”当时已控制了柬埔寨80%左右的地区,朗诺政权只控制着几个大城市。除我们之外,任何外国记者都不许进入“红色高棉”地区。我们的车队由四辆北京吉普车组成,一律夜行晓宿。因为敌人飞机扫射、轰炸还相当频繁,我们只有夜间在热带丛林中闭着车灯在黑暗中摸索着行进,车速十分缓慢,所谓“胡志明小道”根本就没有道路,有的只是游击队员斧劈刀砍出来的坑洼不平的泥泞烂洼之“路”!司机因在黑夜中行车,所以眼睛视力损坏十分严重。据说,20多岁的小青年驾上几年车视力就大都被损害了。

我们在游击区同游击队共同生活了两个多月,访问了前线和后方。其实,全国都是前线,因为游击队随时随地都可能同敌遭遇。相对来说,那时柬埔寨北方地区已全部在“红色高棉”,控制之下,没有什么战斗了。但在西、南部地区战斗还比较频繁。我们拍了电影纪录片,写了一本小书,拍了一批战地照片。“红色高棉”的主要领导人波尔布特、乔森潘、宋成、英萨利等都会见了我们,我们是波尔布特接见的第一批外国记者。此人十分健谈,中等身材、满面红光,看上去十分健壮,约摸50岁左右。在距金边不远一个椰林中同我们谈了五六个小时。当时已是4月天气,已经十分炎热。波尔布特就光着上身同我们交谈。我们

也来个礼尚往来,索性也脱掉上衣和背心,光着脊梁,宾主都像赤膊罗汉一样,摇着扇子在椰

林荫下一问一答地纵论柬埔寨战局。据我们的印象,这时的波尔布特和“红色高棉”因忙于战争,还需要人民群众的支持、掩护,还要动员农民参军打仗,所以在各项政策中尚未形成系统性、全面性的极“左”路线。但是在某些具体政策方面,他们的极为野蛮的性格确实已经明显地冒出苗头了。比如“红色高棉”的一位师长在对我们谈到他们的俘虏政策时曾颇为得意地说:“我们俘获的敌军排级以上的指挥官,都是当场枪决,不留后患!”在他谈完这个问题时,我乘谈话的空隙插了几句话,大意是:我们中国的八路军对待战俘的政策是比较宽仁的,对于放下武器的敌军不论是士兵或长官,我们都不杀害,并且优待他们,甚至发给路费送他们回家。对日本侵略军也是如此,只要他们放下武器就能得到我们的优待。我还进一步说:在我们的解放军中,有不少“俘虏兵”,即被我们俘虏的国民党士兵经过我们教育后参加了我军,有些人还成了战斗英雄。我说这番话的意思是企图影响他们一下,最好改变一下俘虏政策。那位师长听了之后冷笑了一阵说:“我们不需要这种士兵。”尽管我使用了甚为婉转、温和的语言和介绍经验的方式做了这点“思想工作”,但在我们代表内部却还是引起了一些不同意见。我们的一位最年轻的团员,摄影记者在这次采访末期总结工作时,竟然批评我上述那番谈话是“大国沙文主义”和“企图”干涉“红色高棉的内政”。这位青年人颇有点“造反派”气味。但是我正告他:“对待俘虏是有国际公约的,此种事将来有可能引起国际公约方面的麻烦!”

(作者为原广播电视部副部长)

(责任编辑 杨继继)

猜出粉碎“四人帮”之后

○ 陈启森

读懂《人民日报》透露的信息

1976年10月12日，早晨一上班，我习惯性地拿起《人民日报》，刊登在一版头条的新闻引起了我的注意。醒目的主标和副标，报道的是巴布亚新几内亚总理索马累到北京，华国锋总理和首都群众到机场热烈欢迎，副总理李先念和夫人林佳楣到机场迎接的消息。细看内容，以前类似重要活动必出现的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和姚文元，没有一人露面。一版的另一条消息说，李先念晚上与索马累进行了会谈，报道中也没有他们四人的名字出现。这不禁使我感到疑惑，因为在毛泽东逝世后，出现这种情况，是极不寻常的。在这版的中下部，转载了新华社报道唐山工人阶级决心继承毛主席遗志，拥护以华国锋为首的党中央的电讯。文中说，“历史经验证明，要搞垮我们党是不容易的。任何背叛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篡改毛主席指示的人，任何搞修正主义、搞分裂、搞阴谋诡计的人，是注定要失败的。”文中还借用唐山工人阶级的话说：“维护党的团结和统一，加强组织纪律性，一切行动听从党中央的指挥。”看到这里，联想到上面那条新闻，心里不禁一震，难道没有露面的那几个人出问题了？

那时，我在四川石油管理局成都总机械厂工作，任厂团委书记。不一会儿，团委办公室干事小王上班来了。他是1973年从部队复员后到工厂的，他的家住在成都军区大院。小王刚坐下，我就告诉他，今天的《人民日报》你看看，我觉得好像又发生了点什么事？在那个动荡的年代，人们对局势相当敏感，尤其是在毛泽东逝世后，党内外群众，无不非常关注中央人事的动向和政策变化的蛛丝马迹。小王拿起报纸，浏览了一会儿，然后看着我，用不轻也不重的声音说了一句：“戴眼镜的被抓起来了。”就这一句话，像隆冬中的一道闪电，让我既感惊奇，更觉得兴奋，这不仅仅是由于

我的感知和分析得到了印证。据说，王的父亲曾任军区保密局的局长，后任川东某地军分区的司令员。尽管这样，我也不向他打听消息来源，在那个年代，这是很忌讳的。

聊天聊出祸灾

当年，我尚是单身汉，与我同住一室的，是厂党委组织科干事鲁某。晚上回到宿舍，躺在床上，我们都要聊天摆龙门阵后才入睡。那段时间我们聊得最多的，是社会上的传闻和笑话段子。如，“两报一刊”宣传“不深入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就会千百万人头落地”。而民间私下传播的却是，若邓小平上台，就会让千百万猪头落地，等等。因此，我俩相互都没有什么心理戒备。当晚，我们先后回到宿舍，关门，熄灯，像往常一样，躺在各自的床上聊天。当然，我也将白天我对人民日报新闻的分析结果告诉了他。

一夜无事，第二天工作如旧。晚上，工厂党委在职工食堂召开全厂党员大会。会议进行中，有人悄悄地通知我出去一下。出了会场，看见党委组织科张科长正在等我，他笑嘻嘻地说到他办公室去一下。我的办公室在组织科的隔壁，我们也都是一个党小组的，因此，我也没多想会有什么事。进了组织科的门，张科长一反常态地客气地要我坐下，然后转弯抹角地问我，最近几天说过什么话没有？我的脑子里还在刚才的会场上，装的是传达的上级什么文件的内容，一时没反应过来，说：没有说什么呀。张科长是解放战争末期参加革命的老党员，长期从事机关工作。他说，你再想想，想仔细点。我又想了想，笑着说：的确没说什么。“你昨晚是否给鲁某讲了啥？”我突然想起，是指这件事。就说，哦，对，是我跟他讲的。“消息从哪里来的？”张科长严肃地问。我此时才感到问题有点严重了，就说：是我自己分析出来的。“真的吗？”“对。”“不可能吧！”“你可以把昨天的

《人民日报》再拿来看看嘛。”“我看了，哪有什么你说的那些。”他一再要挖消息来源，我一口咬定是我自己分析推测的。半小时后，见没有结果，张科长说：你继续去参加党员大会吧。

接下来的那段时间，我全然没把此事放在心上，甚至晚上回宿舍休息聊天时也没有想到要问问鲁某。跟以往一样，我照常吃饭、睡觉和全身心地投入工作。大约过了半个月，此时粉碎“四人帮”的事早已公布了，才有人告诉我，你闯下了大祸，差点要了你的小命。告诉我的人没有细讲，就这么一两句，听罢，我没有追问，也没有多想，认为事情已经过去。又过了一段时间，又有人告诉我说，张科长询问我之后的当晚直到凌晨，从我们厂的领导到四川石油局高层，从辖区派出所到成都市公安局、四川省公安厅和当时的四川省委主要领导，都被惊动，这是我无论怎样都没有想到的。

上世纪90年代初，曾任党的第十届中央候补委员、四川省委书记的唐克碧，回到四川石油管理局任党委副书记（后调任全国总工会任女工部长）。在一次我随她出差的路程中，她无意中向我摆起了此事。我告诉她，当事人就是我，使唐克碧大感意外。她很是感慨地向我讲述了她所经历的那个不平常的夜晚。

“我们知道了，叫他们回去吧。”

原来，在张科长询问我的当天，工厂保卫科就已经迅速汇报到了当地二仙桥派出所，汇报到了石油管理局保卫处。没人敢懈怠，成都市公安局、四川省公安厅也快速得知了情况。那晚，张科长对我的询问，实际就是作为案子审理的第一步。没料到，我一口咬定消息来源系自己分析的结果，他们怎么也不相信。省、市公安部门感到案情重大，在了解了我的现实表现、家庭出身和政历后，决定连夜向四川省委作汇报。汇报后，厂政治部的领导、保卫科科长，石油局党委、保卫处的领导，成都市公安局、省公安厅的负责人都守候在省委大院，等候省委指示。一个多小时了，没有回音。他们问省委常委办公室值班人员：此人抓吗？领导批示没有？值班人员回答：领导还没有指示。他们又等了很长时间，已到深夜。再问，省委领导仍然没有任何指示。他们着急了，案子不能

等，得想办法跟省委主要领导联系，否则，这样一件政治大案谁也负不起责。

这时，他们想到了唐克碧，她不仅是中共十届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也是在任的四川省委书记。于是，他们很快找到了她。唐克碧答应迅速直接向省委第一书记赵紫阳汇报。过了一会儿，唐克碧告诉说，已作了汇报，稍等一下。哪知，又等了很长时间，也没等到指示。他们议论纷纷，有的说干脆先抓起来，赶快处理；有的说，还是请唐书记再作请示。唐克碧再次进入省委常委大院，进到常委楼外的小花园，看见赵紫阳和四川省委书记、公安厅厅长赵苍璧，在不太明亮的灯光下，两人都背着手，踱步沉思。唐克碧走上前，轻声问道：外面的同志还在等，如何处理，此人抓不抓？二赵对望了一下，赵苍璧说：“叫他们回去，就说我们知道了。”据唐克碧向我讲述时分析，粉碎“四人帮”后，中央肯定将此信息告诉了赵紫阳等省委主要领导，鉴于“四人帮”的社会基础和毛泽东逝世后的国内局势，对此消息高度保密，连她也一点不知情；那晚，二赵深夜沉思，在想什么不得而知，但看得出来，在那个特殊的时刻，他们对当时中国未来的政治走向在作揣测和判断。

唐克碧从常委小院出来，传达了省委“二赵”书记的指示后，众人怀着很不解的心情，离开了省委大院。在夜深人静的大街上，几辆车内的人都沉默不语。他们纳闷，在这个非常时期，作为造谣惑众的反革命分子，理应连夜逮捕，审讯，快速处置，为何置之不理？形成戏剧性反差的是，那晚离开组织科后，我就没把此事放在心上，因为在潜意识里，完全相信组织上对我是了解的，问问就算了，不会对我怎样，照样呼呼大睡。哪知，组织上却忙碌紧张了一夜，使我差点遭受牢狱之灾，甚至危害到家人。到了10月21日，党中央一举粉碎了“四人帮”的消息宣布了，万众欢腾，举国庆祝，结束了中国多年内乱的历史。

后来，不断有同事问我，难道他们对你的人品、工作、政治面貌还不了解吗？为何要采用这种手段来对待你？我说：“在那个崇尚专政、专治的年代，人们的心灵、人性都发生了扭曲，涂炭了不知多少鲜活的生命。我是幸运的”。■

（责任编辑 杨继绳）

我国高校发展的三个问题

○ 朱九思

关于如何办好大学,我想谈三个问题:

一、中央政府要制定和执行正确的政策

要怎样才能把大学办好,首先要决定于中央政府能否制定和执行正确的政策、能否正确指导地方政府管理好大学。在改革开放之后直到1997年、1998年,我国大学在办学过程中虽然也存在着一些问题,但是从总体上看,大学的办学工作还没有出格。但从1998年以后的十年,大学的发展相当地混乱,主要原因是中央政府有两项重要的、错误的决定:第一是大学的合并,第二是高校扩招。

据我所知,大学合并起源于1998年5月4日,那一天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纪念北京大学成立一百周年庆祝大会。一位中央领导同志在大会的讲话中提出,“为了实现现代化,我国要有若干所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一流大学。”当时分管教育的另一位中央领导同志就开始考虑在中国如何建立世界一流大学的问题。看来他考虑的结果是认为大学合并是一条很好的道路,1+1>2。他有一句话,叫“强强合并”。从1999年起,合并重点大学的做法就开始了。

合并工作首先从浙江大学开始,要求以原浙江大学为主体,合并杭州大学、浙江医科大学、浙江农业大学,组建新的浙江大学,并且许诺如果这四所学校合并,国家将拨付专项资金加大投入。据我所知,当时这四所学校的学校领导和教师们都不希望合并。例如,原浙江大学校长就曾向别人表示,四所大学合并,校区分散在四个地方,相距较远,我这个校长怎么当?据说,不少教授听到四所大学合并的消息后,表示了怀疑和不赞成的态度。但是,上面的态度很坚决,反复强调,高校合并是政府行为,就这么办。所以,在新

组建的浙江大学举行成立仪式时,分管教育工作的中央领导人亲自参加,并通过浙江大学邀请全国许多高水平大学和较高水平大学的领导参加成立大会。据我所知,在教育部最初下达的方案中,是将我们学校(华中理工大学)和同济医科大学合并到武汉大学,但是由于这两所大学的坚决反对和武汉大学合并,合并虽然不成功,但是我们学校还是不得不和同济医科大学合并,同时,武汉大学也合并了武汉水利水电大学、武汉测绘科技大学和湖北医科大学。

负责教育工作的中央领导人曾准备把天津大学和南开大学合并起来,但是这两所大学的大多数领导都不赞成。然而,上面的态度是很坚决,重申这是政府行为,你们不要提意见了。于是,这两所大学的校领导找到李瑞环同志,希望他出面解决这个问题。因为李瑞环不仅是天津人,而且在天津市做过多年的领导工作,对两所学校的情况也非常了解。李瑞环本人也不赞成合并,于是他向负责教育工作的中央领导人提出这两所大学不要合并,这才挽救了这两所大学没有被强行合并的命运。

我认为,大学不是绝对不可以合并,但是大学合并绝对不能采取行政命令的强制性手段,而必须双方自愿,“自由恋爱”,绝对不能由政府搞“拉郎配”。1924年哈佛大学和它的近邻麻省理工学院曾经谈过合并的事宜,但是最终没有谈成。直到现在,这两所学校虽然紧靠在一起,但还是各自独立,都办得很好,成为世界一流大学中的佼佼者,这说明大学不合并并非不能办好。

大学合并也有成功的,我就知道这样一个事例,就是美国加州伯克利大学在其早期曾经与当地的一所大学合并,双方自愿,结果合并成功了,后来发展成为加州的第一所大学,称为伯克利加州大学。

中国这一次的大学合并已经成为事实,大学

合并之后，是不是就达到了 1+1>2 的目的呢？据我所知，事实并非如此。

第二件事是大学扩招。大学扩招起源于 1999 年暑假。当时教育部准备召开全国教育工作大会，在向国务院领导人报告大会筹备情况时，国务院领导人提出大学要扩大招生规模。由于当时大学的招生录取工作已经开始，所以教育部提出是否可以暂缓一步，以便做更好的准备，但是国务院领导人的态度很坚决，要求在当年再招一次。教育部提出说当年的教育经费已经下拨了，扩招后的经费怎么解决？国务院领导人说，家长自己掏腰包，学生自己缴费。

国务院领导人的态度为什么这么坚决呢？当时，由于受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我国经济形势比较严峻：出口下降，内需不足，投资乏力，经济增长速度回落。有经济学家建议，可以通过扩大高校招生，启动教育消费。可见，在当时的背景下，国家提出扩大招生主要是从经济发展的角度出发做出的决策。政府想借大学扩招来解决面临的经济紧缩问题，让学生家长把钱都拿出来拉动消费，促进经济的发展。此后，高等学校的扩招便一发而不可收。2000 年之后，每年扩大招生规模，大学在校生的规模一年比一年大。大学的领导人也愿意这样做，因为扩招可以增加学校的收入。实际上，这是把学生看成是“摇钱树”，这就使教育走上了产业化的道路。学生规模的不断扩大很快就带来了一连串的问题，以至于最近 10 年把大学的风气也带坏了，大家都向“钱”看。

由于扩招和大学合并，特别是扩招，必然带来一连串不好的结果。

首先，高等学校的扩招直接或间接地导致了高等教育人才培养质量下降。

应当说，1999 年，中国的高等教育在扩大内需、推动经济的背景下，以一个急转弯的方式走上了大众化道路。但是，随着学生数量的迅速膨胀，学校的教室、实验室、图书馆、计算机房等基础教学设施实际上无法满足正常的教学需要，大学校园拥挤不堪，人满为患。特别是教师队伍逐渐出现不足，很多专业的小班教学已不再可能，实验课被逐渐削减，教学质量受到严重挑战。随着高校连年扩大招生，研究生的招生数量也急剧攀升，学校的培养条件无法满足规模发展的需

要。原来一个导师指导几个博士、硕士生的情况已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十几个甚至几十个学生跟随一位导师。

上海交通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在对教育部直属的 71 所高校的教学质量、科研质量和服务社会质量进行分析后认为，我国重点大学的发展存在以量代质的现象，政策中存在重物轻人的倾向，重点大学的研究生质量令人担忧。有数据表明，“从 2000 年至 2004 年间，研究生扩招速度明显偏快：博士生的年均增长率为 19.5%，硕士生更是达到 23.1%。教师平均教学负担提高较快。与 2000 年相比，2004 年本专科生的师生比率增长了 28.6%，硕士生的导师比率直线上涨了 102%。2000 年，平均一个导师带 3.8 个研究生，到 2004 年，平均一个导师要带 7.7 个研究生。在教学实验环节，研究生教学实验时间则同比下降了 38%。”重点大学的研究生培养尚且如此，那些新增博士、硕士点的地方本科院校更是不可想象。由于合格的导师数量不足，导致研究生培养本科生化，不仅出现学术水平的滥竽充数，还引发了诸如抄袭、剽窃等不良恶果，来自社会、学生、教师对教育质量的置疑之声不绝于耳。

其次，大学的盲目扩招使得大学生就业困难。

自 1999 年高校开始扩招以来，大学生就业问题日趋严峻，大学毕业生初次就业率日趋下降，受到了社会各界的普遍关注。以下这组数据反映了自 1999 年扩招以来普通高校本、专科毕业生数量的增长变化情况，如果将毕业研究生数计入，则毕业生人数更加可观。

年份	普通高校毕业生数(万)	增长率(%)
1998	82.98	
1999	84.76	2.15
2000	94.98	12.06
2001	103.63	9.12
2002	133.73	29.05
2003	187.75	40.39
2004	239.12	27.36
2005	306.80	28.30
2006	377.47	23.03
2007	447.80	26.60
2008	511.90	14.30
2009	531.10	3.75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摘要 2010 年》

表中的数字仅是普通高校,如果加上研究生和高职,队伍更加庞大。

由于大学毕业生队伍越来越庞大,社会所能提供的就业岗位相差悬殊,每年有数以百万计的大学毕业生找不到工作。这使那些负债读书的家庭十分困难,也成了保证社会和谐的一道难题。上海市一位从事大学生就业工作的人士认为,“高校招生规模的急剧膨胀,打乱了既有的金字塔形的人才需求结构。由此带来的后果是,一方面,在社会还无法提供足够的合适岗位的条件下,大量大学毕业生的涌入,势必造成人才暂时的相对的过剩;另一方面,高校扩招,把许多原本作为技术工人培养的学生纳入普通高等教育的培养范围,从而导致技术工人的短缺。”

随着扩招,很多高校开始探求如何拓展办学空间,在高校内部挖潜走到尽头之际,异地选址建设新校园就成为大势所趋,几年间,国内数十个大学城相继拔地而起。有关数据显示,“自 2000 年起,仅两年时间,全国规划建设的大学城就达 50 多座,涉及 21 个省、市。2002 年投入 325.89 亿元,校园建筑总面积达 1436.97 万平方米,容纳高校 134 所,在校学生 59.7 万人。”

然而,在这无限风光的背后,是各个高校背负的巨额债务。当前,国内大学城建设的资金主要来自政府、学校和社会等三个方面,但由于财政投入和其他融资渠道有限,所以,无论哪种投资方式,其最终的资金来源绝大多数是银行贷款。据国家审计署的一项调查显示:“大学城”建设贷款规模过大,存在偿债风险。如“南京市仙林、江宁和浦口新校区的 12 所高校建设项目,目前银行贷款为 27.28 亿元,占实际到位资金的 71%。这些学校还本付息主要靠学杂费收入,按目前收费情况测算,今后每年还本付息额将超过学杂费收入的 40%,个别甚至达到 80%。”《2006 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社会蓝皮书称,2005 年我国高校向银行贷款总量约在 500 亿至 2000 亿之间。按照严格的财务核算制度,一些高校其实已经破产。

据国家审计署发布的 2006 年第 1 号审计报告,包括吉林大学在内的 18 所高校,至 2003 年末债务总额 72.75 亿元,其中基本建设形成的债

务占 82%。事实上,吉林大学的这些贷款较为密集地发生在 2000~2004 年之间,正与高校大扩招、大合并的步伐相一致。

国家审计署的一份报告显示,“2007 年各个大学城的财务审计已经完成,在这两年的审计中发现,由于不断扩招,不少高校都进行了巨额贷款,并因此负债累累。一般高校的贷款都在 4 亿~8 亿元,一些规模大的院校更是高达 10 亿元以上。”而与此同时,令高校不能不警醒的是,随着国家扩招步伐的放缓和未来适龄大学生数目将有所下降,今后若干年内,大学城还可能面临闲置的危机,造成巨大的资源浪费。

二、大学主要领导人应当具备的基本素质

毫无疑问,大学要办好,要有好的学校领导班子,好的校长,好的党委书记。关于如何做好一个好的学校领导,这方面的文章可以说是连篇累牍,我就不打算在这里多说了。根据我在学校领导岗位几十年的体会,觉得做一个好的校领导需要注意以下几点:

第一,要具备一定的业务知识和学术水平。所谓具备一定的业务知识,就是说作为学校主要领导人,要对所在学校各个学科专业的基本知识以及这些学科专业之间的关系要有所了解,否则,作为学校领导就难以与这些学科的教师进行沟通,也缺乏学科发展的敏锐意识。这样的校领导在学校就不会有威信,就不会得到师生的支持。这并不是要求他们都是某个学科的顶尖专家,并不是说只要是院士就一定可以当好校长。就有这样的院士,他们在自己学科领域的研究中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但是却当不好校长。如果让他们治理一所大学,不仅会有害于大学的发展,而且也荒废了这些院士的业务,实际上也造成了对这些学科科研工作的损失。

第二,要具备正确的观念和正确追求。我在做华中工学院院长岗位时,经历了新中国历史上政治形势变化多端的时期。“文革”之前全国学习苏联,苏联怎么办,我们就怎么办,高等学校的办学完全是苏联模式,大学主要领导人没有自己的理念和追求。“文革”之后,政治形势发生了变化,

需要我们探索高等学校的办学模式。这就要求大学的主要领导应具备正确的理念,要有自己的办学追求。我们学校是在1952年院系调整之后建立的,建校初期是一所多科性的工学院。在“文革”后期和“文革”之后,我经过反复考虑,感到必须把我们学校办成综合性、研究型大学。

“文革”之后,教育部派我率领一个代表团到美国、加拿大和日本去考察,历经两个半月,看了许多高水平大学或较高水平的大学。我获得一个总体印象:那些高水平大学都是综合性的,而且在这些大学里实行“教学”与“研究”两个中心。美国的高水平大学几乎都是综合性和研究型大学,这些学校非常重视教师的科研工作,制定了一系列管理教师科研工作的法律文件,鼓励教师从事科研活动。由于有了科研,学校的教学质量不断提高,培养了大量的高水平的学者,促进了美国的科技发展。

为了把我们学校办成综合性、研究型大学,我提出了要加强教师科研工作的要求,要把科研放在学校工作的突出地位,并采取有效措施,鼓励和帮助教师参加科研工作。在1978年的全国科学大会上,我应邀在大会上做了书面发言,发言的题目就是《科学研究要走在教学的前面》,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人说这个提法不对。因为科学研究是源,而教学则是流。没有科学研究,大学的教学就成了无源之水、就失去了活力、就没有了新鲜的教学内容,也就无法提高教学质量。所有这些设想和措施就形成了我的办学理念和追求,正是在这样的理念和追求的驱使下,我率领华中工学院逐步由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单一学科大学演变成一所综合性大学,进而发展为今天的在国内有一定影响的研究型大学。

第三,提倡学术自由。大学的主要领导一定要执行学术自由的政策,千万不能扼杀学术自由。特别是在人文社科方面,由于意识形态往往对学术自由有很大的干扰,所以必须更加坚决实施学术自由的办学方针,杜绝学术问题政治化和行政化。

1980年前后,我们学校造船系有一位青年教师发表一篇文章,当时在系里有一位50多岁的教授认为这位青年教师的见解不对,于是他采取写告状信的办法到处告状,其中有一封信被转

到了当时分管科学的方毅副总理那里。方毅副总理在信上批签意见,要求教育部一定要解决这个问题。于是教育部准备组织一个专家小组来学校,试图采用行政的办法来裁决,而不是采用学术自由式的研讨办法来解决。当时我校科技处的一位干部借调到教育部的科研司工作,得知这个消息之后打电话告诉了我。接到这个电话以后,我觉得这个做法不对,于是给教育部科研司发了一个电报,说这是一个学术问题,有不同意见是正常现象,建议教育部科技司给那位教授写一封信,希望他在有关报刊上发表文章对那位青年教师的观点开展讨论。教育部采纳了我的意见。学术问题只能用讨论和研究的方法来解决,真理越辩越清晰,千万不能采取裁判员的办法,也不能用投票的办法来解决学术自由的问题。

中国著名历史学家、原华中师范大学校长章开沅教授对于学术自由有很好的见解。1990年前后,他经常对教师们说,学术自由问题,是个很重要的问题。没有学术自由,只能培养庸才,培养不了具有高度创造力的人才。人们常说,要培养创造性思维。如何培养创造性思维?如何给创造性思维以良好的环境?这就需要学术自由,不能堵塞创造性思维的空间。他还说,在学术自由上,政治责任,我负责;学术水平,你们负责。

第四,要有一定的行政管理能力,书呆子不行。大学是一个复杂的学术组织机构,其中成员大都是社会精英,因此,对于大学校长来说,对其管理水平就有更高的要求,这就是要有较强的行政管理能力。光有学问不会管理也不能当校长,不能当书记。同时,无论是大学校长还是党委书记,都要懂得高等学校的管理艺术。既要学术自由、民主管理,也要严格要求、适当集中。现在的大学中有一个不好的倾向,把大学当做行政机关,在实际管理中少数学校主要领导人集权、独断,民主气氛不够,职能部门官僚气十足,教师戏称为“衙门”。这些现象对于大学的学科建设、学术发展、人才培养产生了消极作用,不利于大学的进步和发展。

第五,取消校长任期制。校长不是行政干部,而是学术领导,是学者的带头人。因此,只要身体健康状况允许,不应当有年龄和任职年限的限制,70岁人做学校主要领导也未尝不可。国内外

著名大学在其成长过程中都与著名的校长的名字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而这些校长又都有一个较长的任期。下表的数据也许可以说明,不固定的大学校长任期对于大学的发展是十分必要的。

世界著名大学校长任期一览

学校名称	始创时间	任期最长校长姓名	任期时间(年)	该校校长平均任期(年)
哥伦比亚大学	1754	Nicholas Murray Butler	43	13.2
麻省理工学院	1861	Karl Taylor Compton	18	9.5
耶鲁大学	1701	Jeremiah Day	29	13.7
哈佛大学	1636	Charles William Eliot	40	13.6
斯坦福大学	1891	Wilbur	27	11.3
约韩·霍普金斯大学	1876	D·C·Gillman	26	9.8
波士顿大学	1839	William Fairfield Warren	30	16.4
西北大学	1850	Henry Wade Rogers	49	15.4
普林斯顿大学	1746	John Witherspoon	26	13.6
康涅狄格大学	1881	Albert N.Jorgensen	27	9.5
休斯顿大学	1927	Edison E.Oberholtzer	23	7
早稻田大学	1882	大隈重信	15	8.1
牛津大学	1167	Elyas de Daneis	40	2.8

三、教师队伍中要有大师级教授

要办好大学,必须根据教授治校的指导思想,依靠大师级教授组织教学和科研。没有一流的学者以及他们之间的紧密协作,要想办好大学是不可能的。为了建设大师级教师队伍,作为学校主要领导应当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第一,引进人才。“文革”后期,我在学校引进了 600 多人,把一些“牛鬼蛇神”都引进来了,结果证明,他们中没有一个是“草包”,没有一个有严重的政治问题。后来的事实证明,他们中好的和比较好的占多数,少数是一般的,没有一个是 不行的。高水平的大约占 2/5,比较高的占 3/5。毕业于中国科技大学的陈应天,安徽天长人,在学校学习期间,学习成绩十分优秀,尤其是在物理学方面表现出特别的天赋,毕业以后被分配到山东聊城的一个县级机械厂,专业不对口,工作不开心。我们得知这个情况后,立即指派人事处前往山东商调此人。这位青年到校后不久,亲自找

到我,希望能够给他一次出国进修的机会。我答应了他的要求,派他去英国剑桥大学著名的卡文迪许实验室攻读博士学位。他在学习期间,不负导师库克教授所望,只用了一年半的时间,自己设计实验器材和设备,解决了物理学中的一个难题,并为此获得了博士学位。回国时,征得库克教授的同意,将他在卡文迪许实验室工作和自己设计的那套实验设备全部带回到学校。后来他离开学校到美国去工作,解决了美国激光领域的一个难题,并获得了奖励。

第二,立足学校、自主培养。要培养高水平教师,办法其实很多,一个办法就是送出去,到国外高水平大学去培养。但是从长远的观点看,还是要立足学校、自主培养。自主培养的方法也是多种多样的。如采取措施,为教师提供科研工作的机会,使他们在科研实际工作中锻炼;敢于“啃硬骨头”,在攻关中获得项目单位的信任,为教师提供更多的科研机会;举办新专业,在专业建设中锻炼和培养高水平教师。这里以我校举办新专业为例来说明自主培养高水平教师的过程。

之所以要办新专业,就是没有人懂这个专业,我们就办了许多新专业,如激光专业、生物力学专业、系统工程专业。激光是在 1960 年代发现的,在这十几年后我校就开始办这个专业。生物力学、系统工程也大致如此,我们的教师都经历了从不懂到懂的过程,在举办这些新专业的过程中,一大批教师得到了锻炼和提高,许多教师成为该领域的知名教授,从而提高了我们的教师水平。

在举办新专业的过程中,我们是按照对象的不同采取不同的办法。如我们举办“激光专业”时,头两年不招本科生,也不招研究生。经过两年的艰苦研究,把问题弄清楚了,我们就开始招本科生。对于“生物力学”专业,我们采取请人来讲学的办法。我们邀请了一位华裔的美国教授来学校讲了两个月,与北京的物理研究所联合办杂志,请那里的专家来讲学。“系统工程”专业完全依靠我们自己创办的,因为当时请不到外面的人来讲学。于是我们要教师们在图书馆去查阅资(下转第 58 页)

民主政治建设需要改变思维

○ 蔡 霞

民主这个概念十分复杂。一般都说在最本原的意义上民主就是“多数人的统治”，但我们也都知道，“多数人的统治”在某些条件下恰恰就会变成“多数人的暴政”。今天我们所讲的民主，其实已经不再是民主这个词本身字面上的意思了，它成了复合型的概念，这里面包含了人类几千年以来的政治生活实践总结，包含着它今天暴露的问题以及人们未来努力的方向。谈中国的民主问题，我以为要建立几点思维：

第一，把人当做人是承认民主价值、真正追求民主的基本前提

民主的一个基本前提是：要把人当人。为什么几千年来人们都要追求民主？只有人才会努力地追求民主。如果把人不当人，那就不存在民主这个概念，也不存在民主的生活和实践。

我们即便到现在也还没有真正而完全地把人当做人，而是常常不自觉地把人作为实现某种目标的手段和工具，或者在特定的政治意义上不承认对方也是人。所以，我们百年共和，百年宪政，努力走到今天，民主之路之所以仍然艰难坎坷，问题就在于民主需要先确立很大的一个前提：先恢复人这个概念，充分地尊重人之为人的尊严与权利。

中国社会有着两千年专制统治的政治文化传统，容不得政治上的对立者存在，相互敌对的力量都不认可政治对手与自己都是“人”这个同类。革命战争时期的阶级斗争和阶级对抗，是建立在血腥杀戮的基础上的，在你死我活的思维中以暴力残杀方式解决社会矛盾问题。

我们讲的民主，其实有很多方面的含义，民主既有工具理性考量、又有价值理性追求。如果把它放在一个价值理性的角度上讲，所谓讲民主就是首先把人当一个人来对待，尊重每个个体的生命、生存、人之为人所应有的权利利益，先讲基本的人权，然后才能讲到民主所包含的人的政治

权利。民主作为人的政治权利是为了使人活得像个人。马克思曾经说过，只有到了共产主义社会——也就是他所认为的人类社会未来那种比较美好、理想的社会——人才真正进入了人之为人的历史，在这之前，都是人的史前期。

所以，制定国际人权公约，各国政府签约遵守，这是任何一个民主政权都应该做的。从革命战争年代起我们党就一直在追求民主政治，我国政府前些年也签了人权公约。但是，你还可以看到，我国政府签了国际人权公约以后，有的地方的做法是怎么样的？有的地方以各种名义强制征用农民土地，强制拆迁民众的住房。在公共权力的强拆行为中，考虑在先是 GDP 数字。在有的地方，“人”经常是作为政治符号、统计数字、手段工具这个意义上而存在，强占老百姓的土地、房屋引发那样多的血腥事件，就是没把人当人。

第二，摆脱民主问题上的意识形态束缚

因此，今天从先把人当做人这点起，再来讲民主问题的话，我倒真的是赞成不要去简单地套在我们原来意识形态的范畴当中去讲社会主义民主、资本主义民主、无产阶级民主、资产阶级民主，等等此类。如果要讲民主的话，我觉得人类追求社会政治生活的文明，从野蛮、蒙昧状态到走向文明进步，可以把它分成古典民主的理论与实践，近代社会的民主理论与实践，以及现当代社会的民主理论与实践。说到底就是在讲，如何使活在这个地球上的所有人都能够活下去，而且都能活得好。至于资产阶级民主、无产阶级民主等词，是对 19、20 世纪社会阶级结构与社会状态中民主政治实践的反映和指称，随着社会科技与生产力进步而带来的阶级阶层结构的深刻变化，仍然在你死我活的阶级对抗和绝对对立的政治排斥意义上去理解和把握民主问题，已经显示出明显的历史局限性了。我们需要走出把民主问题意识形态化的窠臼，这样才能真正地打开我们的思

想空间,去汲取世界各国人民在民主实践中所获得的经验和教训,以作前车之鉴,使我们在发展中国的民主政治中更有理性更少走弯路。

第三,努力全面地认识和把握民主理论与民主实践

民主政治的实践进步与理论发展是人类在政治生活中充满创造力的探索过程。从这个角度来讲,从古代到今天,从近代到现代,人类思想史上可以看到,很多民主理论的产生都不是学者坐在房间里边想出来的东西,都是人类在政治生活中、在处理问题的实践当中总结出来而形成的理论。民主政治本身是一个不断探索不断进步的过程,在用已有的民主理论指导解决问题的过程中,总是旧的问题解决了但同时发现又有新的问题产生了,为解决新出现或人们新意识到的问题,又有新的理论产生。从古典直接民主理论到代议制的精英民主理论、罗伯特·达尔的多头民主理论、参与民主理论、到协商民主理论,以及后来又有的包容性民主理论等,所有这些民主理论的流派都是这样,产生于人们推进民主实践的过程中而又影响着人们的民主实践。

如果把民主的理论和实践放在这个角度上看,我们就可以看到人类自身的政治生活和社会组织文明程度的不断提高。从这个角度讲,有很多东西我们可以撇下阶级性,撇下政治对立的意识去认识和把握民主政治中存在的客观规律,承认民主政治的规律带有普遍性,在承认和尊重规律的前提下去吸收和研究别国民主实践中的经验教训,同时我们努力探索在中国的国情条件下,如何去脚踏实地地走出一条和平推进民主进程的路子。

正是因为民主政治在欧美国家走了几百年了,他们有很多实践当中的经验教训、暴露出来的问题和毛病,这对于我们后发国家是极为宝贵的财富。在走向现代政治文明进程中,我们不再需要向别的国家当初摸索走路那样,再一步一步地摸索,我们可以同时把人家的东西借鉴吸收过来,当然是根据我们的情况来吸收。

说到底,民主可以理解成人们为活得有尊严,为促进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而逐渐探索形成的社会公众控制公共权力、和平解决社会矛盾冲突的制度系统。所以,民主政治包括民主选举、

民主参与、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等等。我们不需要也不应该只讲选举民主,或者回避选举民主只讲协商民主。

但是,在民主政治建设中无论强调哪一方面,有一条是无可回避的,这就是权力是谁给的。中央领导人已经明确提出“权为民所赋”,从这个角度上讲,民主选举是不可避免的。当然到实际中就有一个怎么进行民主选举的问题。从中国的实际情况看,一下子全国铺开直接选举,一下子13亿人来个直选国家主席,我想那不现实。但是,选举是可以从基层逐渐向上推进的,在村、乡镇(街道)、县(区)可以搞直接选举,到了市以上可能搞间接选举更现实,更好操作。

第四,学术上的严谨性有利于实践中民主政治的健康生长

我们在讨论中国的民主实践如何推进时,常常会借用西方欧美国家学者们的理论观点,这是很有必要的。但是,我们千万不能忽略了他们谈论民主理论时所置身于其中的话语环境以及民主理论流派的真正内涵。欧美国家学者先后提出过选举民主、多头民主、协商民主以及什么什么民主之类的理论,我们望文生义地把人家的概念拿过来用,往往会弄错的。所以要搞清楚,人家是在什么情况下说这个问题、人家的含义是什么、真实的问题是什么,我们怎么去吸收和借鉴。

比如,前些年至今,我国有些人为了回避选举民主问题,就把我们国内的政治协商等同于欧美学者提出的协商民主,并且提出我们的协商民主比他们的更成熟,企望以政治协商取代选举民主。

其实,此协商非彼协商,我们的政治协商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所进行的党派之间在政策方面的沟通和商量。而西方学者提出的协商民主理论,建立在定期民主选举、明确法制性权力委托授受关系基础之上,是为了解决文化多元主义、高度复杂性和不平等情况下社会公众参与公共决策并进行有效的理性对话的问题的。协商民主理论突出的价值指向是:要通过制度的开放性和民主性,保障公民就公共决策进行自由而开放的对话,以产生公共理性和合作性共识的条件,并使某些处于权利弱势地位的群体成员,其权利得到公平对待。为此,协商民主理论强调协商机制的多样性,该理论特别指出:“如果只有一种协

商机制输入的话，权力关系就会变得僵化无比，使那些有效运用它的人可能变本加厉地运用它。”〔美〕詹姆士·博曼著，黄湘怀译，《公共协商：多元主义、复杂性与民主》第 204 页，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6 年版）我们在谈论民主理论时，必须要坚持学术上的严谨性。

就此，我们重温并仔细思索托克维尔和萨托

利的观点，也许对推进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大有裨益。托克维尔说：“正是我们使用‘民主’和‘民主统治’这些词语的方式，导致了极大的混乱……”。萨托利说：“错误的民主观导致民主的错误。”〔美〕乔·萨托利《民主新论》第 3 页）■

（作者为中央党校党建教研部教授）

（责任编辑 杨继国）

书 名	作者或主编	定价	邮 费
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	150.00	12.00
苏联真相——对 101 个重要问题的思考	陆南泉黄宗良等	246.00	20.00
难忘一九五〇——志愿军入朝参战 60 周年图文实录	丁 伟	48.00	7.00
中国国情读本	中国年鉴社编	30.00	6.00
我这九十年——一段革命家庭的私人记忆	任均口述王克明撰写	38.00	7.00
国学大师之死	同 道	29.00	7.00
人生三路向：宗教、道德与人生	梁漱溟	28.00	6.00
走向革命：细说晚清七十年	雷 颐	29.80	7.00
最后的皇族	龙翔 泉明	38.00	7.00
我与中国民主同盟	梁漱溟	43.00	8.00
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	杨奎松	88.00	10.00
何方谈史忆人：纪念张闻天及其他师友	何 方	39.80	7.00
直译中苏高层会晤	顾达寿口述 郑少锋执笔	28.00	6.00
党员、党权与党争	王奇生	48.00	8.00
望九琐忆——一位老者的 20 世纪	白永达	22.00	6.00
底层的叩问——肖复兴人生笔记	肖复兴	25.00	6.00
国家记忆	章东磐	98.00	10.00
地狱门前——与李真刑前对话实录（内部发行）	乔云华	58.00	8.00
王光美私人相册	罗海岩编著	42.00	7.00
共和国大审判（二）——特别法庭内外纪实	王文正口述 沈国凡采写	38.00	7.00
蓝衣社——中国法西斯运动始末	丁三著	32.00	7.00
大国悲剧：苏联解体的前因后果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雷日科夫	49.00	8.00
国民党高层的派系政治	金以林著	48.00	8.00
红墙知情录（一二三）	尹家民	95.00	10.00
历史：何以至此	雷 颐	28.00	6.00
直言无悔——我的“右派”经历	徐 孔	29.80	6.00
一个大国的崛起与崩溃	沈志华主编	148.00	12.00
苏共亡党十年祭	黄苇町	26.00	7.00
三野名将	吴东峰	28.00	7.00
四野名将	吴东峰	28.00	7.00
张闻天在 1935～1938	张培森主编	17.00	6.00
张闻天与二十世纪的中国	张培森著	20.00	6.00
找寻真实的蒋介石：蒋介石日记解读 I	杨天石	60.00	8.00
找寻真实的蒋介石：蒋介石日记解读 II	杨天石	38.00	6.00
“中间地带”的革命	杨奎松	54.00	9.00
抹不去的记忆 老三届新三级	张 琦主编	48.00	9.00
牛棚杂忆	季羨林	29.00	7.00
烙印——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的集体记忆	林贤治主编	38.00	7.00
中南海人物春秋	顾保孜	78.00	7.00
元帅大将的最后岁月	李立宁 孟新	48.00	7.00
历史大转折中 22 个首任省长、市长和自治区主席纪实	孟庆春	49.80	7.00
聂绀弩旧体诗全编注解集评	侯井天	98.00	11.00
沧桑十年——共和国内乱的年代	马识途	38.00	7.00
1957 年的夏季：从百家争鸣到两家争鸣	朱 正	26.00	7.00
三十年河东：权力市场经济的困境	杨继国	39.80	8.00
庐山会议实录	李 锐	18.00	5.00
潜规则：中国历史中的真实游戏	吴 思	28.00	6.00
血酬定律：中国历史中的生存游戏	吴 思	28.00	6.00
无声的群落——文革前上山下乡知青回忆录	邓 鹏	97.00	10.00
《名家书札与文坛风云》	徐庆全	45.00	7.00
国史札记（史论篇）	林蕴辉	38.00	7.00
我亲历过的政治运动	萧 克 李 锐 龚育之等	28.00	7.00
流逝的岁月——中央党史研究室前副主任李新回忆录	李新著 陈铁健整理	39.00	8.00
官场怪圈定律	李若公著	46.00	8.00
走出个人崇拜	冯建辉	16.50	5.00
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	薄一波	88.00	11.00
我的八十五年——从西北到东北	张秀山	43.00	7.00
夹边沟记事	杨显惠	34.00	7.00
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始末	沈宝祥	39.80	8.00
九死一生——我的右派历程	戴 煌	21.00	5.00
1978 我亲历的那次历史大转折——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台前幕后	于光远	36.00	7.00

代购代邮

《潜规则》 一本普及读物。作者对历史准确的剖析，为我们打开了中国传统历史真实游戏规则的秘密。

《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始末》 一场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大讨论；一场突破禁区与僵化的思想解放运动，身处核心地带、参与和直面大讨论的亲历者，以第一手资料回顾 30 年前的讨论内幕。

《烙印》——“可以教育好子女”的集体记忆 1949 年后的多次政治运动，积累了一批又一批“阶级敌人”和“阶级异己分子”。“以阶级斗争为纲”人为地制造种种敌人并实行专政，不但“黑五类”分子受到严厉的制裁，连他们的子女也受到不同程度的歧视和打击，有的被迫害致死。他们带着屈辱和创伤生活在那个年代；他们被施以暴力或遭受凌辱；那种近乎“生而有罪”的困境使他们因家庭关系在政治上遭受不公平的对待，历尽坎坷……

本书分别记述了他们不同的身世故事，表达了对抗遗忘的集体意志和社会变革的共同渴望。

《“中间地带”的革命》——国际大背景下看中共成功之道 本书比较完整和系统地讲述了中共夺取政权的决策过程和影响其决策的种种复杂的内外因素的作用。它清楚地说明，中共革命的成功和新中国的由来，很大程度上都是得益于整个世界大环境和国际政治理念的改变，包括俄国革命、二战及战后国际关系的改变；得益于毗邻的共产党政权的大力援助。具体到中国，对于正在崛起的毛泽东来说，还离不开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日本入侵的影响。否则的话，在接连遭遇了 1927 年和 1934 年惨重失败的中共，何以能由极度弱小而一步步壮大？原本足够强大的国民党，何以会一步步削弱、瓦解，以至于无法适应战后的新形式、新条件，最终竟被中共所推翻？

《找寻真实的蒋介石》——蒋介石日记解读 蒋介石是中国近代史的重要人物之一，2006 年 3 月，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首次开放蒋介石日记，作者阅读了蒋介石日记的手稿本，复以各种文献、史料比证、勘核，对于人们一直想知道又得不到正确答案的历史议题廓清迷雾。寻找真实的蒋介石，正确评价其功过是非，揭示其本相，对于正确认识历史上的国共关系，正确认识和书写中国近代与现代的历史是必要的；对于建立两岸的和平关系，实现中华民族的和解与和谐也是必要的。

地 址：北京市西城区月坛南街 69 号

邮 编：100045 收款人：北京炎黄春秋杂志发行部

（注：邮购三本书以上，可按总书价的 10% 付邮费）

评地方政府的公司化倾向

○ 宫希魁

如果给地方政府公司化倾向下一个定义,大致可以表述为:地方政府在自己所辖的行政区域内,以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为目标,以对各种行政资源的控制和支配为资本,以商业行为和超经济强制为背景的市场交易为经营手段,以获取民众廉价劳动力的使用为用工和人事管理策略,以伪公共利益最大化的所谓“经营城市”为理念,以官员老板化为从政之道,围绕着“政绩”和升迁而形成的一整套类似于公司制的官场规则体系,或可称为地方政府公司化倾向。

近年来,政府模拟企业方式行使政府职能,其后果已经引起了社会的多种紊乱和不满。地方政府出现的一系列偏离正确方向的施政行为,都与地方政府公司化倾向有关。

地方政府公司化倾向的表现形式

1. 政府为逐利而拼命追求规模扩张

作为公司制企业,实现利润最大化是其核心目标。政府却不能这样,它必须以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为职能,本应成为社会公共利益的营造者和守护神。但是,我们的一些地方政府却不是这样,而是把自己变成了一个在市场上不停拼杀的“大公司”,不遗余力地片面追求经济增长,GDP成为“公司”的营业额,财政收入成为“公司”的利润。为了做大GDP这个营业额,由地方政府推动的“投资饥渴”和“扩张冲动”从来没有停止过。中国的经济周期与政治周期具有明显的正相关关系。每一次党的代表大会和政府换届之后,几乎都引发一次强劲的经济扩张。2009年在反危机、“保增长”的背景下,中央下达了4万亿的投资计划,随后地方政府就跟进了几十万亿的盘子。在“跨越式发展”、“超常规增长”、“弯道超车”、“逆势而上”、“转危为机”等口号下,又引发了一场争速度、上项目、铺摊子、盲目扩张的老毛病,开工

了一批明显缺乏科学论证的项目,被关闭的“五小”企业有些又死灰复燃,使此前“转方式”、“调结构”所取得的一些成果得而复失。

为什么搞科学发展难,搞盲目扩张却这样轻车熟路,就是因为我们的地方政府在体制深处存在一种内在的“扩张冲动”。就像一个野心勃勃的公司一样,为了把自己做大,通过上市、兼并重组、投资新项目、设立子公司等,不断进行数量和外延扩张。地方政府主导的数量扩张,在招商引资、城市改造、圈占土地、强拆强建、过度融资、滥设开发区等方面表现得淋漓尽致。

2. 像公司追求利润那样追求财政收入增长

地方政府既然成了一个“大公司”,追求规模扩张只是其中间目标,进一步的目标是要实现“利润”。这个“利润”就是财政收入。从近年来财政收入飙升的情况来看,足见其动力实足之势。2006年,全国税收收入完成37636亿元,比2002年翻了一番多。2010年财政收入突破8万亿元,比2006年又翻了一番多。只用8年时间就翻了两番。在税务工作指导理念上,形成了一种偏好,就是追求税收总量最大化。税收是国民收入再分配的一个重要环节,是政府对国民经济进行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是国家管理公共事务和提供公共用品的前提条件。因此,税负总体水平和征税合理区间的确定,必须用是否有利于社会整体利益最大化这个标准来衡量。征税不足,政府职能不能有效发挥,有害于社会整体利益。征过头税,使纳税人不堪重负,失去活力,同样不可取。就目前我国情况而言,有些企业和社会群体的税负已经不轻。在这种情况下,地方政府继续采取税收总量最大化方针,只能进一步扼杀社会发展的活力造成更严重的社会不和谐。

3. 以公司管理方式来进行社会管理

政府公司化倾向还表现在其管理方式的扭曲上。城市公用设施,其性质是公共用品,建造这

类设施的出发点应该是服务于社会公益事业,而非商业性盈利目的。因此,由政府出资建设这类设施和补贴其日常运营,是早有定论的事。即使部分地引进市场机制,也只能是政府严格监管下的模拟市场运营和与主体分割开来限定范围的市场化运作。这种市场化运作只能作为实现公用设施社会职能的补充手段加以运用,而非主要途径和根本出路。

然而,目前国内有些城市打着市场化经营、投融资体制改革的旗号,把拟建的公用设施项目向社会招商,“谁投资、谁经营、谁受益”;有偿出让公园、动物园、公交线路、公路、停车场经营权;把城市土地、道路、桥梁、污水处理、供水、供气、供暖、环卫、公交、出租客运、公园、广场、消防等有形资产和依附于其上的名称、形象等无形资产统统纳入产业化经营的范围。总之,要通过上述种种办法广开财源,为大规模的城建筹集资金。

权力过于集中,“一把手”说了算。这种现象普遍存在于地方党政机构中,折射出领导干部“老板化”倾向非常严重。书记成了“董事长”,市长成了“总经理”。在系统内部,有不少部门的下属已经很习惯把上级主管称为“老板”。自上而下,只能服从,民主协商已成鲜见之物。对下,命令之风盛行,动不动就口出狂言,“你到底能不能干,不能干就换人”,成为一些官员的口头禅。对涉及地区发展规划等重大决策问题,有些地方领导人靠拍脑门定盘子。这些人到了一个地方,不下真功夫解决实际问题,而热衷于出所谓“新思路”,制定所谓“大战略”,搞所谓“大开发”,动不动就几横几纵,几区几带。这样去搞地区规划,制定发展目标,其结果会是什么样子,可想而知。

公务员的工资福利分配,本来应该按照公共财政的规则去执行。一个统一的国家政府体系,其公务员的工资应是一个高低有序、左右协调的均衡系统。但在“阳光工资”、“地方津贴”等名义下,各个地方政府竟然像公司一样各自为政,以各种名义为本“公司”的“雇员”涨工资,发福利,使地方政府公务员工资福利规则碎片化,产生了巨大的地区反差和系统紊乱。

4. 以企业竞争方式处理地区关系问题

正常的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应是同一个体系中不同分支的行政协作关系,而不是企业间那

种商业竞争关系。但是,我们的地方政府却不是这样,互相之间视若竞争对手。在招商引资中,竞相压价。许诺的“优惠政策”几乎达到荒唐的程度。这种地区间招商引资的恶性竞争,使国家利益遭受的巨大损失无可估量。

近年来,不少地方政府的GDP大比拼愈演愈烈。中央确定的增长率为8%,省则在9%到10%,市12%,县则要定到14%了。各个地区还互相攀比,你定的增长速度是11%,我定的指标就绝对不能比你低;你上了百亿元的大项目,我无论如何也要超过你。地方政府之间的企业式竞争,还表现在对外部资源或公共资源的争夺上。一是争投资。上级政府的投资,尤其是中央政府的投资,对于地方政府来说,无疑是一块肥肉,不吃白不吃。只要有这种资金的存在,肯定闻风而动,动员一切力量和关系进行攻关和争取,生怕被别人抢了去。二是争政策。通过游说政策制定者而获取特殊政策支持,成为地方政府抢占竞争制高点的捷径。三是争招牌。名人故里之争就是突出一例,仅2010年上半年竟达10处之多。有些名人故里竟有七八个地方在争,更有甚者,水浒故事中的西门庆、潘金莲的“故里”,也被一些地方宝贝一般的争夺着。

二、地方政府公司化倾向的危害

1. 影响民生福祉的提升

政府应当是为人民服务的政府,但政府具有公司化倾向后,在很多情况下,自身利益与民众利益是矛盾的。在这种情况下,又由于缺乏有效的制度制约,政府则会把自身的利益摆在第一位。政府是由官员和公务员组成,官员的利益不完全等同于政府的利益;而在政府公司化的倾向中,官员可以更好把自己的利益置换成政府的利益。在一些地方政府的施政行为中,常常打出的是公共利益的招牌,实际谋取的是政府成员自身的小集团利益。

中国的房价飙升和地方政府公司化倾向有很大关系。不少地方政府每年的卖地收入相当于财政收入的60%以上。在这种情况下,地方政府并不希望房价降下来,对中央的房地产调控政策采取阳奉阴违的做法予以抵制。这是中央调控措

施屡屡失效的根源所在。

热衷于招商引资的地方政府在劳资纷争方面,更在意保护投资者的利益,工人的劳动保护、生产环境、工资待遇诸方面,即便是很低水平的要求,大多得不到政府有力的支持。由于工会本身就是依附于政府的一个部门,它不可能违背政府的意志站在工人一边来维护工人的合法权益。正因为地方政府的屁股更多地坐在资方和老板一边,而工人的权益得不到有效保护,致使工人的利益长期受到损害。

2. 政府职能错位引发市场秩序混乱

政府职能本应定位于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方面。但地方政府公司化倾向形成后,这种职能就发生了异化。在自身集团性利益的驱动下,政府既做市场裁判员,又做市场内的运动员。自身也变成了一个“大企业”,而且是一个不讲市场经济秩序、不讲游戏规则、不讲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大型经济实体。例如,在招商引资方面,项目洽谈本应该是企业之间的事情,应该由经济组织出面实施。政府的职能是依法履行审批手续。但是,很多地方政府却直接出面与投资者洽谈。政府承诺各种优惠政策,政府与投资者讨价还价,等等,俨然以一个企业的面目出现在投资者的面前。政府还以“特事特办”、设立“绿色通道”等超规则手段为引进的企业提供特殊便利。如银行贷款、税收政策执行等,遇到有关执法部门正常履行执法程序,更高层级的政府部门就会出面干预,给这些企业以特殊关照。由此产生了大量行政歧视和不公平行为。

地方政府行为的企业化,严重干扰了市场经济秩序,破坏了市场的游戏规则。某些有政府背景的企业,其管理者通过与政府官员的合谋,在“改制”、“重组”等名义下,侵占国有资产,借机发财。行政官员也通过暗箱操作借机获利。在政府工程发包、政府采购等商业行为中,通过操纵招标投标程序制造“公平”假象,内定承包人和交易对象以获取不正当的高额利益。“罚款经济”在很多地方大行其道。

地方政府公司化是破坏金融秩序和造成金融风险的一个重要根源。2008年底以来,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的数量和融资规模迅速扩张。到2010年6月末,根据银监会发布的数据,地方政

府融资平台形成的贷款余额是7.66万亿元,也有海外学者高估到11万亿元。

然而,与地方政府的庞大债务相比,其还款能力却令人担忧。由于一些地方(特别是县级以上政府)融资平台法人治理结构不完善,责任主体不清晰,操作程序不规范,一旦融资平台的项目投资不能收回成本,这些“隐性债务”就必然显性化,最后不得不由中央财政和商业银行埋单。

3. 使政府公信力严重受损

政府行使公共权力的合法性来自公民的认可和支撑,实际上就是某种信任。政府作为一个为社会成员提供普遍服务的组织,其公信力程度通过政府履行其职责的一切行为反映出来,实际上是公众对政府履行其职责情况的评价。近年来,地方政府公信力严重下降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这可以从大量群体性事件的爆发中得到佐证。比如瓮安事件,湖北石首事件,都是从偶然发生的人身死亡事件开始,迅速演变成一场有上万人参加的针对地方政府的群体性事件。参加的人群多数与原发事件本身没有利害关系。那么为什么又会一哄而起呢?这就可以追溯到长时间积累起来的对地方政府的不满情绪和不信任态度。比如企业改制、房屋拆迁、土地征用、集资等等,在这些事情当中,地方政府都过度地涉足了微观经济活动,参与了大量的与民争利项目,对群众的欠债太多,积累的民怨太深。

一个诚实的政府才是一个勇于负责任的政府,才是一个具有现代行政道德意识的政府,才能得到公众的认可。任何对公众不诚实的行政行为,都是在自毁形象。面对诸多公共卫生事件、群体上访事件、环境污染事件、罢工请愿事件、伤亡事故事件等,由于地方政府公司化倾向所产生的利益局限,当地政府在很多情况下都采取回避、隐瞒等态度,直至最后无从逃避时,才出面纠错。这其中,政府与民众的关系变成了“猫鼠游戏”,博弈大于合作,这显然与我们打造以人为本的服务型政府的目标是背道而驰的。在此种情况下,地方政府被整个动员起来控制事态的发展。除了媒体这个“异己”力量之外,人们只能寄希望于中央政府出面。因此,下级政府的行为结果在客观上已经把社会风险引向中央政府。

由于地方政府公司化倾向的出现,很多地方

法规和政策的出台，都具有明显的自利性倾向。久而久之，人们对政府的任何一项决策都持怀疑态度，都保持一种警觉，就怕政府又以“改革”、“调整”、“完善”等名义向自己的口袋里伸手。这样，即使是正确的政策和决策，由于社会和民众本能的防范反应，势必大大影响政策和决策的落实效率。现在，有些正常的改革推行不下去，与这种逆反心理不无关系。

4. 阻碍建设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型社会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建设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型社会，是我们实现科学发展的一个重要目标。但是，在此进程中却遇到重重阻力，其中之一就是来自地方政府公司化倾向。比如环境问题，往往是中央政府言者谆谆，地方政府却听者藐藐，太湖和淮河这样中央政府下大决心治理的重污染区，花费几十亿资财，却边治理边污染，不仅成效甚微，而且越治越污。至少，治理污染的动力不如追求 GDP 的动力大。在治污问题上，一些地方以政府名义出台“土政策”、“土规定”，明文限制环保部门依法行政，明目张胆保护违法行为，给环境执法和监督管理设置障碍，严重阻碍了环境保护法律法规的贯彻落实，导致不少“特殊”企业长期游离于环境监管之外。受地方保护主义影响，一些基层环保部门在上级督办、当地政府干预、群众上访三层压力下工作，结果是顶得住的站不住，左右为难。当然，也有的环保部门在当地官员的重压下，对严重的污染事件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采取放纵态度。

在资源问题上，我国产业政策严格限制高耗能、高污染、资源型的产能的扩张。但是，不少地方政府为了追求 GDP 和财政收入，继续扩大加工工业的规模，使得本来已经产能过剩的行业更加过剩。为了把 GDP 搞上去，不少干旱缺水地区的地方官宁可把居民用水扣下来，也要让厂矿企业敞开用水，因此甚至出现了缺水地区的企业水价反倒比水资源充足地区的企业水价还便宜的怪事。

三、地方政府公司化倾向形成的原因

1. 公共产品市场化生养出的怪胎

改革开放后，随着商品经济的兴起和市场化

改革的推进，商品意识逐步深入人心，各种商品交易活动迅速扩展开来。这种市场取向的改革其主流是应当充分肯定的，但也一度出现了全民经商、军队搞赢利性的生产经营、包括公检法在内的党政机关经商办企业的局面，“官倒”曾经盛行一时。由于这种现象带来了严重的后果，中央政府的明令整顿和禁止，才使党政机关退出了这类商业性经营活动。这种清理在一定程度上净化了市场环境，规范了市场秩序，但并没有完全斩断政府机关伸向市场的手。政府机关从先前小打小闹的商业行为中尝到了甜头，谋求自身利益的冲动又不能就此罢手，这就需要寻找一种与自己身份和职能较相吻合的方式和途径，把赢利性的商业活动做得更巧妙些，于是就将公共产品市场化。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经营城市、推向市场、拆迁改造。本来应为公众服务的公共产品却用作谋利的手段。

所谓经营城市，就是地方政府把城市当做一种综合性的、多元化的、庞大的特殊资产或经济实体加以经营，在这种经营中实现价值增值，在有限增进社会福利的同时实现政府自身收益最大化。所谓“推向市场”，就是把一些本来应该由政府办的公益性事业，如学校、医院、幼儿园、公共交通、公园等通过“改制”、出售等手段推向市场，自负盈亏，把内部负担外部化，以逃避政府责任。所谓拆迁改造，就是向地要钱。地方政府的这三项重大“举措”，其共同特点就是在“公共利益”、“地区发展”的堂皇招牌下，把政府参与的经商活动扩大到整个城市和地区的各个领域。它自己成了一个最大的大老板。

2. 行政性垄断的孪生兄弟

地方政府公司化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在很多领域有条件实行寡头统治，即实行垄断。其中危害最大的是行政性垄断，它是行政机关或其授权的组织滥用行政权力，限制竞争的行为。

行政性垄断可以说早已存在。在计划经济时期，虽然不用“垄断”这个词，但大一统的国有经济，无所不包的计划体制，本身就具有强烈的行政垄断色彩。向市场经济转轨后，行政权力始终没有退出竞争性领域，只不过由直接实物控制转到了金融、资本、资源、制度、规则等更多领域，在某些方面反而扩大了行政垄断的范围。地方政府

公司化倾向的产生，光有市场化这个条件还不行，还必须要有行政权力与市场的联姻，即行政垄断的存在为条件。因此，完全可以说地方政府公司化与行政垄断是一对孪生兄弟。

3. 分权财税体制倒逼出创收冲动

地方政府公司化倾向的形成，与不合理的财税体制有很大关系。1994年实行了分税制，大量优质税源集中到中央政府，解决了中央财政困难，中央财政的确富起来了，但地方财政的状况却不容乐观。在财权上收的过程中，也同时出现了事权下移的情况。地方财政在全国财政收入中占30%左右，但必须承担教育统筹等60%的公共产品开支。由于事权与财权的不对称，而中央对地方政府的税收返还与转移支付又十分有限，很多地方政府尤其是县乡这样的基层政府财政状况更为困难。地方政府为了弥补收入不足，把手伸向了社会、伸向了企业、伸向了土地、伸向了公用事业。

这种逼出来的牟利行为，其初衷不排除有解决公益事业难题的正当目的。但一旦把魔鬼从笼子里放出来，就很难约束它的行为，公益和自肥的界限再也划不清了。于是，在“公共利益”的名义下，大量侵害民众利益的事情发生了。

4. 片面的绩效考评引偏方向

上级政府对下级政府片面的考评办法，是导致地方政府公司化倾向产生的重要原因之一。在目前的层级架构体系下，地方政府及其组成人员尤其是主要官员的业绩评价，起决定的力量主要来自上级机关和部门。只要能得到上级部门和首长的信任与肯定，认为你政绩显著，工作能力强，就意味着你的仕途前景向好。因此，上级用于考核下级的评价标准和指标体系，就成了下级的行动准则和奋斗目标。这些年来，中央政府对地方实行财政包干体制，超收多留，客观上推动了地方政府经济扩张的积极性。另一方面，人事体制中的考核也侧重经济增长的指标，GDP的增长速度与地方官员的晋升发生了更为直接的关联。这都深刻影响了地方政府的行为取向。以经济增长为中心的考评体系之所以片面，是因为它忽视了保护生态环境、发展社会事业、完善社会保障、维护社会稳定、缩小收入差距、提高自主创新能力等方面的内容。而这些内容正是各级政府必须履

行的责任所在。把上述需要付出成本的负效益外部化，这也正好与地方政府公司化的内在逻辑是一致的。

四、地方政府公司化倾向的治理

1. 从思想认识上厘清关于政府的一些基本理念

我们有些地方政府，从其行为方式中可以看出，在他们的意识中，政府就是官府，就是权力的自然拥有者。我的工作就是发号施令，我要拆你的房子你就得搬，我要占你的地你就得滚。这与现代政府的要义差得太远了，与人民政府的宗旨就更不合拍了。英国学者洛克在17世纪发表的名著《论政府》中，批判了君权神授，肯定了议会选举、三权分立，是资产阶级现代政府理论的奠基之作。在这部书中，洛克明确指出：“在自然状态中人们就有财产权，政府成立后便必须保护它，而不能侵犯这种权力。”“政府的目的是保护财产”。这部书尽管是为当时的新兴资产阶级立命的著作，但它至少能给我们以下重要启示：现代政府的权力不是与生俱来的，不是无限的，必须在授权范围内行事，并对授权主体负责。作为现代的人民政府，必须在人民及其代表大会的授权范围内工作，并对其负责：对公民的合法财产必须保护而不能侵犯。如果这一观念牢牢地树立起来，地方政府公司化倾向中那些与民争利的行为就失去了合理性价值基础。

关于什么是“好”政府，我们的观念也存在极大偏差。不少人用“全能政府”的标准判断政府的好坏，认为政府管的事越多越有能力，越负责任，什么事都去找政府，政府也到处伸手去管各种各样它不该管的事情。久而久之，政府的权力没有边界。政府权力的无限扩张必然会侵犯公民的权利。所以，政府要做好它应该做的事，不该它做的事一定要紧紧勒住它的缰绳。

2. 从顶层设计上重构政府转型的有效路径

在目前地方政府公司化倾向业已形成，甩不掉的情况下，中央政府采取传统的上收权力的做法难以奏效，各种宣传教育、纪律约束的措施，作用也不大。让民众和其他社会组织来监督地方政府，由于缺少相应的制度保障和切实可行的操

作办法,恐怕也难有作为。寄希望于地方政府幡然醒悟,进行自律性纠偏,更是一厢情愿。低层次技术性的“转变政府职能”,已经进行多年,见不到有多少实质性进展。要使地方政府从“公司化”的泥沼中拔出脚来,实现由“公司型”政府向公共服务型政府的转变,一般化的改革力度肯定是不行的,必须着眼于全局和长远,从顶层设计开始重构政府转型之路。

顶层设计具有纲领性的意义,是抓总的,是管全局的。我认为一个重要的着力点和突破口就是应该像当年放弃阶级斗争为纲那样废掉 GDP 崇拜。国内生产总值这个指标,本身并没有什么过错,促其合乎理性的增长也没什么不好。但是,把它搞到拜物教的程度,一个由人们生产出来的东西反转过来变成统治人们的异己力量,地方政府及其官员为了追求它的增长,已经达到了不计代价的狂热程度。只有斩断 GDP 崇拜这条纲,才能把地方政府从“公司化”的羁绊中解脱出来。

积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这是顶层设计的又一个重要着力点。解决地方政府公司化问题,同其他许多重大问题一样,离开了政治体制改革的深入和跟进,是难有突破的。纠正地方政府公司化倾向,来自上头的动力是必须的,但更重要的力量源泉应该来自民众。这就是民主的力量。没有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没有公民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的落实,消除地方政府公司化的那些个弊端是不可能的。民主制的要旨就在于使执政者即管理者的命运能够被社会全体成员控制或者制约,而实现这种控制的手段就是通过选举、罢免、弹劾、监督、质询等民主程序决定执政者的命运。而我们的一些地方政府之所以能像“公司”那样去运作,以牺牲社会和公众利益为代价以自肥,就是因为这些官员的命运主要掌握在他的“上级”手里,而不掌握在他的服务对象民众手里。因此,他们在民众面前才敢于经常表现得那样傲慢和无理,而为了向上“邀功请赏”则经常搞“形象工程”和“政绩工程”。解决这样的问题,只有高层次的政治体制改革才能承担起这样的使命。

3. 顶层设计需有一系列具体制度创新作支撑

顶层设计是个纲,在这个纲的统帅下,还必

须有一系列相互联系且能形成整体效应的制度创新相呼应,作支撑。

首先必须改革干部考核任用体制。在衡量干部优劣的标准上,不能再让那些只顾自己“政绩”升迁,而不管日后洪水滔天的人屡屡得手。对那些习惯于按政府“公司化”方式运作的干部,不教而诛是不对的,如果在警示后他们还执迷不悟,继续我行我素,就应该有切实的招数使他们付出难以承受的代价。

应该大力推进政府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政府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目标,是由统制型的“万能政府”向有限的公共服务型政府转变。这个转变的核心是把资源配置的主导权交还给市场支配,减少强烈的数量扩张的行政动因,让市场规则发挥配置资源的基础作用,使政府行为回归服务本性。

应该大力推进财税管理体制变革。政府财政服务于公共利益,为社会和公众造福,这是公共财政的要旨所在。事实上地方政府财政的“公共”程度不完全、财政分配不透明、财政对竞争市场的干扰,财权不同程度的部门垄断甚至个人操办等情况,恰恰是导致地方政府公司化倾向的重要推手。地方政府的很多自利行为,都是在“保财政”的名义下出笼的。因此,财税体制改革的方向必须回归它的公共性。■

(作者为中共大连市委党校教授)

(责任编辑 杨继绳)

本刊稿件选用标准

一,本刊重点关注重要历史人物和重大历史事件,特别关注亲历者的叙述。

二,内容真实可靠,不可有任何虚构。文中重要引语,请注明出处。

三,篇幅不要过长,一般四五千字,长篇最好在八千字之内。

四,原则上一稿一投。如一稿多投请予说明。

五,投稿三个月以上,未接到采用通知,请作者另行处理。作者请自留底稿,本刊无力退稿。

本刊社址: 北京西城区月坛南街 69 号

邮政编码: 100045

本刊电话: 010-68534879

传 真: 010-68532569

编辑部邮箱: yanhcq@sina.com

走出秦城的周扬

○ 周 密

大约是1966年2~3月，肺部手术后的父亲到无锡休养。后来听说，是上海市委书记柯庆施邀请他去的。路经上海时，张春桥还登门拜访，表现十分谦恭。在热情接待的背后，他们正在紧锣密鼓地做一件大事，策划着“部队文艺座谈会纪要。”

1966年7月1日，正式揪出了“文艺黑线上的祖师爷周扬”。不久，父亲就经历了9年的监狱生活。

初出秦城

1975年7月13日正午，母亲突然顶着炎夏的烈日从城里换坐几次车赶到我家，落座后连气都没来得及喘就对我说：你爸爸明天要出来了，将住到万寿路西街7号中组部招待所。她叫我明天上午直接去那儿，并通知我在京的二哥周迈。来不及休息，妈妈又匆匆赶回她在东城沙滩的住所——一间6平方米的小屋。下午一上班，我赶紧到办公室给周迈打电话，什么也没敢说，就约他到西四某公共汽车站等我。我们找了个喝冷饮的小店坐下，我悄悄地、激动地告诉了他这个消息。在这特大意外惊喜的轰击下，周迈直愣着眼睛盯住我说不出话来。我叫他这两天先不必过去，以免爸爸过于激动身体出问题。并嘱咐他暂时保密，对谁也别讲此事。第二天上午我请了个病假，从办公室骑车赶到万寿路中组部招待所，终于见到了阔别九年多的父亲。

父亲已是满头白发，步履蹒跚，面色苍白，语言迟钝。我心中一阵酸痛。但表面露着微笑。母亲已在那里，她十分镇静，不提不问这些年来各自悲惨的经历，尽量说些轻松的话题。她说，咱们家人口没减倒增加了，周迈结婚并育有二女，周岳和周密也各添一女。说她在干校时哪个哪个熟

人养鸡、养猪、赶驴、赶马时出的洋相笑话。说她和住处的邻居相处得如何好，她学会做的酸菜、泡菜、豆腐乳如何如何有水平。爸爸一听也很高兴，说自己在狱中学会了缝洗被子，说每月可买30块糖，他每天一块计划着吃。但紧接着，他说听见外面大喇叭广播“最高指示”，说“周扬属人民内部矛盾”，叫我们打听一下。我和妈妈有点莫名其妙。下午，我先到办公室转了转，一切如常，很平静，知道今天没什么“最高指示”，悄悄对组长老阮讲了父亲放出一事，他给了我几天“病假”。我去商场采办了脸盆和一些洗漱用品，赶回万寿路招待所。母亲说关于“最高指示”可能是父亲的幻听。很多关久了的人刚出来都有幻听幻觉的现象，过几天就好了。果然，第二天父亲就不再提起。

我在七机部搞设计工作，自己主管一摊子事，还必须天天上班。那几天我一下班就骑车去看看。父亲的神经很快恢复正常，他很少谈及关押期间所受的折磨，只说耳朵残废是专案组人员揪打的。这些审讯者打人很有手段，一巴掌下去，头“嗡”地一声，有时人就昏过去了，看不出外伤。他最怕这些人对他几天几夜轮番审讯，几个百瓦大灯泡照在脸上不让睡觉，逼他承认是叛徒特务，他说，我没有被捕过怎么当叛徒？他困得睡着了，人家就拧耳朵扯醒他，以至左耳朵基本被扯掉了，残留的一半贴住耳孔长死了，变成现在这个模样。父亲谈这些事时，态度平静，好像在讲别人的过去。他更关心的是其他老同志们情况。听说不少国家领导人、老师、将军们遭了很多磨难，有的去世了，有的家破人亡，他很难过，甚至流下了眼泪。他总说：比起他们，我这算不了什么。妈妈也常说，我们已经不错了。

据父亲讲，这九年他基本上关在一处叫“交通大队”的地方，只是在最后一个月转到秦城监



1980年春，周扬在万寿路招待所

狱，监狱中生活管理比较正规，日子反而好过一些。进了正规监狱，他想此生大概就在监狱中度过了，于是拟定了一个学习计划。还说以前成天忙忙碌碌，没时间静下心来好好读书、好好想想。关押期间他已通读了马恩列斯毛全集，也算是九年来一大收益。他还想要一些书，催妈妈赶快去给他找或买。妈妈说，以前的家——东城沙滩子民堂现在军管住着，家里的书库已让红卫兵抄偷搞得乱七八糟，最糟的是，北京师范大学和南开大学的学生都在老师带领下进去过几次，挑走了不少有价值的书。而且现在也不可能进去，书店也没什么书卖，叫他老实休息几天吧，别老想着书了。

父亲最骄傲的是，这么多年来他从未服过安眠药，从未失眠过。他说：我这个人毛病很多，犯过很多错误，可我不反党不反毛主席，又不是叛徒特务，为什么睡不着呢？不过，出狱前几天接到专案组通知后，他在床边赶了三天，把“检讨书”写完交上去，在狱中住了最后一夜，这一夜他通宵失眠了。

在万寿路招待所

在万寿路招待所，父母住进办公楼二层一间大办公室，足足有30平方米。右边有一间约8平方米的小房间，大概是原来的资料间或秘书间，通门上着锁，左边通着一个厕所。办公室是50年代两开的毛玻璃门。大约第2~3天。我发现右边小间也住上了人，有一位三十来岁的军人出入。那个年代人们讲话都十分小心，我从屋里看见门

外一个站着的人影，显然是那个隔壁的军人有意站在那儿倾听。我不免心生愤怒，就大声在屋里嚷：“什么野狗在偷听，有种就进来谈谈吧。”妈妈急得冲我摇手，那人影立刻走开了。第二天妈妈笑着告诉我，隔壁来住的是黄克诚同志，他眼睛瞎了，那个陪着他的可能是警卫员或秘书，可惜没过几天他就搬走了。

这个办公大楼里还住着蒋南翔、舒同等人，大院里住过陈丕显、帅孟奇、宋任穷、王从吾、周桓、刘景范、马文瑞、强晓初、卓雄、侯金镜、郭小川……等等。住在办公楼里的在食堂吃饭，到锅炉房洗澡，那儿有几排淋浴喷头，每周男女轮流使用。招待所办公楼后面还有四座二层小楼，每楼可住两家，配有独立的卫生间和厨房。

开始几个月父母在食堂吃饭，逢周日我和孩子们去，或有客人来，就一块上街吃一顿，父亲要求不高，还是老湖南的特点，有红烧肉和辣椒就行。那时没有现在这么多吃饭的地方，我们常去的是翠微路商场旁边的小饭馆，偶尔也去新侨饭店楼下打打牙祭。有次在新侨饭店下面碰见几个京剧界名角，看见父亲都跑过来紧紧握着手不放，激动得流眼泪。那时父亲尚未“解放”，不好多谈，只向他们询问了几位名家的情况。对于经历了十年浩劫的文艺界人士来讲，过去的“文艺沙皇”周扬已经快变成慈祥老人了，他们那高兴劲我都感到意外。过了不久，原中宣部马关同志找到一个煤气罐，我找到一大块木板作厨案，又备了些锅碗瓢勺，就在厕所里搭起一个简易厨房，有时妈妈自己做做饭，总比食堂可口和便宜一点。

不久，又解决了洗澡问题。锅炉房的淋浴室地滑人多，容易出事。后来果然有一位老干部在那儿滑倒摔伤，不久便去世了。这人也姓周，也是湖南人，1926年的老革命，参加过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的老同志，就这么在锅炉房淋浴室摔死了。父亲那时年近七十，动作又笨，妈妈不放心他一人去，就只能打水在厕所兼厨房里给他擦擦身。后来舒同也住进这个大楼，他那儿的卫生间里有个澡盆。那澡盆多年不用，塞满垃圾，脏不忍睹。妈妈和他们去大清理了一番，说足足用了半盒去污粉才擦洗干净。之后，我父母、舒同、蒋南翔几个人轮流到彼处洗澡。用前，我妈擦盆放凉

水，他们则从水房各打一两壶开水兑入。每人每周能洗一次，直到搬走。

万寿路招待所大院住的几乎全是等待分配和等待“解放”的老干部。他们常在一起散步聊天，交流信息，生活得比较清闲，相处得很亲密。谁家得了或做了些什么好吃的，常常分送左邻右舍。谁的身体不舒服，需要看病拿药，左邻右舍通过各种关系找车送医院。

“四人帮”倒台前，万寿路招待所还是组织部长郭玉峰的天下，生活上的诸多不便主要靠老同志们之间相互照顾。

有一次，不知谁得到了一些足球票，老头们请招待所派个车去趟体育场。那年头得张票不容易，派车更难。据说，招待所所长请示了郭部长之后，同意派一辆专门运送院内垃圾的130小卡车去。老头们一听，干脆不去了。

不管郭部长怎么不痛快，来招待所看望这些老干部的人还是一天天多了起来。特别是当时已经复出的邓小平正大刀阔斧地搞整顿，大家都很高兴。来客们往往同时看好几家，也带来不少“小道消息”，这些消息多半是叫人充满希望的。有次章蕴妈妈来看帅孟奇妈妈，也顺便看看我爸，一谈，原来他俩不仅都是湖南人，还是小学校友。章妈妈鼓励父亲耐心等待“解放”，一定要把身体养好，年届七十的她还示范做了一套保健操教父亲。无奈父亲实在缺乏体育细胞。只好由母亲代学。

这期间，吴德、丁玲、冯雪峰等人的孩子都来看望过父亲，更不用说一大堆文艺界的老朋友、老部下了。有梁斌黄胄兄弟，陈荒煤夫妇，杨沫，等等，在北京的文艺界名人来得真不少。王昆阿姨心灵手巧，看见父亲的羊毛衫肘部破了一小块，她拿回去织补了一番，做得天衣无缝，连我妈这针线活儿不错的人都赞叹不已。任白戈的儿子会使缝纫机，他给妈妈做了两条布睡裤。“文革”前的炊事员小李，已经回农村了，每次来北京都带上他做的父亲最爱吃的一只烧鸡或一碗粉蒸肉。有个人从南方带来一大筐嘉兴粽子，下了火车就直接送到招待所，粽子多，妈妈赶紧分送大院内熟人。当时父亲前途未卜，党报上还时不时地批判他一下，朋友们这番真情关切给父母带来许多温暖。

我和孩子们周日才去，碰见的人不多。有一

次正好碰上父亲的老警卫员王保群带着老婆孩子来访。我们一块儿去翠微路小饭馆吃了一顿。王保群从1946年张家口时就跟着父亲，张家口撤退时他们刚从外地返回（当时妈妈带着我和弟弟一月前已撤走了），在他们赶回住所收拾完文件和被褥跑到院子里时，敌机已开始轰炸，街上人们四散奔逃，他们的马也丢了，王保群赶紧在路上抓到一头乱跑的毛驴，才和父亲仓皇跑出张家口。解放后他在文化部做些行政后勤的工作。没想到这么老实巴交文化不高、出身贫寒不贪不腐的老党员，“文革”中居然受周扬牵连被遣送回原籍。这次来北京看我父母时，他已知自己患肝癌，回去没多久就去世了。

1975年8月27日，中央专案组对周扬有个结论：“犯有严重路线错误，属人民内部问题。本人做了检讨。恢复其党的组织生活，原工资照发，补发审查期停发的工资，由中央组织部分配工作。”这几条指示当时的部长郭玉峰均未执行。

恢复组织生活，对于那一代人来讲比生命还重要，因为这意味着党还承认你是个党员。母亲从1972年起每月有20元生活费，后来又加到30元。她无处去交党费，就每月留下2元（后加到3元）用手绢包好准备将来交。1975~1976年父亲无处过组织生活，无异于头上还悬挂着一把利剑，不仅他本人，母亲和我也觉得是件大事。谁能想到三十多年后，不少党员懒于参加组织生活，借口病假事假躲着不去，不交党费没关系，工资里直接扣，想退党都不容易，时代在变啊！

原工资也没照发（父亲的工资大概是三四百元左右），每月30元生活费。好像是1978年底前后父亲才拿到全工资和补发工资，他们把补发的一半交了党费。母亲1975年6月就拿到补发工资一万多元，她给自己留了2000元，其余全部分给亲属们和一些生活困难的过去的工作人员。父亲出来后，她尽其所能买了三七粉天麻人参等补品给父亲吃，使父亲的身体很快得以恢复。

当时院内老头子们个个积极锻炼身体。父亲只会快速散步，每天按自定的标准在大院内走几圈。快步走完若是碰上伴儿，还能边走边聊，其乐融融。我见到过的就有宋任穷、郭小川等。有时他自己边走边想什么，还曾一头撞到树上。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总理去世，大院内

老干部们个个伤心落泪，父母和我们全家都痛哭失声。春节前几天我去万招，大门口碰见了聂力，她刚从宋任穷伯伯家出来，专程来此嘱咐大家春节期间最好在家待着，不要走亲访友，说现在形势比较严峻，叫我转告父母和其他熟人。3月下旬我出差去靶场，5月上旬回京，正在查“四五”天安门事件。7月朱老总去世，7月28日唐山大地震。万寿路招待所的墙根里侧



1984年5月，本文作者和父母在日本

掀起一溜塑料棚，一家一个。大女儿阳阳十四岁，乐得不用上学，正在一个棚下忙来忙去帮着姥姥料理家务。大地震后，父母搬进后面小楼去住，条件好多了。不久，又请了一个阿姨做饭，大大减轻了妈妈做饭洗衣的杂务负担。

用妈妈的话讲，那几年的生活虽然开始苦一点，倒真像回到了延安时代。对于刚刚经历了十年浩劫的父母来讲，确实过了几年充满希望和轻松愉快的生活。

父亲承受的最后一击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去世。10月6日，“四人帮”被抓，彻底倒台。招待所的老人们刚从悲愁的迷茫中醒来，一下变成欣喜若狂，中国终于从浩劫中走出来了。

父亲一生对毛泽东崇拜之至，不管毛主席一生犯多大错误，他都只往好处揣摩毛的动机。早在1976年前后，估计他就和有些人讨论过毛主席为什么要发动“文革”的问题，他对我说，有人说是“帝王思想”，另一些人说是“急于建成社会主义的极左思想”，父亲当时好像还没想清楚。不过在他眼里毛泽东仍是一个伟人，人无完人，伟人也一样。毛泽东去世时，他流下了真心的眼泪。

我理解父亲的这份真情。

1927年“4·12”白色恐怖开始后，父亲抱着一腔救国救民的热血加入共产党。上世纪30年

代中期，上海党组织遭破坏，父亲独撑局面，为保存左翼文艺做出重大贡献。但“他需要支持的时候没有得到支持。”又因他当时年少气盛，没有处理好和鲁迅的关系，挨了骂，带着一肚子委屈到了延安。

在延安，父母首先是有了回到家的感觉。不用躲避国民党的追捕。生活虽艰苦，但有了保证，不用为没钱发愁。他心情舒畅，工作积极。看来毛泽东对这个勤奋能干的年轻人也很赏识，安排住处，促膝谈心。当1939年底周立波到达延安时，父亲对他说：“立波，我们找到了自己的领袖。”不难想象，当年轻的周扬遇到一位雄才大略的领袖人物，并得到他的信任和理解时，他便自然地从心底生出“士为知己者死”的情结。从此，他跟定了领袖，跟了一辈子。完成了一个忠臣的使命。

对建国后中国历次政治运动直到“文革”的错误，他认为不能都推到毛主席一人身上，全党都有责任。30多年来，知识界文艺界受到的伤害最重，作为当年的领导者，父亲愿承担一切责任，从不上推下卸，他给许多蒙受了冤屈的老同志们道歉，不去辩白具体真相。人家骂他他也不在意。有时，连了解内情的妈妈和他的老秘书露菲大姐都愤愤不平，他就说：“人家委屈了二十多年，大半辈子都过去了，吐吐怨气骂骂人也可以理解嘛。”他和我谈到有人反对“伤痕文学”时说：“人家受了那么多伤害，为什么不能写写伤痕？”每当他对我说起这些老同志们经受的磨难和委屈时，从不提

及这些人本身的一些缺点毛病，我感到他的道歉完全出自内心，是坦然和真诚的。如果人们能从同情弱势者的习惯氛围中走出来，冷静地审视一下历史，他们会发现，如果胡风或丁玲当了权，正如贾植芳先生所说，可能他们“比周扬还周扬”。

“文革”之后的父亲，是能深刻反思的少数共产党人之一，以至被人看做是“党内异端分子”。我想是他没有把党走过的弯路只看成是毛主席和“四人帮”的错误，而是有着更深刻的原因。为了纪念马克思逝世100周年，1983年3月7日，父亲在中央党校作了《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的报告。这个报告是中央安排的。他在报告中讲到“异化”和人道主义的问题。报告说：“所谓‘异化’，就是主体在发展的过程中，由于自己的活动而产生出自己的对立面。然后这个对立面又作为一种外在的、异己的力量而转过来反对或支配主体本身”、“由于民主和法制的健全，人民的公仆有时滥用人民赋予的权力，转过来做人民的主人，这就是政治上的异化，或者叫做权力的异化。”没想到，这一段话引起了轩然大波，由此引发了批判“人道主义和异化”的重大政治事件。这一事件给了父亲最后一击，一年后他便倒下不起，直到去世。

记得1984年秋父亲住院不久，大约已进入冬季，听妈妈说，耀邦同志专门派人送来一个西瓜，那是朝鲜送给耀邦同志的，一共只有几个。当时反季节水果极少，不像如今一年四季水果都能买得到，所以十分珍贵。我觉得，在当时，胡耀邦同志也只能用送西瓜对周扬表示一点安慰而已。

晚年的父亲为大多数文化界知识界的人们称颂。至死忌恨他的是极少数。袁鹰回忆1984年12月29日的中国作协四次代表大会开幕时说，周扬从医院打来电话祝贺，“十秒钟的简单祝贺博得了两分钟的不息掌声。”“没有人发号令，没有人在主席台上带头，掌声完全是自发的，真心诚意的。”1月3日，356个代表自发签名的慰问信和十一个省、市、自治区的作家代表团的联名信送到医院。我看过这两封信，是用毛笔（或粗水彩笔）写在几张大白纸上的。这信的思想是真诚的，感情是深挚的。

在饱受病魔五年多折磨之后，1989年7月31日，父亲默默地走了。

我从机关赶到医院，父亲已经去了。老秘书露菲大姐已到，我六神无主，全凭露菲张罗。没多久，一些领导和父亲昔日的部下也来到医院，大家决定暂时瞒着住在医院的母亲。把父亲遗体送到太平间后，我们赶紧回家布置了灵堂。院子里已经来了不少文联的同志，在夏义奎同志和露菲的指挥下，一切有条不紊。

第二天开始，李瑞环、温家宝、王忍之、朱厚泽、翟泰丰等也来了，父亲生前战友部下学生朋友，母亲的熟人朋友学生，吊唁者络绎不绝，灵堂（客厅）摆满鲜花，只好把沙发搬到厢房廊下。院子里排满花圈。

父亲在三个单位任职：中宣部，社科院，文联。也应是官方的丧事办理单位，不过实际上的主要是文联的人。多半是夏义奎和露菲的部下，他们从早到晚不辞辛苦，有事我们一起商量，我就定心了。

习仲勋同志来了两次，关心得很具体，嘱咐一定要把丧事办好，看到他很难过的样子，我都不知道该说什么。宋任穷伯伯和钟阿姨来，建议把告别式定在9月，因为8月份中央领导人多数不在北京，同时，叫我把《周扬生平》稿好好找人看看。《周扬生平》原稿是顾骧同志写的，我作了少许修改，送交陆定一伯伯审阅。很快就收到了他的回信和回稿。陆伯伯比父亲有过更多的血和火的战斗经历，几十年一起工作，两人意见未必完全一致，平时私人来往不多，他们是“君子之交淡如水”的知己。有这些可信赖的长辈的支持，我不怕什么了。

9月5日早上，母亲坐在轮椅上到北京医院和父亲最后告别。她的眼泪早已流干，呆呆地看着父亲，抚摸着 he 干柴一样的手，坐了一会儿。她已虚弱得不可能去八宝山了。我托好朋友吴铁梅陪妈妈回友谊医院。一个多月后，妈妈也随父亲去了。

父亲的告别仪式十分隆重，从北京医院到八宝山，灵车队伍很长，前面警车开道，在长安街上由东到西呼啸驶过，引起不少行人驻足观看，好不威风。八宝山第一告别厅前人头攒动，花圈一直摆到了大门口，不够，又上库房取。中央领导人几乎全部到场。

（责任编辑 杨继绳）

朱瑞与“宁都暴动”

○ 郑建英

1931年12月14日“宁都暴动”，国民党第二十六路军1.7万余人加入红军队伍，极大地增强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这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兵运史上空前的壮举。“宁都暴动”距今即将80年了。这次暴动究竟是不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主要负责人又是谁？几十年来也发表了不少文章，除了当事人袁血卒多次提到外，其他人都没有提及。实际上，“宁都暴动”是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策划组织的，具体负责领导暴动工作的是中央军委兵运破坏科科长朱瑞。

一、亲自主持“宁暴”训练班

1931年2月，中央任命原中共长江局军委参谋长兼秘书长朱瑞为中央军委兵运破坏科科长兼中国红军士兵委员会主任。兵运破坏科的任务：一是培训士兵运动的骨干，培训后派到国民党军队中去开展士兵工作，发展地下党员，等待时机，发动“兵暴”；二是秘密同苏联领事馆取得联系；三是对国民党军队的某些上层将领进行策反工作，主要对象是国民党杂牌部队，利用其与嫡系中央军的矛盾，进行分化瓦解。

培养兵运骨干是兵运破坏科的最主要任务。为此，在科下专门设立了一个兵运训练班，由甘青山任主任。有些重要的训练班，也由朱瑞亲自主持培训。特别是中央军委派往宁都发动国民党第二十六路军暴动的训练班，就是由他主持训练的。

1931年3月，周恩来指示“中央军委朱瑞、李富春举办兵运策略训练班，并将参加学习的袁汉澄、王超、李肃派往国民党第二十六路军工作”。（《周恩来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212页。）

原西北军的地下党员袁血卒（当时叫袁汉澄）、李肃经中共河南省委军委方继纲的介绍，由王超带领到上海找中央军委。朱瑞先把他们安顿

在二马路中国旅馆地下室，要他们三人装扮成大学生的模样。朱瑞每次来给他们讲课时，总是头戴台湾式草帽，鼻梁上架着一副金丝眼镜，身着纺绸大衫，腋下夹着一把洋伞，脚上穿着一双铮亮皮鞋。大摇大摆地走进中华旅馆。从外表上看完全是一副大学教授的派头，和王超他们的大学生装扮十分相称。他谈笑自如，为了应付环境，他一边手里熟练地搓着麻将，一边给他们讲课。（袁血卒：《红五军团的诞生》。）

朱瑞首先向学员指出，我们这个班的任务是学习党的方针政策，了解当前的国际国内形势，分析二十六路军的当前处境和内外情况，确定我们的工作方针、对策。他明确告诉学员，“你们这次到江西去的任务，中央已经决定了，就是争取国民党的第二十六路军到革命方面来。二十六路军存在着直接革命的因素，胜利的大小就要看你们去江西的努力了。”说到这里，他又着重向我们介绍了列宁关于武装起义的教导，他说：“按照列宁关于武装起义的教导，争取二十六路军武装暴动到革命方面来吧！”（袁血卒：《忆“宁都兵暴”》。）

接着他就详细地给学员们剖析二十六路军的情况，鼓励他们树立必胜的信心。

他首先分析了二十六路军和蒋介石的矛盾；二是分析了二十六路军官兵同孙连仲之间的矛盾；三是他分析了二十六路军内部各部队之间的矛盾。朱瑞随后就为学员们安排了学习日程，并给学员们送来了《共产党宣言》的讨论提纲和《国家与革命》、《科学社会主义》等小册子。

不久，朱瑞就把他们搬到四马路振华旅馆二楼去住。这里条件比较好，也不再住地下室了。

如何开展敌军工作？朱瑞在讲课中对学员做了详细的论述。他要求学员到部队后，先进行观察，看准人之后，再交朋友，直至拜把兄弟；要结交那些出身苦，为人正派，讲义气，勇敢的士兵，然后逐步帮助他们提高觉悟。他说，士兵都是穷

苦人出身，容易接受普通的革命道理。在士兵有了一定的认识之后，就可以交给他们一些工作，先做一件事情，过些时候再做第二件，循序渐进，不要着急。经过工作考验，表现好的吸收他们参加党的组织，再通过他们去团结别的士兵。朱瑞反复强调，搞士兵运动，最重要的是要看准人，如果选错了人，自己掉脑袋是小事，党的工作受损失是大事。他要大家在这个问题上务必要小心谨慎，提高警惕。

朱瑞反复强调开展士兵运动，必须千方百计想办法打击国民党、蒋介石的威信。在讲解这个问题时，他举了一个很生动的例子。他说，我们一个从事兵运工作的同志，利用国民党士兵见了蒋介石的像都要立正的习惯，就偷偷在厕所的墙底处画了一个蒋介石的像。士兵上厕所见了蒋介石的头像，就一边立正，一边屙尿，一边笑，慢慢的，有的人就往蒋介石的头像上撒尿了，这样，蒋介石的形象、威信在士兵的心目中就自然降低了。后来这个同志又把一些连、排长的像画在厕所的墙上。连、排长知道后，就集合队伍，点名追查。查不出来就打士兵，这就引发了官兵的矛盾，为我们开展士兵工作提供了条件。（1981年7月13日访问袁血卒记录。作者在撰写《朱瑞传》的过程中，先后于1981年7月13日、1992年4月3日同袁血卒进行了整整两个半天时间的座谈，1994年7、8月间为帮助他整理《朱瑞与“宁都暴动”》一文又进行了多次深谈。他是解放后中共特支成员的仅存硕果，所提供的情况应是第一手资料。）

朱瑞每次讲课，都要留出一定时间让大家提问题，并当场给予回答。当时由于反动派的欺骗宣传，诬蔑共产党是共产共妻，社会上有许多不明真相的人，信以为真，对于广大劳动人民来说，他们一无所有，听说共产，内心深处还暗自庆幸，但对共妻，无论什么人，都认为这是伤风败俗的大逆不道的事情。这种居心险恶的反动宣传，在国民党军队中有很大的欺骗性，造成的影响也很恶劣。当时我们从事兵运工作的同志，由于受文化、理论水平的限制，虽也进行过反驳、解释，但总觉得道理说得不够透，效果不佳。有一次朱瑞讲完三民主义课程之后，大家就要求他专门讲解一下这个问题。他略加思索之后，就作了深入浅出、而且很有说服力的解释。

在学习期间，朱瑞还要求学员们“到黄浦码

头体验工人的生活”，以便增加他们对工人的了解和感情。

临行前的一天，朱瑞给他们送去了活动经费和到江西后同党组织接头的地点与联络暗号，并告诉王超，“如有情况需要向中央请示报告，可写信给复旦大学的袁凤渊收，他会把信件转给我。最后他还告诉王超，如遇紧急情况，来不及向中央请示，你们可以直接去同红军联系，就说你们中央军委朱瑞派来的。”（1981年7月13日访问袁血卒记录，1994年袁血卒在《朱瑞与“宁都暴动”》也写的是“复旦大学袁凤渊收”，1990年在《组织“宁都起义”的经过》一文中写的是“交通大学袁凤渊收”。）

二、从实际出发，调整要兵不要官的兵运方针，为“宁暴”胜利奠定了坚实的骨干基础

训练班结束后，王超、袁汉澄、李肃就离开上海前往江西，途经南京浦口时，遇见了二十六路军唯一的地下党员刘振亚。刘振亚听说他们三位是奉中央指示，到二十六路军开展兵运工作的，真似喜从天降，彼此竟忘记自己的处境而互相拥抱起来。四人结伴而行，欢天喜地奔向二十六路军。

他们到达部队驻地宜黄，稍事休息后，王超就召集大家一起开会，仔细向刘振亚传达了中央关于发动二十六路军兵运工作的指示。在讨论中央的指示、任务和具体方针政策时，刘振亚对中央提出的要兵不要官的方针提出了异议。他说，中央提出的兵运方针对一般国民党军队来说是对的，但从我们二十六路军的情况来说就不行。我们二十六路军的许多军官，特别是中下层军官都受过大革命的洗礼，北伐战争期间又深受刘主任（指刘伯坚）的教育影响。他们过去对冯玉祥追随蒋介石反共就不满；被迫到江西同红军作战后，这种不满情绪就更强烈。尤其是作战接连失败，不久前就给红军吃掉了一个旅，更引起他们的反思。赵博生经常找被红军释放的俘虏兵谈话，从他们口中了解到红军的确在红区领导农民斗地主、分田地，他心里很高兴。许多被抓的共产党嫌疑犯，押解到总部后，他就给放了。在中下级军官中，同情红军的也不少。这些军官只要我们的工作做得好，是有可能把他们争取过来的。我们

应该向中央写报告,说明二十六路军同别的国民党军队不一样,不少军官是可以争取的,争取过来对我们的兵运工作更有利,效果会更大。王超等人对二十六路军的历史情况也都了如指掌,认为刘振亚的分析入情入理,他的提议很重要,都赞成马上报告中央。于是,他们就按朱瑞事先规定的联络渠道,迅速向上海党中央写了报告。

不久,他们就接到了朱瑞的指示,“表示同意我们的报告。但要求我们必须把主要精力放在下层士兵的工作上。”(1981年7月13日访问袁血卒记录。)

根据朱瑞的指示,王超等四位党员就分别到总指挥部和各旅,按照中央的方针和部署,积极开展工作。二十六路军的中下层军官不少出身于知识分子,易于接受新鲜事物,爱国热情很高,对蒋介石发动内战、“围剿”红军十分不满,到了江西与红军交战后,虽不断失败,但对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政策已有所认识,而且从内心表示拥护。因此,兵运工作进展得很顺利,党的组织也得到迅速的发展。到七、八月间,先后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有七十三旅中校参谋兼学兵连连长李青云、二十六路军总指挥部译电主任罗亚平(深受总指挥参谋长赵博生的信任)、总指挥部执法队队长王振铎、七十三旅参谋郭如岳(深受董振堂旅长的信任)、机枪排排长王铭五、副连长熊伯涛(实为与党接上了组织关系)及李屏仁等十多名军官。他们都是后来“宁都暴动”的重要骨干力量。

三、端正兵运方针,成立中共特支,为“宁暴”胜利提供了组织保障

在发展党员的过程中也出现了严重的问题,如刘振亚介绍入党的中校参谋杨金堂、上尉法官王宏文不久就提出了退党的要求。王宏文甚至还流露出威胁的口气。王超、袁汉澄、李肃、李青云等商量后,决定按照朱瑞从上海出发时给他们的联络暗号,派李青云到上海直接向朱瑞汇报前一时期的工作情况和产生的问题。(1992年4月3日访问袁血卒记录。)

朱瑞听完汇报后明确指出,“宁都党的发展有官长路线的倾向,并指定袁汉澄(袁血卒当时的名字)与李肃深入到士兵中去。”(1992年4月3



朱瑞(1905 - 1948)

日访问袁血卒记录。)并要李青云转告王超、刘振亚等,必须严格遵守秘密工作的纪律。为了便于开展工作和保密起见,分别成立军官支部和士兵支部,另成立一个特别支部负责两个支部和二十六军的兵运工作。两个支部之间不许发生横向联系。朱瑞还强调指出一定要做好退党军官的善后处理工作,尽可能不使党的组织和工作受到破坏和影响。

王超、袁汉澄等听了李青云传达中央军委和朱瑞的指示后,进行了认真的讨论,认为这一指示是十分正确的。“我们在发展组织中也已经发现了这些问题。例如有些军官说‘叫我干共产党先骗几个钱再说!’有的质问‘领导人是谁,经费从哪里来?’七十四旅一营书记长柯植干脆说‘我不冒这个险,做个同情者吧!’这些都增加了我们对上层活动的忧虑。党组织决定按中央的指示改变工作。”(《李青云给刘伯坚的信和“宁暴”经过的报告》(1932年×月12日)。)

对中校杨金堂的退党请求,党组织一方面给予耐心的教育和引导,同时也给他施加必要的压力。经过多方面的工作,杨金堂向党组织说了心

里话。他说：我知道共产党一定会胜利，可是在胜利途中会有牺牲的。我家有老人和六七个孩子。我牺牲了，我全家就完了。他表示“我退党，决不伤害你们。”不久，杨金堂就请假回老家，到家后还给刘振亚写了封信，表示“他永不告密”。（袁血卒：《红五军团的诞生》。）对威胁要求退党的王宏文，党组织也采取了类似的策略和方式，做了妥善处理，从而保证了党组织的安全。

根据中央和朱瑞的指示，第二十六路军正式成立了中共特别支部。由刘振亚任书记，袁汉澄任组织委员，王铭五任宣传委员。特别支部下设长官支部和士兵支部，分别由刘振亚和袁汉澄负责。“李青云同志回到宁都执行了中央的正确指示，成立了干部支部、士兵支部及特别支部。”（袁血卒：《忆“宁都兵暴”》。）

中共特别支部的成立以及兵运工作中长官路线的纠正，纯洁了党的组织，增强了党的力量。按照中央和朱瑞“指定袁汉澄和李肃深入到士兵中去”的指示，特支决定把几个主要党员分散到各部队进行活动。党在二十六路军的兵运工作迅速开展起来，党组织的力量不断发展壮大。先后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有学兵连的王际坦（王幼平）、赵鸿志、杨艺林、谭时清、刘静生、霍万仲、蒋耀德等，总指挥部执法官孙步霞、杨履元、七十三旅上尉连长卢子美、董俊彦、七十九旅特务二排的田玉珊、李春华等十人，以及党的发展对象王鸿章、耿万福、刘向三、张燕南等。特支所属党员近二三十人。他们中大多手握带兵实权，有的还深受总指挥部和旅长的信任，如李青云、刘振亚、罗亚平、郭如岳，有的控制了二十六路军的要害部门，如总指挥部译电主任罗亚平控制了二十六路军的内、外通信联络，总指挥部执法队从队长到重要执法官都是党员和党的同情者，完全被我党所控制。这就为即将到来的“宁暴”胜利提供了组织保障。

四、批准赵博生入党，为“宁暴”胜利建立了指挥核心

1930年蒋、冯、阎大战后，冯玉祥的部队被蒋介石改编。不久，赵博生被任命为第二十六路军参谋长。第二十六路军被蒋介石派往江西“围剿”

红军后，该路军总指挥孙连仲因害怕红军和前线环境的艰苦，便以治牙为名躲进南京、上海享福作乐，把总指挥部的日常军务交由参谋长赵博生代行。在这种情况下，如能争取到赵博生的支持，对“宁暴”的胜负具有关键性作用。

赵博生，河北沧县人，出生于破落富裕家庭。他眼看军阀连年混战，国运日衰，广大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中煎熬挣扎，从小就萌发了救国救民的思想抱负。保定军官学校六期步科毕业后投身冯玉祥的西北军，曾任冯部旅长、军参谋长等职。他为人正派，体贴部属，带兵有方，英勇善战，深得官兵的拥戴。早在“大革命”和“北伐战争”期间，他就受到中国共产党和当时的政治部主任刘伯坚的影响。1930年蒋介石命令二十六路军去江西参加围剿红军时，他曾和董振堂秘密商量决定接受共产党的领导，等待部队开拔到江西后参加红军，为此还派身边参谋李青云到上海寻找刘伯坚，想与共产党接上关系。（董振堂：《“宁暴”经过》。）几经周折也没有取得联系，其愿望未能实现。

在如何争取赵博生入党的问题上，据袁血卒说，中共特支曾多次讨论过。主要的顾虑有两个：一是大家都知道赵博生思想进步，反对内战，对红军抱有同情心。如听到部属私下议论共产党红军的好话时，他不但不训斥查办，还以多种方式予以提醒、保护，同时对部队以赤匪名义抓来的老百姓（也可能是游击队员），他总是以各种名义加以释放。但如果真的提出要他加入共产党，不知道将会发生什么情况，心里没底。二是即使能争取到赵博生入党，像他这样的高级军官入党，中央会不会批准？这也是个大问题。经过讨论，大家一致认为，批准不批准赵入党的权限不在我们，但如何争取赵博生加入共产党是我们应该做的工作。

中共特支第三次讨论赵博生入党会议时，王超事先经过深思熟虑，拟了一封长达万余字给赵博生的信，在会上念给大家听，请大家修改。信的主要内容是向赵博生说明“九一八”事变后的中国局势和二十六路军的处境。这封信经过大家讨论、修改、补充后，决定由罗亚平通过某种方式送达到赵博生手中，并由他收集赵的反应。这样做的目的是，如果赵有入党的愿望，可由罗亚平帮助他找党的关系，万一情况不好，罗就可以直接逃往苏区。

时间一天天过去了还不见赵的动静，大家心里七上八下，很是着急。过了一个多星期，罗亚平满脸笑容地向大家报告了他试探的经过。他说，赵博生对这封信十分称赞，认为信中所说的内容“完全对”。赵博生还对罗亚平说：“我看这封信不是你写的。但是，与你有关密切关系……今天我找你没有别的话说，就是要你做我的引路人。我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别看我是参谋长，组织叫我们干什么，我就干什么。就算赴汤蹈火也在所不辞。”（袁血卒：《组织“宁都起义”的经过》。）大家听了都很高兴，心中的一块大石头终于落了地。

特支决定由王超亲自出面与赵博生谈入党问题。之后，特支就决定发展赵博生入党，由罗亚平做介绍人，并报请党中央批准。朱瑞接到特支报告后，迅速报请上海的中共临时中央负责人批准。

据原国务院粮食部副部长张永励回忆，他参加了1945年5月由中央主持在延安召开的五军团山头会议，朱瑞在会上就五军团的诞生发展过程做了长篇报告。在谈到赵博生入党问题时，有这样一段话他至今记忆犹新。朱瑞说“当时二十六路军党组织同时向中央报告了赵博生、董振堂的入党要求。中央在讨论他们二人入党问题时，认为赵博生思想进步，不论是在冯玉祥时代还是在蒋介石手下，一直担任闲职，不掌握兵权，实际上是一个失意军人。董振堂的表现虽然也很进步，但考虑到他一直担任师长、旅长，握有兵权，说明他要比赵博生更受到冯玉祥和蒋介石的信任。中央经过权衡比较之后，决定先批准赵博生入党。后来的事实说明，董振堂是一个一心向往革命，对党非常忠诚的好同志。因为当时还没有这样的认识，只批准了赵博生一个人。”（1992年2月26日访问张永励记录。）

“大概在十月底，党中央（朱瑞同志经手）批准了赵博生入党，是由我代表组织通知赵的，并举行了‘入学式’（即‘入党仪式’）。”（袁血卒：《组织“宁都起义”的经过》。）

可能由于当时的情况比较复杂，加上时间相隔久远，以至于所有回忆“宁暴”的人，包括当事人袁血卒都没有提到这件事。

批准赵博生入党，对“宁暴”的胜利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当蒋介石发现二十六路军有共产党活动，令逮捕该军共产党人时，赵博生及时按照特

支的决定，一方面与南京方面虚与委蛇，争取时间与红军取得联系；同时，与董振堂研究暴动对策，随后又与董一起同该部实力最强的七十四旅旅长季振同商量，把他和七十四旅争取到暴动行列中来。这样，二十六路军暴动就形成了以赵博生、董振堂、季振同为首的指挥核心，为“宁暴”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五、“朱瑞叫我来的”，为“宁暴”能及时得到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创造了条件

1932年12月初，中央决定让王超回上海汇报情况。王超在南昌接头时被捕。他身上所带的秘密文件被特务截获，其中有二十六路军地下党部分成员的名单。蒋介石知道这一情况后，于12月5日由南昌行营发出了十万火急电报：“责令第二十六路军总指挥部严缉刘振亚、袁汉澄、王铭五三名共匪分子，星夜送行营惩处。”电报被地下党员译电主任罗亚平截获，立即送交特支书记刘振亚。刘振亚当即召袁汉澄来商量对策。他们一致认为是王超出了问题，但王超决不会出卖党组织，否则通缉的名单第一个就是赵博生。两人遂以特支的名义做出决定：一是做好立即暴动的准备工作；二是由赵博生代行应付南昌行营，发出“遵令即办”的电报，并要他去同董振堂一起商讨暴动事宜，还要争取季振同共同举事；三是派袁汉澄进入苏区与红军取得联系。

刘振亚对袁汉澄说：“你要马上出发，接头暗号是‘朱瑞叫我来的’。这是你们离开上海时朱瑞同志个别向王超交代的，说是‘如果遇到紧急情况，来不及请示中央军委，可直接找红军联系，就说是中央军委朱瑞叫我来的。’王超离开南昌时，把这一联络信号交代给了刘振亚同志。”（1981年7月13日访问袁血卒记录。）

袁汉澄随即到赵博生处开了一张执法队的证明。急忙向苏区进发。他前脚刚踏入苏区固厚村，就被五花大绑捆了起来。幸好他能唱国际歌，赤卫队员们听了感到很惊奇，很快就给他松了绑，并把他送到了固厚村的彭湃县苏维埃办公室。县委书记霍步青询问袁汉澄有什么事？袁急切地回答说：“是朱瑞叫我来的”，说明了来意。霍

步青听后说道：朱瑞我认识，事关重大，要抓紧时间。随之给袁汉澄配了一匹马，派人把他送到叶坪的红军总司令部。

朱总司令听说二十六路军有人来送信，很快接见了袁汉澄。朱总司令和蔼地问他，你叫什么名字，是地下党吗？袁回答说：我叫袁汉澄，是朱瑞叫我来的。接着就向总司令汇报了二十六路军准备发动暴动的情况。

朱总司令第二天上午就召开中革军委会议，王稼祥、叶剑英、左权、李富春、刘伯坚等出席。袁汉澄向大家作了详细的汇报。会后，袁汉澄还得到毛泽东的接见。

在中央军委的直接关怀、领导下，1931年12月14日，国民党第二十六路军在赵博生、董振堂、季振同的率领下，举行了著名的“宁都暴动”。1.7万多名国民党士兵加入了中国工农红军。

关于“宁都暴动”，朱瑞在延安整风的自传中只有寥寥数语：1931年我回到上海后，改任中央军委兵运破坏科工作十个月，“先后训练了上10个同志，经我手派出了六七十个同志或进步士兵

到各军及兵工厂工作，‘宁暴’即其中有结果的活动之一。”

袁汉澄在《朱瑞与“宁都暴动”》一文中说：“二十六路军兵运工作的整个过程，都是在党中央和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央军委的直接关怀和领导下进行的。代表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直接领导我们工作的，是军委兵运破坏科科长朱瑞同志。从办‘宁都暴动’训练班到二十六路军地下党组织的具体工作方针、政策，都是在他的主持和指导下进行的。在各种关键时刻和重大问题的决策上，也是通过他给我们及时带来了中央和军委的指示，使我们的工作得以顺利进行。他对‘宁都暴动’所做出的贡献是不可磨灭的。”

聂荣臻在回忆录中指出：“孙连仲的第二十六路军，是1931年的夏天在上海与我们联络成功的。他们通过搞兵运工作的朱瑞同志，与军委接上了头。1931年12月14日，二十六路军举行了著名的‘宁都起义’”。■

（作者为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研究员）

（责任编辑 杨继绳）

（上接第38页）料，学习研究，就这样慢慢地把这个专业办起来了。

第三，创办学术刊物。学术刊物是学术成果的集中体现形式之一，通过办刊物可以团结一大批国内外的学者。但更为重要的是，通过办学术刊物，可以促进学术交流、了解学科的发展前沿，快速提高我校教师的科研水平。当时，学校办了

四种刊物，这些刊物的重点是物理学。通过这些刊物，我们的教师有了表达自己学术思想、展示成果的机会。很多教师因此提高了自己的学术水平，逐步成为在国内外有一定影响的人才。

（作者为我国资深教育家，华中科技大学原校长，现95岁）

（责任编辑 杨继绳）

《炎黄春秋》精品书系介绍

1998年推出的《炎黄春秋》精品书系，是从《炎黄春秋》1991年创刊至1995年计45期650万字中精心筛选出的重点文章150万字，编辑为五卷珍藏本，分别为：《政坛高层动态》、《重大决策幕后》、《历史迷案揭秘》、《名流写真》、《血荐轩辕》。该珍藏本出版后一度脱销。应广大读者强烈要求，精品书系五卷珍藏本再版发行，以弥补本刊早期合订本售罄之不足。

由于数量有限，恕不分卷出售，欲购从速。定价125元，另加邮资12元。汇款地址：北京市西城区月坛南街69号，收款人：炎黄春秋杂志社，邮编：100045，联系电话：010-68532048，传真：010-68532569。



对主粮转基因的忧虑

。 丛亚平

中国是世界最大的产稻国(稻米产量占世界1/3),也是世界最大的稻米消费国,13亿人以此为主粮。保证中国稻米的品质 and 安全性,是有关国之命脉的大问题。

然而,2009年11月,农业部向华中农业大学研制的两种转基因水稻颁发了安全许可证书,我国主粮转基因化迈出了第一步。由于转基因产品的安全性存在很大争议,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对自己的主粮实施转基因,更不用说为转基因主粮发放安全许可证了。

对此,几百名专家、学者、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和社会公众发出了强烈呼吁,对我国主粮的转基因化(转基因大米产业化商业化)提出批评。他们认为,主粮转基因化的危害有以下几个方面:

转基因作物存在重大安全隐患

为打消公众的顾虑,一些转基因专家故意混淆“转基因”与“杂交”的区别,然而转基因与杂交有着本质上的不同。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研究员蒋高明分析:“杂交”多发生在同属或同科的物种之间,亲缘关系很近,因而融合后不易发生冲突,而“转基因”是不同的类群之间跨界转换基因,如将深海里的鱼的动物基因转到西红柿这种植物上。“杂交”在自然界可以自然发生,而“转基因”则是用基因枪强行介入,把完全不同属不同科甚至跨界的物种强行放在一起。

转基因食品及作物为什么会是不安全的?这是因为生态系统是一个不断演化、高度复杂,高度稳定的系统,任何动物、植物都是经历了千万年的演化逐渐形成,万物之间有一个互相适应和影响的过程,这种过程是一种缓慢的进化和适应进程。而转基因是用基因枪快速地将不同物种的基因硬性拼合在一起,而且两者或三者之间跨界甚远,硬放在一起的基因会产业怎样的冲突和演

变,谁也无法预料。就像我们人类的器官移植,即使是同种族人,甚至是有血缘关系的直系亲属之间移植器官,尚且会发生排斥反应。可以想象一个鱼(动物)的基因转移到一个西红柿(植物)上,会产生什么样的连锁反应和无法预料的异变!转基因这种快速融合的方式,并没有给它们彼此之间及与周围环境之间留下相互适应的时间,而这一过程只能在漫长的时间筛选中才能完成。因此转基因这一反自然的操作方法,可能在解决了一个问题的同时制造或引发了更多的问题。

中科院一位生物学家说:目前大宗粮食作物真正转基因成功的并不多,主要存在的问题就是基因转完以后很不稳定,转的基因很容易丢失和变化。生物的染色体系统是经过长期进化的结果,在短时间内转入外源基因后很容易造成原生物本体的系统紊乱。转入的外源基因在生物系统内很容易产生一系列的未知物质,这些新物质与生物体内的各种物质如何反应,最终生成什么,谁也不知道。人类只能检测已知的物质,但对于未知的物质,根本就无法检测。无法知道后果的东西贸然推广,是很危险的。

无数例证已证明转基因有害健康和繁衍

国内外的许多动物实验早已表明了转基因作物具有潜在危险。1998年,转基因研究权威、英国科学家阿派特·普兹泰教授研究证实,用转基因土豆喂养小白鼠110天后,老鼠个头比普通老鼠小很多,老鼠的肝脏、心脏甚至脑部都比正常老鼠小,免疫系统被损坏。阿派特·普兹泰在电视台公开表示自己不会去吃转基因食品,并说“作为35年从事这一领域研究的科学家,我认为把人类当做小白鼠一样来做实验是非常非常不公平的。”2005年5月,英国Monsanto公司的研

究再次表明，食用了转基因玉米的老鼠肾脏变小，血液的构成发生变化。

第一种大批量进入市场的转基因食品是含有 rBGH 人工生长激素的牛奶，rBGH 激素不仅刺激了奶牛的产奶能力，同时也刺激了另一种激素——胰岛素样生长因子 (IGF-1) 的产生。1991 年，弗蒙特大学的一位科学家向媒体透露：很多证据证明，注射过 rBGH 激素的奶牛存在严重的健康问题，包括乳房炎、乳腺增生和胎儿畸形。

2004 年 1 月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检查官员宣布他们发现了 rBGH 中含有过量的有毒物质，孟山都最终不得不宣布他们将供应减少含有 rBGH 中的 Posilac 产品。

2004 年，美国国家科学院发布报告说，转基因作物的种植和食用对人类健康、动物健康和生态环保已经造成危害或具有严重潜在的安全威胁，而目前人类还没有足够科技知识能力预见、防治和弥补那些威胁及危害。

美国国家科学院的报告列举了世界各地转基因出现异常的试验报告：食用了转基因玉米的猪，在美国中西部农场出现假孕或不育；食用了转基因玉米饲料的母牛，在德国实验农场非正常死亡；食用转基因饲料的鸡的死亡率比使用自然饲料的死亡率高出两倍；英国市场出现转基因大豆食品后，居民的过敏症上升了 50%，巴西出现同样状况……

2005 年 7 月，俄罗斯公布了具有世界轰动性的转基因喂养小白鼠的试验报告。俄罗斯科学家叶尔马科娃博士的实验数据表明，在小白鼠交配前及在怀孕期间喂食转基因大豆，一半以上的小白鼠刚出生后就很快死亡，幸存的白鼠 40% 生长发育也非常迟缓，有些母鼠不再有母性本能。叶尔马科娃提出，只要转基因产品无害性还未被证明，世界各国所面临的风险就仍存在，不育症、过敏症、慢性中毒，以及基因突变等疾病随时可能将人类逼向绝境。

2007 年，法国科学家证实：孟山都公司出产的转基因玉米对人体肝脏和肾脏具有毒性。国际著名的生物安全专家杰克·海勒曼博士介绍：在 2007 年到 2009 年末，由法国科学家艾瑞克·索拉里尼带领的科研团队在转基因作物的动物实验中发现了相当确凿的对动物有害的证据，他们

的发现得到了国际同行的高度评价。2008 年，美国科学家也证实了长时间喂食转基因玉米，小白鼠的免疫系统受到损害，该研究成果发表在同年《农业与食品化学》杂志上。同年 4 月，美国政府主管食品药品的部门 FDA 宣布撤销它在数年前颁布的 CRY9C 转基因玉米种植的工业指南，原因就是该转基因作物对人类健康安全有严重威胁。

印度在哈里亚纳邦的调查也表明，大多数吃了转基因棉籽的水牛有并发症，如早产，流产，不育，并子宫脱垂。许多小牛死亡。在美国，大约 24 个农民报告说，奶牛和公牛进食了转基因玉米后不能生殖。美国地缘政治学家威廉·恩道尔所著的《粮食危机》一书中载，一些农民向他提供的照片证明，农民用转基因玉米喂养母牛后产下的幼崽有很多先天性缺陷，很多幼崽死亡；加拿大和奥地利使用转基因大豆喂养的生猪不能生育。奥地利科学家在用老鼠喂食转基因玉米的研究，也发现它们所产的下一代不但数量少，而且体形也小于正常的幼鼠。用基因大豆喂雌性大鼠，大多数婴儿在三个星期内死亡。给雄性老鼠喂食转基因大豆后，其睾丸从粉红色的正常色转至深蓝色，公鼠的精子被改变，母鼠体内的胚胎基因也被改变。

而在我国非法种植含有杜邦先锋转基因 PH4CV 的玉米“先玉 335”的许多地方（例如山西和吉林）报告，经过 3~6 年种植后，当地发现了前所未有的生态异常现象，最常见的是体型较大的田鼠急剧减少，老鼠绝迹，母猪生育异常，许多饲养母猪的农户反映母猪产崽数大减，仔猪养不大就莫名其妙地死亡。粮农专家顾秀林分析，转基因作物仅仅三五年即已表现出对生态系统的强大杀伤力。在 5~6 年的时间内，老鼠可以传递 20 代以上；老鼠生命周期最短，因而表现最突出，出现了绝迹；三五年按照猪的自然生命周期可传 3 代，已显示出出生能力下降和存活率低；而 6 年不到人生命周期的 1/10。人没绝迹只是因为时间周期还不够长。老鼠类耐受逆境的能力超过人类，对老鼠不安全的生态环境，对人更不安全。如果中国人吃转基因粮食延续 3 代的话，会不会出现老鼠绝迹那样的后果呢？这是令人不寒而栗的。

美国华裔女科学家侯美婉是转基因领域的知名专家，曾是美国国家基因学会基金会研究员，还担任过美国科学社会学所所长。她多次在联合国和世界银行就生物科学问题作证，极力反对草率判定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侯美婉说：“在实验室里，不论何时何地，不管用的是什么转基因作物，也不管这种转基因作物到底转了什么基因，也不管拿转基因作物来饲养的是什么动物，只要独立科学家们进行饲养试验，就会发现更多的死亡、不育、发育迟缓以及一系列的器官功能障碍。”

早在 2000 年，侯美婉就主持起草了一封世界科学家致各国政府的公开信，全球有 828 名科学家在这封公开信上签名。公开信揭示，英国和美国政府内部消息源已证明，关于转基因作物对生物多样性和人类及动物健康造成的严重危害性已没有任何疑问。公开信列出了 29 条要求重新审视转基因的理由，并呼吁科学家们要关注转基因生物对生物多样性、食品安全、人类和动物健康的危害，要求暂停在自然环境中释放基因修饰的植物。

此后，质疑转基因食品危害的美国政府机构越来越多。2009 年 5 月，美国科学与环境医学会（AAEM）发出的一份文件指出：“一些动物研究显示，食用转基因食品有严重的健康风险。”包括不育，免疫问题，加速老化，胰岛素的调节和主要脏腑及胃肠系统的改变。他们得出结论：“转基因食品和健康的不利影响之间存在因果关系。”“转基因食品和疾病两者之间的紧密联系和一致性，在多次动物研究中已被证实。”

AAEM 的这份文件呼吁：“可能的话，医生、医疗界要提供有关转基因食品和健康风险的教育材料，教育病人和市民大众，避免转基因食品。”文件转述密歇根州的内科专家艾米的话：“我强烈建议病人完全食用非转基因食品。”

世界著名生物学家普什帕米巴尔加在审查了 600 多个科学期刊后得出结论：转基因生物（GMOs）是使美国人健康急剧恶化的一大因素。

由于转基因生物的严重危害性，欧盟和日本等国家一直对转基因食品持排斥态度，我国出口的米粉中曾因检查出转基因稻米成分而被撤架和召回。作为转基因大国的美国并没有将主粮小



麦转基因。对于转基因食品的反情绪在英国、奥地利、意大利、匈牙利、希腊和法国也很强烈。韩国和印度也坚决拒绝转基因作物的进口。印度虽同样是水稻的生产和消费大国，却选择了坚决拒绝转基因水稻的政策。

除中国以外，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对自己的主粮搞转基因。一位医学工作者说：“即使你的转基因食品是绝对安全的，也应该至少在灵长类动物进行试验，然后在一个可控的人群中小规模进行试验，若干年后再进行安全评估，再考虑是否推广。医学上的新药尚且如此，而中国的转基因食品却给耗子吃完立刻大规模推广给人吃，跳过了两个环节直接把 13 亿老百姓当成了活体实验动物，这是非常草率的。”

核心专利缺失将使我国口粮受控于他国

转基因粮食与传统粮食不同，传统农业可以从收成中留种，但转基因种子必须每年都购买新种子。原因有两个：一方面是因为转基因作物不稳定会产生退化；另一方面，是美国孟山都等垄断企业为了防止农民留种，发明了“终结者技术”，这种技术能够自动杀死种子的胚胎使得作物无法留

种。这样,跨国巨头便可以轻松地保证农民必须每年购买他们的种子,以保证自己巨大的商业利益。这将对中国的粮食主权将构成威胁。

转基因粮食的核心技术掌握在外国人手里,使中国的粮食安全存在巨大隐患。据国际绿色和平组织调查指出:我国正在申请商业化种植及正在研发的8个转基因水稻品系中,没有任何一种拥有独立的自主知识产权。相反,上述转基因品系至少涉及28项国外专利,分别属于美国孟山都、德国拜耳和美国杜邦三家跨国生物技术公司。孟山都在转基因粮食方面申请了533项专利技术,几乎覆盖了粮食生产一切环节,这意味着中国一旦大面积推广转基因粮食,每年都要向美国公司支付昂贵的购买粮种费和专利费。

除专利外,孟山都还迫使农民必须使用转基因种子专用的除草剂、化肥,农民一旦使用了美国的转基因种子,就必须每年向孟山都等美国种子供应商购买新种子和化肥、农药。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威廉·恩道尔在《粮食危机》中披露,上世纪90年代后阿根廷发展到99%的大豆都是美国孟山都的转基因大豆,孟山都公司通过与阿根廷种子公司签订专利使用权转让协议,对转基因种子收取额外的技术费,使当地农民不得不以比常规种子贵2~4倍价格购买转基因种子,更为严重的是让阿根廷很难再重新走向依靠自己种子种植的道路。

对我国贸然推进转基因水稻、玉米的商业化种植,国内著名育种专家李登海表示了他的担忧:“我国率先放开转基因种子商品化,将引起很多不可预计的后果。我国大型作物转基因研究基础很薄弱,拥有的合法基因很少,99%以上的专利被国外控制。除种子专利外,转基因专用除草剂、化肥等也几乎控制在人家手里”

转基因的环境风险:物种灭绝与生态灾难

转基因作物在种植中会通过花粉授粉等环节,在风力作用下发生基因‘漂移’,污染四周的农作物和植物,还会通过区域内的动物将变种基因携带到四面八方,这将引发生态危机。专家分析,导入转基因作物内的外源基因可以逃逸到同

一物种的非转基因作物内,污染当地非转基因品种和众多物种资源。例如转基因玉米的BT毒蛋白,毒素会进入食物链而到达其他植物和农作物中。如果抗虫转基因稻米被批准产业化,也会按这种机制对生态系统造成损害,甚至会对我国养蚕和丝绸业构成威胁。其他植物通过直接摄入含有毒素的花粉,动物通过间接途径如捕食吃了毒素的昆虫等,也会使基因污染扩散,减少自然中帮助控制害虫的益虫益鸟数量,从而危害整个生态系统,危害非靶标生物,灭绝中国的许多自然物种,导致基因资源流失,由于作物育种需要依赖于多样性的遗传资源,因此野生稻种、植物的丢失,将影响我国的自然育种业和粮食安全。随着生物多样性的丧失,伴随而来的还有病虫害袭击的增多和自然生态的凋零。

转基因水稻商业化种植,将导致中国丰富的水稻基因资源的毁灭。我国曾是全世界大豆的故乡及原产地,是主要的大豆出口国,然而现在,国外转基因大豆已经占领了中国80%的市场,我国天然的非转基因大豆业岌岌可危。我国也是野生稻、天然水稻物种极为丰富的国家,然而我国对外资的超国民待遇将会使外国大型生物技术公司垄断基因技术专利,将加快我国这类资源的流失。

转基因作物对生态环境的破坏(基因污染)已在许多地方发生过。据蒋高明介绍,2001年发生的“墨西哥玉米基因污染事件”、2002年的“转基因玉米混进美国大豆事件”、2006年“转基因大马哈鱼逃逸事件”,还有“在中国发生的转基因棉花盲蝽爆发事件”等等,都是转基因作物商业化种植以及转基因动物实验过程中,基因污染的典型案例。美国也由于研发的转基因鲑鱼逃逸到野外而造成野生鲑鱼基因污染事件,引发了当地渔民的强烈反对,抗议野生鲑鱼灭绝及对渔业环境的污染。

顾秀林教授指出,因为转基因农作物对非转基因种植者和环境的影响太强烈,基因漂移污染环境太厉害,美国法律规定,在两类农地之间必须有500米宽的隔离带。而在中国人多地少,如何能实行这种隔离种植?所以,中国基因污染的危险性更大。转基因水稻一旦合法化,基因污染是不可避免的。

转基因危害的风险防控完全要依赖严格有

效的管理,然而在腐败横行、法治不彰、执法不严的中国,所有的管控规则在权力和金钱面前完全无效。因而,一旦放开口子推行转基因粮食产业化,管理风险将比其他发达国家大许多倍。

来自美国杜邦先锋公司的转基因玉米“先玉335”借杂交品种之名在中国大规模扩散,国内种植面积已达4000万亩,大面积污染了中国原生动植物的基因,并已造成严重生态恶果;而转基因水稻多年来从华中农业大学非法散布至华东华中各地,我国人民的主粮大米事实上已经被转基因污染,许多不想吃转基因食品的民众面临无法选择、无法知情的痛苦。绿色和平组织几年前就揭示我国有大量的转基因大米在不为人知的情况下流入市场和人们的餐桌的情况。然而至今未见政府对任何责任人和违法机构进行惩罚和制止。相反,当环保部门调查证实“先玉335”确是转基因玉米后,农业部本来应立即采取措施阻断转基因的非常种植,然而做的却是不让此信息被公布。

此外,转基因稻米对环境产生的负面影响还包括,会培植出令人更加头疼的“超级杂草”和“超级害虫”。转基因作物在最初种植的几年,确实在抗虫和抗杂草上显示出优势,然而,生物界各物种是不断变化、适应和抗衡、竞争的,一种杂草被杀灭,自然界会长出更强大的杂草来填补空间;一种害虫被抑制,又会产生许多新的害虫,其进化产生的抗性迫使农民施用更多的农药。国内外许多地方的农民不得不面对更加难以对付的生态灾难。

印度由于种植孟山都的转基因棉花,几年后新的棉花害虫、抗BT害虫、新疾病带来的生态灾难横行,土壤耗尽营养和有益微生物,收成锐减,有的农民由于破产没出路而自杀。

2010年2月,国际科学史权威期刊《ISIS》以《转基因农作物在美国面临崩溃》为题揭露了此事。美国国家科学院的报告用16年的实践事实和统计数据明确说明,长期种植转基因作物会给农业经济带来无法纠正弥补的副作用。一直坚持认为美国农民从种植转基因作物中获益的美国农业部也终于改口,美国农业部的最新统计承认:种植转基因后,农田作业的燃料成本提高了一倍多、农药的用量超过了对天然作物的使用,



种植、种子成本也大幅度上升。

转基因主粮产业化将使我国走上不归路

一旦大规模推广转基因主粮,我国非转基因粮食的种子由于基因漂移污染而不复存在,即使到时发现转基因作物的严重后果想要重新回到传统农业和生态的路上,也由于自然种源的消失和土地的被污染而使我们再也无法恢复。转基因稻米产业化和商业化生产的不可逆性,是各国都不同意贸然在主粮上搞转基因的主要原因,因为他们明白,一旦踏上了此途,就是走上了不归路。

值得关注的是,不管美国政府是出于商业利益还是战略考虑支持转基因作物开发和向外出口,但美国政府始终有个底线:严防转基因作物侵入现有的天然农业生产系统和天然食品供应系统。美国的天然农田面积远远超过转基因农田面积,而且,转基因农田大部分都是远离天然农业和与世隔绝的新开垦田地。美国法规保障美国有足够质量和数量的天然农田作为战略储备,即:一旦造成巨大危害而不得不放弃转基因作物和现用农田时,美国还有足够的天然农田养活全体美国居民。中国却不具有这样的条件!中国万万不可踏上这条不归路!

2010年6月,由于转基因问题的不断暴露,引起世界各地越来越强大的反对浪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政府已明确提出,第一代转基因作物的种植和应用对人类健康和生态环保构成严重的安全威胁,如果现在不马上改变思路和做法,转基因技术很可能就此夭折。

孟山都、杜邦等公司在感受到了美国官方态度的微妙变化和民众的抗拒怀疑后,不得不宣布将改变转基因技术的路径,其子公司将开发“新一代转基因”大豆,其开发思路与第一代转基因截然不同,不再“植入”外来基因,而是“关闭”或抑制某些可能会产生问题的基因,采用基因沉默技术。显然,孟山都、杜邦也意识到像过去那样挑战天然和违背自然的发展思路造成许多问题,将“转”基因调整为有选择的“关”基因,孟山都承诺新一代的转基因作物将真正进入环境友好和保障健康的轨道,然而这次的承诺能实现吗?顾秀林教授认为,生命是自然演化的过程,不管是“基因插入”还是“基因沉默”,都是干扰生命的微观结构和功能,都违反了真正的生命科学。“转基因这条技术路线从根本上就错了,在一条错误的路线上拐个弯继续走,仍然回不到正途”。

美国制造的转基因作物被实践证明不仅对人、对动物不安全,而且对环境、对生态也不安全。中国采用已被淘汰的“基因插入法”搞出来的两种转基因水稻,在测评过程不严谨、测评程序不公开、测评人员名单不公布、测评机构缺乏独立性的情况下,农业部仓促地对13亿人吃的主粮颁发了转基因安全许可证书,这是多么轻率的政府行为!

转基因产业背后有着明显的利益链。他们在安全评估中不可能坚持客观的科学的立场。中国转基因研究机构和转基因带头人大都与洛克菲勒财团有持久联系,其中有的人成为孟山都等公司的利益代言人,实际上中国围绕着转基因技术已组成了一个自我强化的利益集团,甚至中国转基因生物安全委员会里的一些基因专家都在开办推广销售转基因种子的公司兼职。

中国有更好的出路——生态农业

鉴于种植转基因主粮对我国“种族安全、国家安全、经济安全、环境安全”等方面的风险和危害,因此,走绿色、有机的农业发展之路,才是我国农业真正的可持续发展之路。具体有以下建议:

第一,立即取消农业部转基因生物安全委员会推广转基因水稻和玉米的批准证书,立即停止转基因主粮的商业化生产,其他转基因食品的生产要严格控制,严格规定标识。重新审查转基因

产业政策。

第二,通过提供优惠政策,支持农民自发的农业合作社,拨款修复水利设施。研究制定措施使农民能从种粮中得到实惠,提高农民的种粮积极性。采取措施鼓励低成本又环保的生态农业在中国壮大,让中国的土地状况和生态状况得到彻底改善。

第三,建议国家把更多的资金投入支持生态农业研究和绿色农业的产品项目上。2008年国家给予转基因作物项目研究资金达200多亿元,相比于此,国家用于支持符合中国国情的生态农业、绿色农业的研究资金连百分之一都不到,逼得国内许多农业研究人员为了要拿到资金都去搞转基因。

(本文作者为新华社世界问题研究中心研究员)

(责任编辑 杨继绳)



2011年第4期目录

书屋讲坛	告别激进主义	郑佳明
	对信仰危机的体会	石天河
人物春秋	《中央国家机关党委对一百零六名右派分子处理意见》研究	丁东
	也谈谈我对“沈崇事件”的见闻	丁磐石
	个人崇拜是专制体制的惯性	
	——从赫鲁晓夫到勃列日涅夫	陈为人
	读章培余烈士遗文《民生说》	袁剑平
	“护法国会”议员方镇东	
	——消失在辛亥革命历史尘埃中的一卒	桑叶
灯下随笔	“审父”大作面面观	衣郎
	诗人与排行榜	朱玲玲 张中
	以“人”的名义质询	李晓灵
流年碎影	拾听弦断的余音	邓跃东
	文人为官不自由	
	——作为教育部副部长的陈布雷	叶隼
口述历史	“我是马占山将军的军需官”	
	——百岁老人林秀衡访谈录	丁品
思史佚篇	对一撰句由来的求索	陈华东
	俭素:校训与国魂	刘畅
书林折枝	“过客”也是客	杜兰朵
	“最好的文学批评是最有偏见的文学批评”	
	——《新文学档案:1978—2008》读札	韦照周
湖湘人物	情深而文明	
	——张默君的乡邦记忆与诗骨清刚	秦燕春
前言后语	《在天上看见深渊》跋	邓晓芒
	首义金剛,护法斗士	
	——《辛亥功勋高振霄事迹录》序	皮明庥
域外传真	刺破王朝循环怪圈的利器	李南央
编读往来	相遇《书屋》	张昭卿

邮发代号:42-150 月刊 每月6日出版 定价:6.00元
地址:长沙市韶山北路443号《书屋》杂志 邮编:410007
电话:0731-85791300 85486812 传真:0731-85790197
邮箱:nlh5314@263.net

对《四渡赤水评价考》的看法

○ 张幸仔

夏宇立先生在《炎黄春秋》上发表的《四渡赤水评价考》，从军事上的得失和参与者的评论两个角度，质疑毛主席四渡赤水“用兵真如神”的那段历史。作为一个改革开放后出生，从军12载，对军事颇有兴趣，同时编辑过夏宇立先生书稿的晚辈，我想谈谈个人对这篇文章的看法。

夏宇立先生在《评价考》中，坦承“通观四渡赤水的全过程，已经很清楚，处于劣势的中央红军在数倍于己的敌军之中艰苦转战，并最终摆脱了敌军，这的确了不起，值得大笔褒扬赞颂。”说明夏宇立先生认为从战略上讲，四渡赤水通过积极运动与作战，粉碎了蒋介石的“追缴”并且“合缴而聚歼之”的战略意图。

红军不但逃出了六倍兵力的围追堵截，而且在蒋介石已经看出其北上与红四方面军会合的意图后，利用战略上的欺诈，奔袭贵阳调动敌军注意力，成功渡过乌江，迈出了与红四方面军会师的重要一步。

可是，在夏宇立先生看来，这个成绩不算什么：“然而，话又说回来，当年红军在转移中，面临强敌的围追堵截是经常的，而红军通过自己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粉碎敌军的围追堵截来实现自己的战略转移目标和任务，又是十分正常的。否则，只能面临失败的结局。”而且其他红军部队“同中央红军比较，显然还都有两个方面的比较优势：其一，损失相对较少；其二，沿途都还创建了新的根据地”。

凡事，有因才有果。红一方面军是带着党中央一起行动的，而且受到蒋介石直接指挥的国民党嫡系部队外加地方武装围追堵截，红二和红四方面军如果被围歼，并不代表党中央的灭亡，至多是一场军事上的失利，而如果红一方面军在长征中灭亡，中国历史将被改写，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也将被改写。

机动灵活确实是我军以弱敌强的法宝，但是

这正是红一方面军开始长征时，所可望而不可及的。从江西于都转移出来不仅有部队，还有中央政治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各部门、中央军委各总部、兵工厂、印刷厂、制币厂甚至印制邮票的设备。彭德怀管这叫做抬着棺材走路。这副担子是红二和红四方面军所没有的，即便完全丢掉不必要的辎重，大量非战斗人员，仍然会拖累部队的机动能力。这就要求中央红军在行军时，战略欺诈与战略机动相结合，不然在敌军重兵围堵之下谈机动，那是天方夜谭，在李德的领导下，不要说战略欺诈，连机动灵活都是奢望。

中央红军如果停下来建立根据地，那更是蒋介石所盼望的事情，红军离开于都经过湘江之战的惨败后，实力锐减，当时被五、六倍的敌军追剿。本来，地方军阀武装为了在与红军的战斗中不消耗自己力量，被蒋介石乘虚而入，愿意以追代剿，如果红军站住脚建立根据地，等于侵占地方军阀的地盘，那军阀对待红军的态度就不同了。

红二和红四方面军的比较优势是建立在红一方面军的比较劣势上，夏先生的这种比较是为了比较而比较。

《评价考》中，描述了张闻天、彭德怀、林彪、杨尚昆、黄克诚甚至朱德和刘少奇都对毛主席在四渡赤水中的军事表现不满（更不要说李德和博古）。很难想象这些我党、我军卓越的政治和军事领导人，是如何在极度不满后又漠视毛主席继续行使领导红军的权力。按作者的话，毛主席指导下的四渡赤水：“连续‘乱碰乱撞’，打了一连串的败仗、窝囊仗”。然后，毛主席在“明白了权谋的极端重要性”后，组成了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三人军事领导小组。

李德军事上的失败，必然导致其退出中国革命的历史舞台，既然四渡赤水如此失败，仅凭“权谋”毛主席就可以不顾批评而稳坐钓鱼台，还能

反手再去批评林彪“是个娃娃”，张闻天“是个书生”？林彪说四渡赤水“走弓背路”，张闻天说是“打圈子”而国民党追击部队的师长万耀煌却说：“共军转个弯，我们跑断腿”。我党我军的领导干部都是身经百战的革命者，生死存亡之际，连共产国际派来的洋顾问都敢让他下课，毛泽东却能越级依靠“权谋”上位？

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三人领导小组，王稼祥被作者质疑不懂军事而成为毛主席要“权谋”的证据。战场形势瞬息万变，即便现今美国军事独步天下，还要专门照顾“时间敏感”目标。不惜重金打造一小时全球打击系统，而红军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就进攻打鼓新场还是鲁班场，竟然组织 20 人的军事会议，一连商量两天。《孙子兵法》之（原稿没“之”）《计篇》记有五事，第一就曰“道”，所谓道的目的是“令民与上同意也”然后才能“可以与之死，可以与之生，而不畏危。”那么 20 人的会议，争论激烈，一天都谈不下来，是因为李德等人这个“上”由于连续的军事失败，已经无法被信任。没有“上”的红军等于是没头的苍蝇，怎么谈“同生共死”。此时的红军是“最后五分钟”，毛主席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竟然要被说成是“权谋”所惑。……

谈到权谋，就还要提一下夏宇立先生在文中提到三渡赤水前，毛主席因“情绪上有些激动和陶醉”不听林彪和聂荣臻的建议，不打较弱的黔军，而非要和蒋军嫡系战斗的情节：

“会上，毛泽东向大家表示，打鼓新场不能打，‘打又是啃硬的，损失了不应该，我们应该在运动中去消灭敌人嘛’”。

而与会的大多数人都不同意毛主席的意见，认为应该打打鼓新场。而进攻鲁班场的战斗也没有达到预期。作者由此来佐证毛主席“乱碰乱撞”。

根据作者在文章其他部分，也引述过的《杨尚昆回忆录》所记：

毛主席坚持不打，理由是红军主力要在两天后才能赶到打鼓新场，那时滇军和黔军也将赶到，加上川军的侧击，“打又是啃硬的，损失部队不值得。”（杨尚昆：《杨尚昆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7 年，第 132 页。）

根据 1935 年 3 月 11 日毛泽东、朱德和周恩

来下达的《关于我军不进攻打鼓新场的指令》：

据昨、前两天情报，犹（禹九）旅已由西安寨退泮水，如见我大部则续退新场。滇军鲁旅已到黔西。12 日可到新场，安、龚两旅则跟进。依此，我主力进攻新场已失时机。因我军 12 日才能到达新场，不但将为黔滇两敌所吸引、且周（浑元）川两敌亦将出我侧背，如此转移更难，所以军委已于 10 日 21 时发出集中平家寨、枫香坝、花苗田地域之电令，以便寻求新的动机。（姚有志、李庆山：《红军举世罕见的二十大战役》，白山出版社 2008 年，第 262 页。）

由此电文结合战斗后红军迅速三渡赤水，我们可以看出此次战斗，除消灭敌人外，更主要是为了吸引敌人的注意力，为再次进行战略机动做准备。因此，战斗的关键除了消灭敌人外，更重要的是不能“转移更难”。就连蒋介石都看出打鼓新场是“共匪西窜的必经之路”布以重兵，红军自己还送上门去，显然不是我军的作风。而夏宇立先生学者出身，是研究红军历史的专家，为何忽略掉以上的关键文字？

另外，打鲁班场虽然有损失，但是从战略上看，国民党中央军装备和训练普遍都好于地方军阀。因此，红军打地方军阀合乎常理，不但林彪、聂荣臻这么想，连敌人也这么想。所以，进攻打鼓新场不存在战略上的突然性，而进攻鲁班场则不同，正是由于鲁班场敌人装备较好，能力较强，又是嫡系部队，因此有松懈的可能性。这符合中国军事上的虚实转换的观念，如果都是堂堂之阵，红军很难说不会有更大的损失。

毕竟长征不是长征组歌，如果说长征组歌不够客观，那么以不客观对不客观，就能对冲出真实的历史？当年把长征神化和简单化，只突出一方面军，放大主要人物作用的样板戏“唱法”，都是违背历史真相的，现在全面否定，还是没逃出样板戏的窠臼。■

（责任编辑 吴 思）

本刊公告

2009 年简装合订本(上、下册)105 元

2010 年简装合订本(上、下册)105 元

免费挂号邮寄，汇款地址见本刊目录页



谭启龙(1913~2003)

谭启龙的饥荒调查

○ 肖 磊

由于1958年“大跃进”、人民公社的折腾(刮“五风”也是由此引

发),造成了连续三年多的严重饥荒,给国家和人民的生命财产带来无可估量的损失。

在山东,这场饥荒在“大跃进”的1958年冬即暴露出来,1959年春全面爆发。当时全省许多地区已是满目荒凉,路有饿殍,非正常死亡开始蔓延。

山东各地许多群众、干部纷纷向省委来信、来访,反映饥荒的严重情况。山东省委书记处书记谭启龙同志(后为第一书记)从四面八方的告急信及各地党委的灾情报告中认为:形势十分严峻,而并非报纸上说的“大好”。为了回答被颠倒的形势评估,并研究造成严重困难的真正原因,谭启龙同志带领部分干部,于1959年春赴济宁、菏泽两地区调查研究。他用了两个月的时间,走遍了两地区的十几个县,100多村庄。在鲁西南辽阔的大平原上,他见到的是破败的农村,一片惨相,听到的是广大群众“要吃饭”的呼声。同人民公社一起诞生的“食堂”,只几个月就无粮可炊,连烧柴都没有。群众家中已是家徒四壁。青壮年是农业生产的主力,因没饭吃,已面黄肌瘦,有的患水肿,已无力劳动。老人和孩子的景况可想而知,有的已气息奄奄。有的群众全家外逃,有的逃出去又逃回来,说外地灾荒更严重。

随着“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兴起,“五风”(共产风、瞎指挥风、强迫命令风、浮夸风、干部特殊化风)猖獗,“共产风”刮得最凶。农村群众私人喂养的大牲畜全部归公,因缺少草料,全部饿死,耕种土地不得不以人代畜。农村生产力破

坏殆尽。“共产风”刮尽了群众家中的一切。做饭的锅全被砸光,一方面为了炼钢,另一方面是逼着吃食堂,结果没有炼出钢,食堂艰难地办了几个月就无粮可吃了。还有的公社推行实物储蓄,强令群众交出桌椅板凳、箱子柜子,名之曰“高息投资”。大批的家具堆在广场上,风吹雨淋,无人过问,成了一堆烂木头。村头、庭院的树木全部砍光。

谭启龙同志作了两个月的调查后,在济宁市召开了济宁、菏泽两个地区公社党委书记以上的干部会议。在会上,他把两个月的调查中,亲眼看到、亲耳听到的种种饥荒惨状向与会人员作了介绍(与会人员对饥荒都了解),并提出了解决困难的措施。会后,省委把谭启龙同志的“济宁讲话”印发给地、县、社党委及省直各厅、局。经过传达学习,各级干部认为“有了希望,有了信心。”

谭启龙同志在济宁的讲话,主要披露了当时的灾情、困难的真相及其发生的原因。他对“大跃进”、人民公社并由此引发的“五风”,特别是“共产风”,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尖锐地指出:“‘大跃进’的热度高到一定程度了,发烧烧到说胡话,是小资产阶级的狂热病。”“是左倾机会主义、冒险主义。有人说:‘得不偿失的说法不对’,我看就是得不偿失”。“这种情况(指当时灾情)我还没见过,简直不如旧社会。这是党在历史上脱离群众最严重的一次。”“生产力的破坏,比八年抗战、三年解放战争毁的都厉害,比日本鬼子的三光政策都厉害。‘共产风’不是一般的风,比台风还厉害,是旋风,是龙卷风”。“不是一般的伤元气,是严重地伤筋动骨。恢复起来需要十年八年。搞不好‘三面红旗’成了‘三面黑旗’了,人民公社成了人民的敌人了。”“这样下去,别说增产,保产也保不住。”“现在是一触即发之势。有的群众说:‘再过半年都成土匪了,有中央军我一定干。’我是党内

反对派，党内缺乏孙安，要提倡孙安精神”。（引自1959年春谭启龙同志在济宁市的讲话）

为了扭转困难局面，谭启龙同志在尖锐地指出问题的同时，又提出了建议，主要是：首先要抢救群众的生命，不能再饿死人。为此要停办食堂，公社要把粮食发给群众，要他们在自己家中做饭吃。群众没有饭锅，有铸造条件的厂子生产铁锅供应群众。公社的土地分给群众百分之三十，群众可以租种公社的土地。大牲畜实行“六定”，分户喂养。开放集市贸易。在不影响国家计划的范围内，允许群众进行自产自销的贸易活动。

1959年5月29日谭启龙同志以个人名义把以上的讲话书面报谭震林和中央。报告发出后没有下文。

地、市、县、社的干部听了谭启龙同志的讲话，认为这是“苦口良药”。但上面不表态，下面不敢越雷池一步。两个月之后，庐山会议召开。会议中因批评“大跃进”、人民公社的错误而大批彭、黄、张、周。谭启龙同志自知在劫难逃，等着挨整。据说因没排上“俱乐部成员”得以幸免。

庐山会议后，发动了“反右倾”运动。凡是对“大跃进”、人民公社、大刮“五风”有不同看法或说了与“三面红旗”不相宜的话，就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受到各种处分下放劳动。此后最高领袖狠批了“单干风、翻案风、黑暗风”，强调了阶级斗争。但谭启龙同志不改初衷，仍坚持认为“大跃进”、人民公社是破坏生产力的根源。他为了进一步揭露破坏生产的弊端，又于1962年上半年派人到齐河县作调查，写出了“一个生产大队遭到严重破坏的情况报告。”报告列举了1958年以来大伤元气的事实：三年内人口减少百分之四十二，耕地减少百分之三十七，牲畜基本死光，不能应付生产。社员生活十分困难，妇女不孕，人的身体很弱，恢复很困难。建议提倡“保本田”、“借种田”。又说：“听少奇同志讲，安徽包产到户，恢复很快，今年好过。办法多种多样，应该百花齐放。”

齐河县“一个生产大队遭到严重破坏的情况报告”，上报到华东局、中央，下发到地、县、社党委。地、县、社的干部见到这个文件很受感动，认为：如能照这个文件办，农村生产力三五年就可恢复，困难局面就会得到根本的好转。但这个报告如

同1959年5月29日的报告一样——没有下文。

农村生产力尚未得到恢复，群众生活还比较困难，又开展“四清”运动。“23条”上规定：“四清”主要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四清”工作队扎根串联，组织贫下中农阶级队伍，大整村干部。有些地区群众流行顺口溜：“斗村干，吃饱饭。”大多数村干部被斗一遍，农村生产、生活问题仍未解决，只是不像三年灾害时期大批饿死人。

“四清”运动尚未结束，又发动急风暴雨式的、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1967年春，造反派夺了山东省委的权，省委书记全被打倒。第一书记谭启龙同志首当其冲，对他一次又一次地批斗。1967年夏，造反派召开批斗大会，专批评谭启龙同志1959年春“济宁讲话”、向中央的报告及1962年齐河县“一个生产大队遭到严重破坏的情况报告。”无理指责“讲话”和向中央的报告是“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是“攻击‘三面红旗’。”造反派手持谭启龙同志在济宁的“讲话稿”，和向中央报告的存档原件，逐段宣读，逐句追问，逼着谭启龙同志交代：“为什么说‘三面红旗’快成了‘三面黑旗了’？为什么说比八年抗战、三年解放战争损失都厉害？”谭启龙同志毫不含糊地回答：“共产党员如实地向党中央反映情况嘛！”造反派气急败坏而又野蛮地对谭启龙同志施以打骂侮辱，还大叫着：“这是对谭启龙的无产阶级专政。”并高呼：“造反有理”。笔者从收听批斗现场的有线广播中清楚地听到造反派对谭启龙同志的打骂声。面对造反派的打骂，谭启龙高亢地回答：“我准备牺牲了！”造反派仍骂声不止。

谭启龙同志是“红小鬼”成长起来的领导干部。面对造反派野蛮的摧残，更加显出他的革命傲骨和气节。

十年浩劫终于结束。“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解放了长期被禁锢的思想。谭启龙同志以高度的热情撰写文章，投入这场思想解放的大讨论。并以他亲身经历的实践说明“左”的思想路线的严重危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让谭启龙及全党坚持真理的同志的进言和愿望得到体现，也被历史所证实。■

（作者为山东省检察院退休干部）

（责任编辑 杨继继）



童大林(1919~2010)

著名诗人泰戈尔有诗曰：

如果您在黑暗中看不见脚下的路，就把您的肋骨拆下来，当做火把点燃，照着自己向前走吧！

童大林就是这样的人。他1919年8月出生在福建厦门。15岁，就积极参加共产党领导的地下革命活动和抗日救亡运动。家贫，1936年，去香港一家罐头厂打工。1938年初，以上年年终工厂发放的二十多元“双粮”作盘缠，独自跋涉到武汉后辗转转到延安革命圣地。

1993年，中国友谊出版公司出版了童大林著的《人类新时代》一书。童大林说，关于这个概念，作为人类的空间概念，不是几个民族、几个地区、几个国家所能包含的；而作为时代的时间概念，则涵盖更久远，不是几年、几十年，基础也不是一两个世纪的问题。它涉及的问题很多，话题很广，非常繁杂。书中主要谈一些比较迫切的关于中国的发展、繁荣，从改革开放走向“人类新时代”的全球化、现代化的发展战略。

承认差异，尊重差异，百家争鸣

这本书的开篇，就特别赞赏马克思的一段名言：

“你们赞美大自然悦人心目的千变万化和无穷无尽的丰富宝藏，你们并不要求玫瑰花和紫罗

追思童大林

○ 林开明

兰散发出同样的芳香，但你们为什么却要求世界上最丰富的东西——精神，只能有一种存在形式呢？”（马克思：《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第7页。）

“世界是丰富多彩的，有各种各样社会制度，价值观念，意识形态，文化背景和历史传统。在这个丰富多彩的世界上，用一种模式是做不到的，甚至是危险的。”

“承认差异，尊重差异”。这是人类人生哲学的精华。

在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中，思想、政治、经济等领域，各有其自己独特的发展规律。

由于世界多样化，永远处于无限变化之中，于是：

多样化——不平衡规律出现了；

多样化——竞争规律出现了；

多样化——青出于蓝规律出现了。

……

“春秋战国的诸子‘百家争鸣’，它是人类思想发展的一条普遍、共同的规律，是人类思想史上最大的创造。

应该重新认识‘五四’运动不仅是中国一国之事，而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席卷全球的民族独立运动的先声与前驱。这是中国‘五四’运动的世界意义所在”。

在另一篇《人类在新启蒙中》又强调：“由于以高技术为主导的新产业革命的兴起和经济的国际化、全球化，人的智慧和个性将进一步升华高扬，使人的自由发展达到一个新的高度。科学、民主、平等、自由、自主、法治等等将成为现代人的生活方式。人类要彻底摆脱贫困愚昧，全世界要走向富裕与繁荣，现代文明。”

破传统常规 倡导市场经济

童大林是著名的经济学家，兴趣相当广泛。对于经济学、科学学、教育学、人才学、美学，都有涉猎。他为人正直、宽厚、求真、务实，富于开拓创新。

恩格斯的“思维者的悟性成了衡量一切的尺度”这句话，不断激励他解放思想，为改革开放思与辨、鼓与呼。

改革开放初期，童大林无恐无畏，突破禁区，大胆倡导新经济政策。1987年，由《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的童大林著的《改革的脚步》一书冲破了“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观点，书中指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理论与实践，是科学社会主义的新发展。商品经济是人类社会一种共同的普遍的经济规律，而非资本主义的‘专利品’。供求关系是商品经济起决定性的因素。供求不平衡规律是一条普遍的共同规律。”

书中还提出“股份制是社会主义企业的一个新基点，是现代市场经济的一个支撑点。”在书中他强调，“经济体制改革必须过好‘五关’即价格、工资、税率、利润、汇率，并对这五个方面进行综合调节。价格改革应与金融改革、工资改革等其他方面的改革相配套。对现代市场经济进行宏观调控，已不是一国之事，而是国际性，全球性的宏观调控”。

这些经济观点引起强烈反应，受到一些人的批评。童大林坦然处之。勇立潮头，不怕风浪。“文革”中的九年监禁（时任中宣部秘书长），丝毫没有动摇自己的信念，而且更加坚定不移：要改革计划经济，建立市场经济。

1992年10月，童大林出席东京“日本国际关系论坛”召开的《日本对亚洲社会主义经济改革的反应》会议。会上，他发表了《中国改革的世界意义与中日经济合作问题——兼论改革开放的背景·目标·不可逆转性》的演说，“……发展市场经济是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一条普遍的共同的客观规律。无论哪个国家、地区，哪个社会阶级、阶层，只有真正掌握、运用这条规律，才能兴旺发达。反之，它就处于困难、停滞、衰退的困境。”

“现代市场经济，实际上是世界范围的市场经济。现代市场经济，在高技术兴起和新产业革命条件下，其特点可大体概括为：信息化、金融化、知识产业化、全球化。……并不是说市场经济有姓社姓资的问题。”

同年12月，童大林（时任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兼总干事、顾问，中国世界观察研究所所长）应邀出席由世界五大研究所（美国布鲁金斯研究所、德国IFO经济研究所、法国法兰西国际关系研究所、英国皇家国际问题研究所、日本野村综合研究所）联合召开的“'93东京论坛”，讨论：“市场经济新世界图景。”他发表演说，以古诗：“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说明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代表大会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恰似许多梨花一齐开放。他预言：市场经济一定会成为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强大动力。

开拓区域经济 奔向“现代丝绸之路”

童大林认为：当代的历史潮流——全球合作。

通过地区化和全球化的合作，来促进各国、各地区之间的共同发展、共同繁荣，这是新时代的要求。

“中国自古以来，就出现过相当发达的国际间、地区间的贸易关系，如古代的丝绸之路。近代以来，长期处于闭关自守和被封锁的状态，尤其是20世纪中期之际，中国同世界范围的现代化进程严重脱节了。改革开放，决定建立经济特区和经济技术开发区，开放沿海城市和一批地带，实行全方位开放。”这是一个大战略、大政策、大转变。

1990年8月，他向有关部门提出了《在现代丝绸之路上飞奔》的建议。把我国全方位开放的区域布局分为五个区域。

第一个区域——东南沿海经济区域。它包括：福建、广东、海南、台湾、香港、澳门。这个地域应该逐步形成一个经济合作区，或称经济共同体，或称共同市场、联合市场。

第二个区域——以上海为龙头的长江流域

经济区。

第三个区域——陇海、兰新经济区域，它应该同黄河流域交织起来。

第四个区域——东北亚经济区域，它是一种跨国界的国际经济合作区域。这个区域包括我国东北三省、内蒙古东部、环渤海圈以及苏联远东地区，蒙古、朝鲜半岛和日本。

第五个区域——大西南。

由于北疆铁路和苏联（俄罗斯）土西铁路的接轨，亚欧之间第二条大陆桥即将出现。这条亚欧大陆桥，东起连云港，西至荷兰鹿特丹（世界第一大港），横跨亚欧两大洲，穿越中国、苏联（俄罗斯）、波兰、德国和荷兰，辐射二三十个国家和地区，连接太平洋和大西洋，可谓“现代丝绸之路”。据测算，这条大陆桥比起横经西伯利亚的第一条亚欧大陆桥，总距离缩短 2000 到 2500 公里，从连云港至西欧，比绕道印度洋海运，运费可节省 20% 以上，运期可缩短 50% 左右。

如果兰新铁路再接南疆铁路或公路，南下巴基斯坦和印度，就把三大洋——太平洋、大西洋和印度洋连接起来。这样，欧洲和亚洲的经济合作就会出现新的格局，新的繁荣。

发展现代市场经济不断冲击人们的观念，无论个人、企业和社会都需要吐故纳新，呼吸“新鲜空气”。观察海内外，博采众家之长，对照借鉴，充实自己。在他创办的世界观察研究所里，经常聚集了一批老革命、学者、专家，如吴象、李慎之、朱厚泽、吴明瑜、何方、王殊等，大约几人，个把月来一次聚会，观察世界风云，畅谈国家大事。还把一些议论的重要专题，组织专人调查研究，并将研究成果报送中央，作为中央决策参考。

中国世界观察研究所还与《环渤海经济瞭望》杂志，联合办刊，组织著名学者、专家，为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走向现代化，出谋、呐喊。从 1994 年到 1999 年就有费孝通、杜润生、于光远、马洪、龚育之、冯之浚、季崇威、萧灼基、杜光、厉以宁、王殊、何方、刘吉、朱厚泽、项南等，以及日本、韩国、马来西亚、新加坡、澳大利亚、美国的专家、学者、名人为刊物撰文：“走向跨世纪，谁领风骚”、“组织起来，加快环渤海地区国际国内经济合作”、“中国经济的发展的问题与市场前景”、“中西部开发十二题”、“把太平洋、大西洋、印度

洋联结起来的新亚欧大陆桥”、“经济全球化”……等等，对中国的改革开放起了启迪和促进作用。比如，刘吉写的“中国经济发展的第三次浪潮”一文，就说：“80 年代看广东，90 年代看浦东”，由南到北，到 2000 年，到 21 世纪，中国经济发展的第三次浪潮，将在何处？我认为，在环渤海地区。他分析环渤海地区具有第三次浪潮的历史的、地理的和人文的资源诸条件，认定，第三次浪潮，环渤海地区要后来居上。

如今，果然如此。环渤海地区蓬勃发展。青岛、大连、锦州、葫芦岛、东营、烟台、威海直到承德、石家庄、呼伦贝尔、满洲里等 30 多个城市，近年都进入了发展快车道。比如，天津滨海新区，很大一部分土地原是荒滩。如今，高楼林立，经济科技文化迅速发展，已初步形成航空、航天、电子信息、汽车及装备制造等新型主导产业。现代金融、现代物流、服务外包、文化创意等新兴优势产业不断崛起。荒滩泥沙盐碱地变成了黄金国土。

兴科学教育 摆脱贫困和愚昧

童大林认为：

“地球是富饶的，世界仍然贫困；

大脑智慧无穷，人们处于愚昧之中。

自古迄今，人类社会一直存在着一个最‘老大难’的问题，就是贫困和愚昧。”

“要使人类摆脱贫困与愚昧，是一个极其困难、极其复杂的历史过程，仅仅依靠科学技术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包括经济的发展，社会的改造，人类自身的觉醒。

——在未来的年代，不同社会制度和国家，谁优谁劣，谁胜谁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教育和科学。”

他把世界与中国、政治与经济、科学与艺术、历史与现实结合起来，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阐明了一套现代教育学的观点。强调建设一个现代化的、高度民主的、高度文明的社会主义强国，要有一代又一代的社会主义新人。“要一代胜过一代”，教育应当成为促进社会、经济、科技发展的基本任务。1960 年春，他同北京师范大学和中宣部机关党委的同志一起倡办北京景山学校。把它作为中小学进行教学改革的试验学校。二十多

年来，这所学校取得了不少教学改革的成功经验。

1983年，国庆前夕，邓小平同志特意为景山学校题词：

“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

这个重要题词为我国教育事业和各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指明了战略方向。

童大林认为，“现代教育就是用新的科学与技术培养出新型的现代知识劳动者及其优秀的人才。可以说，现代教育是新的生产力的标志。推进教育、科学和经济的互相结合、互相促进、共同发展，是摆脱贫困与愚昧的关键。”

在此之前，1977年，童大林先后担任科学院办公室主任、副秘书长、党组成员，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党组副书记的时候，就强调：

“人脑 + 电脑：人类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动力”；

人脑 + 电脑 = 现代化。

他强调教育是提高人类能力的基本，是新产业革命的一个主要内容。新的历史时期，教育将成为各国在世界上生存、发展以至争雄的第一位战略产业。他对我国教育和科学技术政策、知识分子与人才问题提出了许多重要的建设性意见。他大力推动科学技术和教育管理体制改革，坚持在科学和教育中实行对外开放。并多次率团出国访问，商讨双边科技合作，推进中国科技体制的改革和科学教育的发展战略。

童大林曾任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副主任、党组成员。他积极组织、领导拟定全国体制改革的总体设计方案，研究、筹划和指导全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工作；撰写并出版有关我国体制改革、区域经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全球发展战略方面的出色文章和书籍，为指导和促进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确立和发展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但仍未尽他意。他认为，改革开放，还要解放思想，开放思想，自由争鸣，加强科学的调查研究，切实解决现实中的问题，解决权贵集团与腐败的问题。

与吴明瑜、刘吉合著《当代资本主义问题引论》一书中说道：“有人统计，当今世界有53种社会主义。有真社会主义，也有假社会主义；有这样规范的社会主义，也有那种模式的社会主义。

……社会主义只有创造出比资本主义更高的生产力，并通过公平分配、共同富裕，实现比资本主义更好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才成其为社会主义。”

“经济基础变革必然要求上层建筑相应变革。因此，随着经济体制变成现代市场经济，必然要进行与之相应的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等一系列改革。否则，经济改革不可能完成。”（见《人类新时代》第158页）。

上世纪80年代中期，邓小平曾多次强调要推进政治改革。三十年后的今天，政治体制改革仍然面临老问题的困扰。不进行政治改革，中国就没有未来。

“以人为鉴，可以明得失；以史为鉴，可以知兴亡。”童大林晚年不断反思我国近百年来的历史进程，不断从中总结经验教训。他赞赏中宣部原部长朱厚泽在《炎黄春秋》创刊15周年纪念会上的讲话：“我要讲两句话。一句叫保持记忆，一句叫留存信史。一个失去记忆的人，是无法理喻的人；一个忘记了历史的民族，是无法预期它的未来的。一个失去记忆的民族，是一个愚蠢的民族；一个忘记了历史的组织，只能是一个愚蠢的组织；一个有意磨灭历史记忆的政权，是一个非常可疑的政权；一个有计划地自下而上地迫使人们忘记的国家，不能不是一个令人心存恐惧的国家”。

童大林同志于2010年6月22日辞世。享年91岁。他的思想情操和理想永垂人间，激励人民鼓起智慧思维、战略思维的翅膀飞向新时代。

（作者系《环渤海经济瞭望》杂志原总编辑）

（责任编辑 杨继绳）

启 事

《炎黄春秋》杂志尚有少量过期刊物零售，有需要的读者可电话咨询购买。

联系人：崔秀岭 手机：13611159388

电话（传真）010-60342528

汇款地址：北京市房山区良乡

鸿顺园528信箱

收款人：崔秀岭 邮编：102488

冯森龄：那个年代的好记者

○ 戴国强

冯森龄同志已离开我们近二十个年头了。他虽然是陕西人，但除了在上世纪40年代他曾在延安的《解放日报》工作之外，一直到1978年才回到陕西，担任新华社陕西分社社长。

老冯自1978年到1992年去世前的十四年里，一直是陕西分社社长兼党组书记或专职党组书记。最近我回西安，同那里也退下来的老同事、老朋友聊天时，人们的一致评价是：老冯在陕西主持工作20多年的新华分社，可以说是陕西分社建社史上贡献最大、履行新华社职责最好、在人民群众中可信度最高的一个历史阶段。

老冯在主持陕西分社工作期间，之所以能“贡献最大”，最主要的是由于老冯严格而又认真地履行了党中央赋予新华社的耳目和喉舌这个基本职责；而老冯在履行“基本职责”中，又主要紧紧抓住了“敢讲真话”、“及时而又如实地把发生在当地的真情实况向党中央反映”等这样一些重要环节。

“敢为老百姓说话、敢讲真话，是履行‘喉舌’职责的首要任务”

这是我在上世纪70年代末到陕西分社后，经常听到老冯同志告诫的一句话。后来我才了解到，老冯同志在自己一生的记者生涯中，不论是在什么情况下，不管有多大压力，决不讲假话。建国初期，他随着解放西藏的部队进驻西藏，在积极报道我军解放西藏种种喜讯的同时，也对进藏初期出现的种种问题及时如实地反映了。不料，不久就被“批斗”，调回总社“反省检查”。后来，他又被调到甘肃分社主持工作，面对当时“大跃进”的浮夸风给广大农民群众带来的灾难，老冯及时、如实地向党中央报告了，结果又遭“批斗”，并



1984年，新华社记者冯森龄（右二）在陕北神木县农村采访

被扣上“右倾”的帽子。随后又被调到广西，“十年动乱”和“军事管制”，实际上剥夺了履行新华社基本职责的权力，坐了几年冷板凳，直到“四人帮”倒台后被调到陕西分社工作。

当年的陕西分社，被“动乱”和“派性”糟蹋得一塌糊涂，老冯到了以后，自己带头，到陕北、到延安，了解老区人民的疾苦和要求。

延安，是对中国革命有着重大贡献的革命圣地。令老冯意外的是，革命胜利这么多年了，新中国成立也三十年了，延安人至今竟然还过着极端贫困的生活；延安街头充满着扶老携幼讨饭的人群！有的老乡甚至对老冯说：“社会主义就是这个样子呀！那还不如封建主义哩！”老冯坐不住了，花了一个多月时间，在陕北访农户、走地头，写了五篇来自亲身耳闻目睹的《延安调查》，反映到北京后，在中央高层引起极大的震撼！这是他们多少年来才第一次了解到的延安当前的真实情况啊！对党中央的决策，对延安以后的巨大变化，都起了难以估量的作用。

对这样大的贡献，老冯只是一句平淡的话：“我只是说了群众想说的话！”

老冯也是这样要求分社记者：“应该敢说群



冯森龄在工地采访

众想说的话！”正是在老冯的鼓励和支持下，面对当时省委主要负责人，坚持“左”的政策，阻止农村生产体制改革，不赞成减轻农民负担，用“左”的一套来处理“学大寨”中犯错误的干部，等等。我在分社几年，先后写了200多篇反映农民群众和基层干部呼声的内参和公开报道。

“敢于如实又及时地向党中央反映真实情况，包括省、地高层领导的情况，是履行‘耳目’职责的首要任务”

老冯在主持陕西分社工作期间，在新闻信息报道中，他的指导原则是四个字：全面、真实。老冯对“全面”反复强调的是：有喜报喜，有忧报忧；有成就讲成就，有问题讲问题；既肯定主流，又不忽视非主流，对于社会的阴暗面方面，既要重视基层的，又要重视上层的，包括省级领导层在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方面的情况和廉政建设方面的情况，等等。他特别强调，对高层领导出现的问题，要认真慎重，但决不回避。

正是在老冯的正确的报道指导原则指引下，陕西分社的报道，在全省干部群众中的影响也是

巨大的。用陕西一些老同志的话讲：陕西煤田的加快开发、延安得到开采石油的特殊政策、农业“大包干”体制的快速推行，新华分社是“立了头功”的！

记得在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由于当时的省委主要领导同志认识滞后，把农村实行分田到户的改革视为禁区。在这种情况下，由于分社领导和农村记者从长期深入调查中深知“集体”、“大锅饭”种种弊端；深知基层干部和农民群众对包干到户的迫切要求，也亲眼看到了“偷偷”把田分到户，促进生产的明显好处，因此分社记者就一面如实地把干部群众的要求通过内参反复向上反映：一面抓住一些“暗包”典型体现出来的优越性进行公开报道。80年代初，陕南汉中洪水成灾，在生产自救中自发地出现了一些包干到户的典型。我就跑了几个县，十几个乡镇，把分散在几十个村庄的通过“包干到户”形式进行生产自救典型，进行公开报道，《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位置刊登了。谁知，当时省委主要领导人竟十分恼火，批评分社，老冯不予理睬，并鼓励记者继续大胆实事求是地干！

一年后，省上有关领导眼看在陕北、陕南等边远山区，包干到户的改革浪潮顶不住了，便把“防”线退到关中平原，省委还专门开了一次关中地区县委书记不让新闻单位参加的会议，传达了省委主要负责人关于“坚决顶住在关中‘大包干’的几条指示”。当有一个县把这个会议的有关情况反映到分社后，老冯一面让我把“几条指示”核实后，写内参发到总社；一面又让我带几个记者在夏收开始后到关中农村现场调查，不久，一篇题为“小麦登场见分晓”的长篇通讯在《人民日报》二版的上半版刊登后，产生极大影响，推动了关中平原“大包干”热潮的兴起。但这时，省委主要负责人简直愤怒了，要求撤换分社社长，要求把我调离陕西。总社当然不予理睬，而老冯也非常平静。

“凡害党害民的事，不论官多大，分社就该管”

陕西的老朋友们都知道，疾恶如仇成了老冯的性格；老冯的作风廉洁，生活俭朴，也是尽人皆

知的,同时他在指导分社的新闻报道方面,对党政机关和领导干部的廉政建设也非常关注,非常重视,凡碰到这方面的情况,不论涉及的“官位”有多高,他都决不放过,我就亲身经历过这样几件事:

一件是:在80年代初,由于陕西省委一把手是一位功劳大、资格老的领导人,由于年纪大,对农村改革思想一时转不过弯来,一度成了该省农村改革的障碍。对此,凡涉及改革与反对改革的重大原则问题,老冯从不含糊,都要及时进行调查了解,能报道的则报道。从1982年下半年到1983年春,在西安街头出现了一群群儿童在“跳牛筋”时唱的一首歌谣:“退不退,看××,××不退我不退!”这种歌谣很快在全省流行。这也反映了陕西广大人民群众一种迫切愿望,也就是希望年已古稀的省委老书记能退出领导岗位。当时,老冯即让我以这首“歌谣”为由头,广泛听取各级干部和群众的意见,写了一篇“来自陕西省党内的呼吁”,作“内参”发了,果然引起了中央领导同志的重视,很快采取了组织调整措施。

再一件事是,1983年春,兰州军区的首长们带着40多人组成的队伍到延安来视察,并提出要对在解放军中“如何坚持延安革命传统进行调查研究的”,可是没想到的是,在“视察”、“考察”的四天中,每天上午在宾馆开座谈会,下午和晚上或是乘直升机去南泥湾打猎,或是看演出,搞舞会,天天午宴、晚宴,吃喝玩乐,引起当地干部和群众的强烈不满,因当时,延安还处在非常困难时期,一半以上农民群众食不果腹,衣不蔽寒。而延安地委无可奈何地说:这样规格的接待,是省委书记和省长亲自安排的,虽有困难也只好照办!我们新华社对这件事管还是不管?我当时正好在延安,打电话请示老冯,老冯的回答是:“当然应该管”,但考虑到涉及大军区的领导,让我向穆青汇报。穆青在电话中明确表示:“调查清楚后,稿件直接交给我处理!”

“在新华社记者面前,群众利益无小事,更无闲事,就应该关心!”

老冯的这段话,是1982年春天说的。据当地媒体报道:陕南的安康地区在1981年农业获得

丰收。次年春,我专程到安康,就这里的春耕准备,特别是多种经营的情况进行调查研究,在当时的地委宣传部新闻干事万武义(现新华社国内部主任)陪同下,下基层到农村去采访。可是,刚跑了几个乡、镇、村,一个令人意外的情况出现了:这里的农民已普遍断粮,闹起了饥荒!而且当地的国家粮站的仓库也都空了!可是,省上还有一位领导同志坐镇在安康催要公购粮!在这种情况下,我立即写内参通过总社向中央反映,很快得到党中央、国务院的回应,紧急调拨粮食运往安康。当时,我一面调查研究“为什么丰收的年景变成了严重减产的年景?”一面到了我们邻近的湖北省竹溪县,看到这里真正地丰收了,由于安康未能抓好水稻螟虫害的防治工作,因而歉收。我就顺便向竹溪县委书记(也叫陈永贵)提出:“能否支持邻近的已经断粮的安康200万斤大米,以平价付款?”这位陈书记立即慷慨应允了。

就是这样一件事,过了一段时间我才知道,竟然有人写信到总社告我,说我干了一件记者不该干的事,是多管闲事!当举报信分别来到分社和总社后,却得到了老冯和穆青同志的表扬:“群众利益无小事,也无闲事,记者管得对,管得好!”

忆过去赞声不绝,谈现在感慨万千

这次在与陕西一些老同志、老朋友闲聊中,人们谈起老冯,谈起老冯领导下的陕西分社,真是赞不绝口,赞佩不已!他们说,如果老冯现在还在领导分社工作,那陕西的大小贪官们哪敢像现在这样无所顾忌地胡作非为呵!

曾在省委、省政府领导岗位上工作过的几位老朋友问我:“你们新华社的职能是不是变啦?为什么现在的分社对党内外日益严重的腐败情况熟视无睹呢?为什么对省上的那么多触目惊心的问题碰也不敢碰呢?”

他们说:“现在的新华总分社,办公楼变高了,人手也多了,小车也多了,工作条件变好了,可是新华社的功能就变小了,变弱了,变成耳不灵、眼不明、嗓不清了!什么耳目喉舌,似乎都忘了,简直成了贪官们的保护伞了!”

(作者为新华社高级记者)

(责任编辑 杨继绳)

他离科学最高殿堂那么近

○ 萧功秦

得知堂哥萧功伟于2010年2月26日在南昌逝世。心中感慨万千，总觉得一言难尽，要写一点东西纪念他。

1973年那年，我在上海一家工厂当工人，曾请假去大西北探望在敦煌的七哥萧默（功汉），再沿着南方铁路旅行到江西，我专门到江西分宜县下车，去看望大哥萧功伟，他正下放在那里的农村接受监督劳动。我记得，在一个寂静的小山丘的田边小路边，见到一个穿着十分破烂的人正在放牛。那人的头发已经花白，他侧过身来看到我，说“是小秦吧”，我说，“大哥，我来看你了。”他完全没有想到我会突然出现在他的面前，激动地拥抱着我，满脸流泪。

在那几天里，他向我倾诉了自己的科学抱负与不幸命运。当他谈到自己对门捷列夫周期律的新见解时，正走在我前方的田间小道上，回过头来对我说，你看，当年美国物理学家费米（诺贝尔奖获得者）就是只想到了这一步，再下一步刚要迈出时，却突然转弯到那条路上去了，而我却向前走到这一步，于是我发现了费米没有发现的东西。……

我记得那几天我们两人躺在田野边的空草地上，他说，他那里下放了不少受监督改造处分的知识分子，只要不平反，他们都会坚强地生活下去，但是，只要一平反，他们往往会选择自杀，前几天这里就有一个人跳了河。（“林彪事件”后，1973年后也有过平反落实工作）我听后觉得不可理解。我问这是为什么，他说，因为他们活着就是为了等这一天，等不到这一天他们就不甘心，但是等到了以后，又觉得人活着没有意义，失去了活下去的勇气。

可以肯定，那么多年来，他没有机会与别人这样畅谈过，他太需要我这个弟弟在他身边听他倾诉了，但我当时已经超假多日，再也不能不走了，他一定要我多留一天，哪怕半天也好，但我执

意要走，他几乎有点哀求我了，我在前面走，他一路跟在我后面，用哭一般的声音劝我留下来，须知他是一个自尊心非常强的人。我仍然不愿意回头，现在想来，我的心也实在太硬了，这是我终生后悔的事。其实，即使再留半天也还是可以的呵。他一定在我走后难过了好多天，不得不重新适应他那个孤寂无望的环境。

他是1948年上海交通大学航空工程系毕业的高材生，据他说，他那一届航空系毕业生总共只有七个人，本是天之骄子。1949年到了台湾后，又得到美国史坦福大学研究生入学邀请信，却为了爱情与报国之心，想方设法一定要回来，他告诉我，他在台湾好不容易才找到了我父亲在黄埔军校的结盟兄弟，当时台湾的空军总参谋长刘国运。他说，刘伯伯问他，是不是不要回大陆了，就在台湾给他找个女朋友，成个家，更何况已经得到了美国入学信，前途无限得很。但他说，他离不开大陆的家，离不开他的女友，一定要回去。这位刘将军于是设法为他与二哥萧牧弄到两张从台北直飞贵阳的机票。据他说，这是台湾到大陆的最后一架飞机，此后两天，贵阳就解放了，从此台湾与大陆两地分隔成两个世界。

没有想到回到大陆后却是一辈子的苦难，一回来，女友就与他划清界线，与他分手了，他作为有严重嫌疑者，从东北航空工厂调到江西南昌航校，后来又只能在职工业余大学教书，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从事金属物理的基础理论研究，“文革”中又被打成反革命，下放到江西农村监督劳动，他从江西写给上海亲人的每一封信都充满乐观，他的坚强意志，令人不得不钦佩。他一定要等到平反那一天，“文革”中他多次来上海再转到北京去告状，每次他来我都与他谈得很深，帮他出主意，常常通宵达旦。每次上北京告状，我都送他在上海北站上火车。

“四人帮”倒台后，他终于平反了，在《科学通

娄烦土改及纠偏

○ 张贵桃

娄烦县位于山西省中西部，原属静乐县，1971年建娄烦县。抗日战争时期，这里是晋绥边区抗日根据地，中共静乐县委和静乐县抗日民主政府、中共晋绥三地委和三专署，以及八路军三五八旅等多支抗日武装曾长期驻扎这里，与娄烦人民一道进行了艰苦卓绝的八年抗战。1939年冬“晋西事变”，抗日军民在娄烦地区摧毁了阎锡山县政权，建立了静乐县抗日民主政府，抗战胜利后这里就全部成为解放区，具有很好的群众基础，因此1947年土改时，这里和晋绥边区首府兴县成为中央土改工作试点县。

1947年2月，中央土改试点工作团兵分两路，一路由陈伯达带领来到静乐县娄烦地区的潘家庄行政村（另一路由康生带领来到兴县郝家坡），先作试点，然后全面铺开进行土地改革。陈伯达工作组于1947年9月撤走，由徐志远带工作组继续，到1947年底土改结束。按理说，老解放区人民为争取抗战胜利付出了巨大牺牲，作为土改试点，本应通过土改，实现耕者有其田，营造一个稳定和谐的社会氛围，尽快恢复生产，休养

生息，医治战争创伤。不料在土改过程中却自始至终推行了一条极“左”路线，给社会造成了极大破坏，加之其后继政策的不当，不仅给土改试点区，也给整个社会留下了永远的痛。

斗争惨烈绝人寰

当时提的口号是“村村点火，处处冒烟”，“群众要怎么办就怎么办”。在极“左”路线的指引下，各种整人手段无所不用其极。开斗争会时，用来烫人的炭火、火柱、熨斗、铁锹等是必备之物，此外还有老虎凳、棍棒、竹签、擀面杖、醋柳圪针、麻绳、刀具、细铁丝串着的艾绳、甚至是蝎子。连贫农团的孩子们也准备了小镢把，大人们去斗地主时，孩子们就斗地主儿子。很多人被当场斗死，也有人自杀身亡。7月中旬，史家村召开行政村斗争大会，当场有7人被斗死。

有的村庄，对年轻漂亮的地主女人，作为胜利果实分配，有的女人不堪凌辱自尽。

土改一年，全县（指静乐县，主要是娄烦地

报》上发表了一些重要文章。还当上了江西科学院的副院长，工作没多久却发了抑郁型精神病，也许支撑他的精神的东西与生命元气已经被苦难提前耗尽了，他的病二三十年来始终没有真正好过。

也许他给我谈到的那些平反后的知识分子的不幸命运，以另一种方式在他身上应验了。人们会百思不解，当命运开始根本转折时，他为什么会倒下，也许，科学就是他的宗教，他在常人难以坚持的极度艰难岁月中能乐观地生活下来，是因为有这个宗教般的目标追求支撑着他，当他意识到这个殿堂离他越来越远，他的生命支柱就断裂了。

我深信，如果他在1950年没有从台湾回大陆，也许不会受到如此多的磨难，人生道路会完

全不同，本可能成为一流科学家的。他有十分强烈的诺贝尔情结，有一种对科学的如痴的热爱，精力充沛，才华横溢，充满智慧与活力，他古诗写得很好，他甚至还能背诵数以百计的唐诗。这样优秀的有真性情的人，不但中国，就是世界上也已经越来越少了。可以说，他的一生是20世纪中国历史的缩影，一个杰出科学家在极“左”时代的不幸命运与苦难，全都集中在他的身上，值得我们活着的人与后人去品读与追念。

如果不写下这些，也许以后没有人会知道，在我们的生活中，曾经有过这样一个离科学最高殿堂那么近，却又如同宇宙中的流星一样，离得越来越远的人，一个很少有人知道的真正有追求精神的科学家，一个普通的中国知识分子。■



土改中登记丈量土地

区) 当场被斗死亡和以后自杀的有 680 多人, 因打伤致残和惊吓后来死亡的无法统计。

斗争地主扩大化

土改工作团提出了划分成分的两条标准: 一是不仅要看他现在的土地财产, 而且要查他历史上, 起码是三代以内的土地、财产及其有无剥削; 二看他的政治表现, 也就是群众对他的态度; 三看他铺的摊子大小。人们把这三条标准概括为“盘三代, 看现在”。按照第一条标准, 要查三代, 即使本人不是地主、富农, 但他的父亲、祖父、曾祖父是地主、富农, 就得定为地主、富农。按第二条标准, 一些人即使没有多少土地财产, 但只要贫雇农中有人指出某人有劣迹, 就可定为恶霸。第三条, 看住房、穿戴、摆设。即使没有剥削, 但摊子摆得大, 生活稍微好一些, 也得定为地主、富农或恶霸。在这三条标准指导下, 扩大化倾向表现在四个方面, 一是地主、富农比例高。娄烦地区当时有 10954 户, 地主、富农就有 2028 户, 占总数的 18.5%。地主、富农占 30% 以上的村达 36 个。有许多村庄, 公社化时期因地主、富农过多选不出村干部来, 参军指标也没法完成。

其中有一点必须指出, 抗日战争是全民抗战。如果说贫下中农主要是出人出力的话, 那么抗战所需的大量粮食和钱财, 主要是地主、富农供给的。境内许多地主为了抗战胜利, 主动捐粮

捐钱, 涌现出许多开明地主。但就是这些开明地主, 土改时也无一例外地遭到了残酷斗争。其中最著名的有马家庄刘肇津, 为 1937 年娄烦建党时的党员、常年义务为三五八旅官兵治病, 时任三五八旅团长的杨秀山将军曾患伤寒, 刘延至家中为其治病 40 多天。后在兴县晋绥公安分局办的丰记商店任坐堂先生, 土改时被本村群众打死。

二是扫地出门断生计。口头上说是要给地主、富农留有生活出路, 实际操作过程中, 除一部分人当场被斗死外, 相当一部分人被扫地出门, 没给留下任何生活生产资料, 沦为乞丐。

三是谁是恶霸无标准。如果说地主、富农或多或少还有些经济方面的政策参考, 那么谁是恶霸就全是群众的随意行为。今天一个土改积极分子, 只要有人在会场上呼一声“××× 是恶霸”, 被点到名的人就很有可能被揪斗甚至被斗死。致使社会矛盾激化, 人人自危。直到 1947 年农历十一月下旬, 下龙泉村一夜之间以恶霸为名打死弟兄五人, 此事震动晋绥边区, 土改打死人现象才停止, 这时娄烦土改已临近结束了。

四是中农利益被侵犯。对待中农, 虽然没有像斗地主那样惨烈, 但强行平分中农的土地和财产。群众称之为“砍倒大树砍小树, 砍倒小树拔圪针”。“平分”方法是: 好地贫雇农, 中地中农, 赖地分给所谓占过便宜的干部。

革命队伍难幸免

娄烦作为抗日根据地, 1937 年冬就建立了共产党组织。抗战八年来为国家和地方培养了大批干部, 他们为争取抗战胜利出生入死, 经受了长期考验, 绝大部分是好的和比较好的。但土改开始后, 提出踢开支部搞土改, 所有村干部一律隔离关押进行清算, 清算方式与斗争地主毫无二致。即使在外工作的干部, 一旦碰到风口浪尖上也难逃一劫。其中有两件事惊动了晋绥边区乃至中央。

第一件, 枪毙抗日英雄郝园脸。郝园脸是潘

家庄行政村城东沟村人，贫农，1938年参加村自卫队，1939年入党，1941年任行政村民兵中队长，1944年出席晋绥边区群英会，被授予劳武结合特等民兵英雄称号，1947年4月在陈伯达主持下被枪决，开娄烦土改杀人先例。

第二件，党的记者郭克卿被打死。郭克卿为郭家庄村人，中共中央驻延安时任《解放日报》兼新华社记者。1947年冬赴晋察冀边区采访时，路过离郭家庄不远的方山县马坊镇，把警卫留在马坊镇只身回家探亲，顺便劝说家人交出土地财产接受土改，刚进村还未及回家就被群众抓住，用乱棒乱石打死。

据统计，娄烦地区土改死亡人员中，有三分之一是各级干部，其中以区村地方干部居多。

学校停课

娄烦教育从1904年开始兴办公立小学后，呈现出私塾和公学并存的局面。1937年7月抗战爆发，娄烦全县出现过短暂的停课。但娄烦地区的党组织在1938年5月就着手组织学校复课了。1940年静乐县抗日民主政府成立后又组建了抗日游击两级小学，至1942年日军占领娄烦后，娄烦地区的学校教育一直没有停止过。

但从1947年2月娄烦土改开始后，凡开展土改的地方，由于土改只重斗人，不重教育，学校全部停课，本来已是在非常困难的条件下办学的校址，大都成了斗人的场所。办学和教书的人大都是地主、富农和基层干部，全部成为被斗的对象。直到1948年秋，社会才从土改的阵痛中恢复过来，学校逐步恢复。停课时间长达一年半。而对教师队伍的摧残所造成的损失，更是在很长时间内难以弥补。

政策失误多后患

1947年底，晋绥土改极“左”倾向严重，死人过多现象引起中央重视，从1948年2月开始纠偏。对划错的成分予以改定，对扫地出门的地主给予和贫雇农一样的土地，对多分中农的土地财产予以退还，对错误处理的干部予以纠正。但这次纠偏是很不彻底的。首先是从1948年初土改

工作团就陆续撤走，到5月底已全部走人，纠偏工作匆匆结束，更重要的是土改档案没有按纠偏结果处理。在以后包括“文化大革命”在内的历次运动中，由于极左路线愈演愈烈，原来改定了的成分如地改中、富改中，一律还是按地主、富农对待，纠偏等于没有纠。

其次是制造这场灾难的康生、陈伯达回到中央后，不仅没有得到任何处理，反而平步青云，进一步被提拔，被重用。“文化大革命”的整人手法和手段，与康、陈晋绥土改如出一辙。

还有一点需要指出，把农民划分为地主、富农、中农、贫农几个成分，这在当时无可非议，进行这样一场大规模运动，必须有一定的执行标准方可操作。但在土改结束后，地主、富农不仅在政治上、经济上被打垮了，甚至在肉体上也被消灭了，地主、富农的孩子们或者当时刚出生，或者是土改后才出生的，更不知道剥削为何物。但在从土改结束到十一届三中全会30年的时间内，却像印度的种姓制度和元朝的等级制度一样把人分成地主、富农、中农、贫农几个等级（后来更发展为地富反坏右叛徒特务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和臭老九），地主、富农的子女不准参军，不准升学，不准参加工作，不准提干，在世界上一个人口最多的国家造成了世界上最大的不平等。这个政策执行30年，对中国发展造成的最大危害，是使农村相当一部分人才被摧残了、扼杀了。

说明：本文根据娄烦县和静乐县政协文史资料中的有关内容，结合我后来的调查整理而成。其中土改被斗死人数，两地文史资料中有出入。静乐文史资料中称土改死亡人数为447人，其中党员、干部26人。娄烦文史资料中由当时参加并领导过土改的老干部苏军回忆，是死亡680多人，其中三分之一是干部。■

（责任编辑 杨继绳）

本刊声明

为保护本刊和作者权益，凡转载本刊文章，请注明“转自《炎黄春秋》”。

一个右派的“饥饿改造”

○ 吴传斗

1957年整风时，我23岁，正在河南临颍县报社编辑部工作。县领导再三动员大家放心鸣放，大胆说话，要“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我因此写出了指向县委第一书记闫某的大字报，说县委以他为首搞“欺骗行为”。事因当年春天，县里开三级干部会，动员全县大搞水利化，闫书记动员大家捐款支援水利化，他认捐200元，参加会议的干部纷纷认捐，我也认了40元。可会后，又不让交钱了，说是会上报个名，造造声势即可。此时我提出此事，指出这是在搞“欺骗”。大概这张大字报刺痛了县委最高领导，我因此被打成右派，处分是开除公职、劳动教养。就这样，我被送去劳改农场，接受改造。

一、“饥饿改造”

从1958年4月15日抵达内黄白条河农场，到1962年8月12日离开农场，日日夜夜折磨我的最大问题是吃不饱！4年又4个月，几乎没有一天不被饥饿所折磨！事过几十年，想起那时的饥饿情景，还是心惊胆战！

渐渐的，我明白了，饥饿本身也是一种“改造”的手段，而且是极其重要的一种手段。人在饿昏了的时候，一切的尊严和斯文，统统可以忘却；一切信用和承诺，都可以踏在脚下。

粮食不足，人很快就受不了了。来自城里的人这时就成了来自农村的人的学生。先是挖野菜，荠菜、野芹菜、地瓜叶，挖到什么吃什么。后来，柳树冒了芽，又打起了柳树、杨树的主意。这些野菜、树叶弄了来，伙房是不管的，只能自己加工。经常一下工，地里到处就冒起了烟。野菜煮煮，再用当地出的硝盐一拌，就可以吃了。还有人干脆用开水烫烫甩干了吃。很快，巩县来的几个人脸色就不对了，青里透着绿，还有些肿。许多人吃不饱，就猛喝水。有人加上点盐喝。于是更多的人脸开始肿起来。人年轻轻的，眼下有了眼袋：透明、透亮。有人眼睛肿成了一条缝。

麦收了，我们要去拔麦子，经常是天一亮就动身。天黑了，只要有月亮光，还要下地，经常夜间十一二点才能收工。这时午饭可以吃到一个白面的杠子头干粮。有时地里麦子割不完，要派人夜间看着。有次郑州师范的宋老师夜里看守，回来悄悄对我说，生麦粒能吃。我问：那怎么吃？他黑黑的脸，露出了一丝狡黠的笑容：“搓搓就可以吃，那是粮食啊！”

附近农民的生活不好，但也有专门来赚我们钱的。经常有农民来卖盐水茄子，四毛钱一碗，有时我能一口气吃两碗。一天，四川人杨四正在铡草，突然喊住了我，一脸恐惧地说：“坏了。”我问他怎么了。他说：“我肠子变成直的了。”原来两小时前，他吃了两碗茄子，刚刚大便，竟拉出了茄子，那茄子种还看得清清楚楚，他看了，认为自己就快要死了。

偶尔，有人能逮到一只冬眠的青蛙。用茶缸煮了，那是绝美的口福。有一次，我在林带中正铲草，忽然发现一只刺猬躲在草棵中。我用草帽扣住了它。两小时后，它就变成了我的一顿大餐。

夏天瓜果下来时，是我们食物最多的时候。1959年夏初，路边来了个卖杏的。我买了两三斤，放在盆里，有大半盆，正赶上吃午饭，一大勺面汤又盖在上面。这次盆中汤不稀了，我竟一口气吃了下去！那时见到西瓜，从来是连皮带瓢一起吃。还有一次，我买到了几个地瓜，一下吃光，肚子难受得要命，恨不得一口气再吐出来。但是当饥饿又主宰自己时，这种教训就忘得干干净净。

二、死里逃生

7月下旬的一天中午，收工回来的路上，我买了一个甜瓜吃。午饭照例是一份豆面馍和一大勺菜汤，吃了还是饿，出工路上，我又买了些葡萄吃。临到下午放工回来，肚子又胀又疼，并开始呕吐，吐的全是水：酸水、苦水、绿水，白色的脚盆吐了半

盆。但奇怪，吐了这么多，肚子依然胀。队里黄英杰医生给我看了病，找队长建议让我赶紧住院。于是几个人把我抬到了场部医院。

场部医院的大夫和护士是清一色的劳教人员。负责给我治疗的大夫姓沈，据说原是开封地区一个医院的院长。头三天，他建议我接受保守疗法。当时，也没有明确诊断。这时，我已基本不呕吐，大便不通，只是腹胀依然。小腹胀如鼓，肚皮上血管清晰可见！不能吃饭，就注射些葡萄糖、盐水之类。三天后，我自觉症状没有好转，那时头脑出奇的清醒，对沈大夫说，保守疗法三天不见好，说明保守疗法不行。我建议“拉（即切）开看看”。沈大夫说，我不是不想剖腹探查，只是你身体太弱了！我说，沈大夫，现在是弱，但再过几天，我身体会更弱。沈默然。不久，他领来了医院的干部医生朱大夫，那人是个军人。朱医生听后，又摸摸我的肚子，回头对沈医生说，“给他准备吧！”

这时，病房中的人都知道我要开刀，安慰的话多起来了。他们知道，在如此简陋的条件下进手术室，做这样的手术，意味着极大的凶险。这里有两个人都是手术不久就死了。我忽然说，没事，放心，我才27岁，还没活够！两个护士（一个姓刘，一个姓花）推着我，进了手术室。主刀的是沈大夫，还有另一个孟大夫。手术极迅速，也出乎意料地顺利。我很快被缝上、包扎好，送回病房。

我得的是急性胃扩张、下垂，据说胃已掉到了盆腔。刘护士说，从我的胃里取出了大量葡萄皮，她比划着说，有大半盆。

第一阶段恢复时，每天我习惯了夜里十二点前等那碗糊糊（手术后吃的稀藕粉）。两三个星期后，晚上十二点这顿饭突然停了，我的胃饿得不停地痉挛。一天晚上，实在忍无可忍，我起来，披上棉衣，双手拄了拐杖，挪着走到护士值班室。我很不好意思地说出我饿得难受。年轻的花护士说：锅里是我的夜班饭，你要吃就吃吧。旁边地下有一个铁锅，里边有些南瓜糊糊，我毫不客气地盛了一碗吃。多少年了，我每当想起这些事，心中总浮起一种情感。几十年了，天各一方，哪里去找这些救了我命的恩人，一饭之恩的恩人？

三、病号第一组

1960年的冬天，格外的冷。我刚刚从死亡线上回来。农场“右派”浮肿的人太多了，于是队里把这些有病的，年龄大些的，编成两个组，叫病号组。我成了病号一组的组长。全组16个人，不是拉不动腿，就是脸腿都肿的。我也浮肿起来，成天脸虚泡泡的，皮肤不像自己的，腿出奇的沉，拉不动，抬不起，有时连一个10公分的台阶也上不去！有人把这归罪于喝盐水。许多人因为饭太少肚子老觉得空，吃饭前，常常弄些水喝下去，水太淡，就放点盐，而且是当地产的硝盐。有人喝了，就开始水肿。郑州师大的一个教师，成天披着一件黑棉大衣，吸自制卷烟（那烟是用枣叶或葡萄叶卷的），虚泡的眼很少睁开。有次，我看他在拿石头砸什么东西。细问之下，原来他是将鸡蛋皮砸碎，再放到盆中研成极细的末吃，说是增加钙！也有人打了饭汤来，洒上一些蛋皮末。我不信，说他们在糊弄自己。有一次，他将从“干部伙房”后边拣来的葱胡须拌上盐，大口大口地吃！伙房里的王班长原来是粮食局的计划股长，有次，不知从哪里弄来不少黑豆皮，煮了一锅，兑上点面，每人给了一大勺。那东西咬不动，到嘴里只能往下吞。冬天，经常是在阴天，刮着风，在队部的北边枣树林中可以找到一种八角虫。这种寄生在枣树上，进入冬眠状态的虫蛰伏在椭圆形、像鸽子蛋一样铁青色的小壳中，贴在树枝上。掰下来，大小像一个大黄豆，把它用铁皮罐头盒盛着放在火中烧烤，然后剥开外壳，露出一种黄色的小虫，吃起来，其香无比！有时候一上午能找到几十粒，算是很幸运了。

1962年8月11日，我接到通知，“解除教养，回肥城原籍”。我去办手续，一看，傻了。解除劳教，但我右派的“帽子”不摘。这留了多大的尾巴啊！但转念一想，让我走就行，这个地方，我连一个小时也不愿多呆了。第二天，太阳刚出来，我用刚砍的一根柳树棍子挑着包裹卷，离开了白条河。

几十年过去了，在劳改农场的“饥饿改造”往事，还是思之心惊。■

（作者为山东轻骑集团离休干部）

（责任编辑 洪振快）

本刊启事

凡未收到稿酬的作者，请将联系地址、邮编和身份证号码告知我社。
联系人：肖林 电话：010-68525374

一个小干部的三起三落

○ 李世华

说他是个小干部，因为他在大部分的为官时间里只是一位公社书记，论级别只是一名科级干部；离休时才做到县长——一个“七品芝麻官”。他叫梁学孔，1930年农历11月出生于河南省永城县条河乡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十五六岁时接受初步的马列主义教育，发动群众开展减租减息运动，参加共产党的地下活动。淮海战役时，18岁的梁学孔冒着生命危险参加了支前工作。1949年经老师介绍在新成立的砀山县委任职，同年5月入党。

1958年，人民公社成立，梁学孔被任命为安徽省砀山县唐寨公社书记。那正是“大跃进”的年头，卫星一颗接一颗地放，一颗比一颗高。当时的砀山县六个大公社，两个公社上报小麦亩产1000斤，另外两个公社上报500斤。“秋收砍倒棵子狼就出来，”梁学孔说，“小麦现在亩产只有100多斤，500~1000斤的任务根本不可能完成！”最后梁学孔上报指标300斤。回忆到这一段时，梁学孔说：“报300斤，我已经心虚了，因为当时的实际小麦最高亩产量不到200斤。将来饿死了人、饿死了牲畜，我负不了这个责任。看见面黄肌瘦的孩子向娘要馍吃，当娘的又拿不出馍来给孩子吃，我这个当书记的心里就感到难过。”

最后县里平衡一下，要求其他公社上缴2000万斤，唐寨公社上缴500万斤。为了完成这500万斤的征购任务，梁学孔号召多栽高产作物红芋。天公作美，那年取得了好收成。完成了县里的500万斤征购任务，留足种子饲料外，每人全年还有350斤口粮，保住了全公社6.5万人的命。

“大炼钢铁”的时候，上级号召收缴社员的铁锅。身为公社书记，梁学孔心情十分矛盾，既不敢对抗上级，又不忍让社员受苦，于是对正在砸锅的干部委婉地说：“那种四张子锅（最小号的锅），砸不了几两铁，给社员一家留一口小锅吧。这样从食堂领来的饭凉了，能在家热热，有人害了病，也能烧口开水喝。”此后推而广之，全公社每户给

留一口小锅。

1959年，公共食堂的各种弊病都表现出来了：管理无计划、浪费粮食、干部多吃多占，等等。于是，梁学孔书记向县委书记刘钦鉴报告了公共食堂的问题，提出解散食堂的五大好处，建议把社员的口粮分到户，由社员自己安排生活，这样既有利于社员自救，也可避免干部多吃多占。

1959年的庐山会议，由于彭大将军的万言书触怒了龙颜，变成了一场大规模的自上而下的全国范围的“反右倾运动”。10月份，中共中央关于庐山会议的文件传达到县里。梁学孔在思想上与彭德怀对了对号，预感到此次运动自己在劫难逃。当通知他到县里开会时，梁学孔料到自己有去无回，便把上级配给他的一把手枪交给秘书，心情沉重地说：“我这次去，恐怕难能回来。如果组织上来人要枪，你就交给他们。”然后又把身上的一件军大衣交给同事陈洪真，说：“咱们同事一场，没别的送你，这件军大衣留给你，白天可以穿，晚上盖在被子上可以压风挡寒。”

到了县上，果不出其所料，县委书记要他做检查，接受批判。梁学孔在唐寨的一些举措，条条上纲上线：低报产量是反对“大跃进”，给社员留小锅是反对大炼钢铁，解散公共食堂就是反对“人民公社”，其错误性质与彭德怀一样，于是，梁学孔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不大不小的一顶帽子扣到了他的头上：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梁学孔被发配到黄楼农场去劳动，由行政18级降到19级。

1961年，中央开始反“五风（共产风、浮夸风、瞎指挥风、强迫命令风、干部特殊化风）”。10月份，地委书记孟亦奇给梁学孔平了反，应唐寨公社干部群众要求，仍派他到唐寨公社任书记。

梁学孔回到唐寨公社发现，摆在他面前的是一个破烂摊子：在他离开唐寨的两年期间，村村墙倒屋塌，牲畜减少，劳动力大量外流，土地严重荒芜，非正常死亡数千人，还有很多社员在死亡

的边缘挣扎着，全公社呈现一片“千村薜荔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的破败景象。1962年夏全公社小麦平均亩产只有40斤。

梁学孔把扭转形势开展生产自救摆到最重要的位置，提出“四保”：1、保社员不饿死，保劳力不外流，鼓励社员拿家中的东西到外边丰收地区换粮。2、保牲口保母猪，保住生产的老本。3、保种子，特别是高产的红芋种，不准搞平调。4、保住房，确保家家户户安全过冬。

在这“四保”中，梁学孔把保住全公社社员生命当做重中之重。梁学孔多次亲自到蚌埠铁路分局，要求在文庄车站增铺铁路轨道。后来这一要求得以满足，大大方便了运载救灾物资，同时也方便了社员外出换粮。不久，在文庄车站卸下了10万斤救灾的胡萝卜。

60岁的李金声是光明大队特贫户，妻子被饿死，自己带着三个儿子，大儿子12岁，小儿子才8岁。他分了30斤救济萝卜，自己无力去领，吩咐两个孩子到十五里外的文庄去抬。两个孩子抬到公社门口，实在走不动了，大孩子打小孩子，小孩子蹲在地上哭。这一幕正好被梁学孔看见了。没有多考虑，梁学孔扛起萝卜一直把他们送到家。卧病在床的李金声见梁书记给他家送来了萝卜，感动得流下了眼泪，说：“你对俺的恩情俺一辈子不能忘！”

由于大牲畜大量死亡，很多生产队不得不用人拉犁子。当时流行的顺口溜说：“小马嘎（喜鹊）尾巴大，爹拉犁子娘拉耙。”那些日子里，在拉犁子的人群中，人们经常看到梁书记。和大家一样，他也赤着脚挽着裤腿，躬腰背着绳子。

梁学孔为了了解第一手的材料，挨着生产队跑，牛屋里，地头边，社员家里，到处能见到梁学孔的身影。唐寨公社有214个生产队，梁学孔能清楚地说出哪个生产队有多少牲口，记得每个生产队的饲养员的名字。梁学孔在唐寨公社交了很多朋友，其中有不少是当年的饲养员。

为了鼓励牲畜的饲养和繁殖，梁学孔制定了具体的奖励措施：母畜怀胎一个月奖励饲养员多少元，生下成活奖励多少元，长到半年再奖励多少元。

那些年，社员大呼隆干活，出工不出力，只讲工分不求产量，严重制约了生产力的发展。梁学

孔看在眼里急在心里。他提出了一个农作物管理工厂化的“生产责任制”的设想，在文庄大队路口生产队作试点，把生产队的劳力分成小麦组、棉花组、杂粮组、牲畜组、多种经营组等若干组，以组为单位承包工分，包投资，超产部分40%归小组所有。社员的生产积极性大大提高，产量节节上升，社员收入逐渐增加。

唐寨公社泡沙地多，严重影响小麦产量。梁学孔亲自带领农技人员和知识青年配合土壤专家搞磷肥试验。1964年麦收时，试验田的小麦亩产达到300斤，是最低亩产的十倍。在麦收前，梁学孔组织各生产队到试验田参观学习，召开各种会议介绍经验，大大提高了社员科学种田的积极性，促进了小麦产量大幅度增长。1965年小麦亩产达到141斤，1966年已突增到214斤，高于全县平均亩产74斤，比1962年的40斤提高到五倍多。梁学孔大搞科学种田引起了上面的注意，1964年被派去北京参加了全国农村科学实验交流会，《安徽日报》专门发表了报道文章，省里在砀山县召开现场会，带领与会者到唐寨参观。当年，唐寨公社派代表出席了华东局五省一市小麦亩产200斤以上的公社先进单位会议。

为增加社员收入，梁学孔积极扶植副业，开展多种经济，鼓励唐寨南边的沙地较多的大队栽种白蜡条、桑杈等。一些样品被送到北京农展馆，受到朱德委员长的赞扬和好评。

截止到“文革”开始的1966年，社员的生活水平大大提高，家家户户不再为衣食住房担忧，所有生产队都在留足口粮、种子、饲料后完成了征购任务，汪庄大队还留了集体储备粮80万斤。

就在这时，疯狂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梁学孔所有发展生产、改善社员生活的措施统统成了推行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的“罪行”。梁学孔被打成了“黑帮”，下放到该公社蒋楼生产队喂牛，住进了真正的牛棚。

梁学孔当上了饲养员，与牛为伴，白天铡草、喂牛、打扫牛粪，晚上睡在牛屋里，与饲养员交上了朋友。

1967年初的“一月风暴”后，唐寨公社处于无政府状态。这时人们不约而同地想起了他们爱戴和尊敬的公社书记梁学孔，有人提议请老书记回来主持“抓革命，促生产”的工作。一呼百应，一

千余群众的队伍马上组织起来了，人们举着红旗，拉着地板车把梁学孔请了来，一路上社员敲锣打鼓吹着喇叭放着鞭炮。

这是梁学孔第三次进唐寨公社主政。

但好景不长。1968年支左部队进驻砀山。他们认为梁学孔执行了刘少奇、邓小平的包产到户、物质刺激、工分挂帅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是全地区最典型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决定在宿县地区9个县批判他。批判会开了300多场，时间长达一年。一个公社书记遭受批判的范围之大、场次之多、时间之长怕是全国绝无仅有。但滑稽的是，这些批判会却开成了梁学孔的宣传会，梁学孔的思想不但没批臭，反而越来越香。在唐寨公社汪集大队的批判会上，大队书记张孝友说：“你梁学孔罪恶不小，这几年由于推行了牲畜奖励办法，我们大队牲口增加了，小麦高产了，我们也不用人拉犁耙了。”当光明大队接到在他们大队批判梁学孔的时候，大队部安排只烧一瓶开水，炊事员端着一碗茶送到梁学孔面前，故意高声说：“天热，请梁书记喝茶。”批判队员见状，到大队部要茶喝。大队部的人说：“就给梁书记烧一碗水，没给你们准备。”无奈，他们只好找水桶打井水喝，但水桶早被藏起来了。他们又想去梨园里摘梨子吃，但各个梨园都被严密把守。批判队员到处碰壁，一口凉水也没喝上，灰溜溜地走了。在泗县的一次批判会结束后，与会群众把梁学孔围住，七嘴八舌地说：“我们公社有你这个走资派就好了，我们一个劳动

日只合三毛钱，你们合一块四，你们一个劳动力的收入顶我们五六个人；你们每人分小麦280斤，我们分不到50斤。……”

通过长达一年的批判，梁学孔受到了很大鼓励，更加坚定了自己的信念，坚信自己无愧于心，无愧于人民。

军管会见批不倒梁学孔，就把他再次发配到黄楼农场劳动改

造。这是梁学孔第二次到黄楼农场接受劳动改造。

1976年粉碎了“四人帮”，梁学孔方得以解放，1978年元月被任命为砀山县革委会副主任，1980年9月调宿县任县革委会主任、县委副书记。

这时，社员听说外边在搞生产责任制，也要包产到户，梁学孔给予了支持，并在张庙公社全面推开。有人认为这是搞“右倾”，并把这个情况反映到地区农委，农委负责人要追查，决定找梁学孔谈话。消息传到梁学孔耳朵里，他也有点紧张——毕竟，他经历了三上三下，吃了太多的“路线斗争”的苦。晚上躺在床上，梁学孔思想斗争很厉害，他想不通：为啥一利国家二利社员的事情就是“右倾”呢？这时，地区革委会主任进来了，通知梁学孔立即到新马桥农场（安徽省“五七”干校）报到，接受劳动改造。梁学孔连忙收拾行李，突然，“当啷”一声脸盆掉在地上，他被惊醒——他做了一个梦。

不久，中共中央下发了75号文件，肯定了以包产到户为形式的联产承包责任制，使梁学孔和数亿农民的愿望得以实现。从1980年到他1990年离休，梁学孔算是稳稳当当地当了十年县官。他积极在全县范围推行联产承包责任制，不仅土地包产到户，而且果树、水塘、沼泽地、荒山乃至供销社下属的商店也承包给个人，生产力发展很快。■（责任编辑 杨继绳）

个人按需出版 继续征稿(50本起印)

2004年我公司率先与出版社会开展按需出版业务。7年来引领行业潮流，已为包括著名导演严寄洲及加拿大、澳大利亚等海内外的300多位作者出版了各种形式的作品，精美的图书深受广大作者欢迎，成为品味高雅的礼物和具有留世价值的纪念。

作为新的出版方式，按需出版具备三大优点：(1)解决费用过高难以出版的难题。(2)即需即印，总是新书，零库存，避免浪费。(3)出版周期短，一般1-2个月。重印1~2周。

适用范围：个人著作、老辈遗作。

印数：100册以下最佳。

资金投入：自费。以50本(大32开)为例，纯文字印制费用200页2000元，300页2800元。如需加增录入排版、装帧设计制作，共为4000~4500元上下(含2页彩插)。具体价格视稿件情况确定。详细报价可电话、电邮或信函咨询。

稿件内容文责自负，但需符合我国出版法规。没有书号，不能销售，仅作留世和赠送。作者享有著作权。正文纸张：70克胶版纸(黑白)、128克进口铜板纸(彩色)。封面纸张：157克进口铜版纸。印刷质量上乘。所有出版的图书均事前签订合同。

联系地址：北京市海淀区清缘西里小区1号楼1509号，邮编：100192，热线：13521531088 陶女士。

电子信箱(E-mail)：173736757@qq.com

北京地区上门服务，送书到家。外地邮寄。

北京文苑文化发展公司

董时进致信毛泽东谈土改

农业经济学家董时进于 1949 年 12 月给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领导人写了一封长信，谈他对土地改革的看法。这封信全文如下：

查中共土改政策的基本理由，不外乎说中国的土地制度是封建剥削性的，所以应该废除。我们固不能否认若干大地主，例如军阀官僚恶霸等的封建性，但若说一切的或多数的地主富农，以及整个土地制度都是封建性的，则未免言之过当。何以故，请申说之。

甲、为何不能说整个土地制度是封建性的？中国的土地制度是一个可以自由买卖及出租的私有制度，这些条件并不足以构成封建性。因为在有财产制度之下，一切物品都是可以自由买卖及出租的，譬如房屋车辆船机器牛马等，无一不是如此。对于这些物品既不认为是封建性，何以独认为土地是封建性呢？有一些人说，土地与其他物品不同，土地是天然物，房屋等是人造物，故不应同一看待。这种说法也纯然是错误的，必须加以纠正。

农业土地决不应视为天然物，而实在是人造物。土地不但必须开垦，才能变成耕地，而且开垦仅是使天然的土地变成农业生产的土地的很小一部分工作。至于大部分的工作乃是斩荆棘，凿井挖塘，开渠筑堤，平整地面，砌筑梯田，作埂掘沟，排除积水，培养肥性，开辟道路，修建桥梁等许多事项。这些设施即是土地生产及支持人类生活的基本要素，没有这些设施，土地或者完全不能生产，或者只能很短暂而且微少的生产。所谓农地，乃是天然的土地加上这许多改良工作后的总称，兴都市的房产是地皮加上砖瓦泥木等的构成品的总称，其理相同。举几个特别显著的例子说：譬如长江及各大河流两岸防水的堤坝，如洞庭及各湖泽周围的圩堤，如江南罗网似的水道，如华北密布的水井，如四川及西南各省特多的梯田，如海边防潮的大坝，如南方遍地所见的池塘，诸如此类的人造成的成绩，都是与土地的生产力不能分离的，也可以说即是农业土地的一部分，

而且是较重要的一部分。农地的价值，主要的是在这些人工改良物上面，而不是在一些天然生成的碎石粉上面。所以在完全未经开发过的边远地方，土地几乎一文不值，而已经开发及改良的农业土地，则价值非常高贵。不多年前，察哈尔绥远诸省放荒招垦，每亩定价一角，而承购者寥寥，然而内地熟田则每亩至少值十元，超过数百倍之多，这超过的价值即是人工开发改良的结果。固然这些开发改良的成绩乃是累代无数人力所积留的，而不是现在的土地所有者所亲手做成的，但是他们曾经付出过相当的代价。城市的房屋也并非房主自己的劳力所造成，他们也不过是付出了代价。

过去一般经济学家不仅当土地是天然物，而且以为它有不可破坏性，现在的经济学家和科学家都知道那种学说是错误的。在一些农牧方法不良的国土，耕地和牧场被毁而放弃的，动辄以千百万亩计，所以才产生空前的水土保持及土壤保肥的伟大运动。中国的水旱灾之严重，和农业生产之低劣，其最基本及最主要的原因，乃是农业方法不良，致使土壤瘠薄，及江湖池塘溪流等淤塞之故，若再不纠正这种错误观念，仍当土地是天然物，不可毁坏，以为可以听其自然，毋须继续不断地维持改良，培养肥力，则充其极非使全国变成沙漠与泽国，并使整个民族灭亡不止。

乙、为何不能说一切地主都是封建性的？在乡下买田地，乃是一种比较守旧的，小规模地保存钱财的方法，大有钱的军阀官僚买办等并不喜欢多买田地，即使买一些，也仅仅是为安置他们的钱财的很小一部分。所以各大家族和豪门，并非以乡下的大地主著称。这些大富豪的财产，最大部分是放在城市或外国。在城市买一亩土地或一座房屋，要当在乡下买几百几千或几万亩田地。钱很多的人嫌在乡下买田地太烦琐，只有二三流的有钱人才喜欢在乡下买田地。至于乡下土生土长的地主富农，概是一些所谓土财主，他们绝对够不上封建的资格。他们中间虽不免有少数

土豪恶霸之类，然而究以驯良的人民占多数。他们大都是一些勤俭的，安分守己的分子，他们的财产多半是由辛苦经营和节省积蓄而来。虽然他们也放账（乡下间凡有积蓄的都放账，固不限于地主富农。特如雇农赚得的工资，农妇卖鸡蛋的存款，为数不多，不好做别的用途，便只好放账，而这些小额放账常常是利率最高的。）但若说他们起家，主要的是由于放高利贷剥削贫民，则殊不足信。因为贫民的身上根本榨不出很多油来，即使他们想借账，也不容易找到借主，即使借得到钱，也只能借到很少数目。乡下不怕出高利大宗借债的，多属一些染上嗜好的懒惰浪费的地主，他们有的是田地作抵押，也才有人肯放账。至于勤俭的农民，谁都知道高利贷的危险，决不肯轻易借债。凡是有能力有信用的人，如果遭了意外的损失，或有紧急的需要，常常是可以找到亲友帮忙挪借，并不一定要走高利贷的路子。所以即使说有一部分的地主或富农是由于放高利贷起家，然而他们所剥削也多半是一些堕落的地主，而不是勤苦的贫雇农。

让我举几个关于地主和富农的实例给你听，这些都是我所直接接触到的事实：

一个五十多岁的三轮车夫同我谈起他的家事，他原是贫农出身，三十年来用他的血汗钱陆续买进了共有一百廿多亩地，现在他的地都被分给当地的游惰分子了，自己分到的不满十亩，不愿在乡下种田，所以到城里来踏三轮车。他很感觉愤恨不平，他说出这样一句伤心话：“我们年年日日冒风雨暑热在地里做活的时候，那些人却在茶馆进酒馆出。他们游手好闲，吃穷用穷了，还说是被我们剥削了，要分我们的地。”

我家有一个老奶妈，做了二十多年的奶妈和佣工，随时将她的工资积蓄寄回家去，零零星星的共买了二十多亩地，连原先所有的合计有三十余亩。她以为辛苦半身，可以回家养老，但是她的地大部分都分给别人了。她只有一个丈夫在家，仅仅分得三亩，后来丈夫死了，家乡已经久无消息，她的地就算是完全没有了。她做二十多年苦工的积蓄，全部化为乌有，她的伤心和怨恨，是可以想象得到的。

我有一家不甚远的亲戚，弟兄三人，二十年前分了家，各分得田地七八十亩。老大是一个守

本分的老实人，在乡下务农兼做小买卖，生活极其俭朴，历年积下钱来，添买了五六十亩田地。老二嗜赌兼吃鸦片，分家后不多年已将田地卖光。老三早将全部田产卖去，将钱拿在城里做买卖，发了财，已经买了几处房产，并有不少的现款和货物。现在老大的田要分出去，老二可以分田进来，老三最有钱，但他的全部财产在城市，不致遭受损失。最坏的老二占便宜了，笑了，最勤俭的老大吃亏了，哭了。任何人也不能不为老大叫屈。

这些不过是随意举出的几个例子，类此的事例太多。实际上这些所代表的乃是普通一般的情形，而不是特殊的例外。中国自古就产生了“有恒产者有恒心”的哲学，历代政府都鼓励人民买地，称为落业，一般人又向以为土地是最安全的财产，以故安分守己的分子都欢喜把积蓄变成土地，从没有人把买田购地当作是有封建意味的，或有害他人的事体，也没有人把出租田地当为是一种封建剥削的行为。

在以前帝俄和许多欧洲的国家，土地大多为贵族所有，而且不能自由分割买卖，乃是由那些贵族大地主，像一个小国家一样，将它一代一代地传袭下去。地上的农民也没有迁徙或退佃的自由，而必须世代代在同一地主采邑之下奴役，除非随同土地被出卖给另一个贵族。那样的土地制度和地主，才可以说是封建性的。中国的情形迥乎不同，土地是可以自由分割及自由买卖的，租佃是自由的契约行为，地主也不是世袭的贵族，而是可以由任何平民阶级及任何贫苦人户出身的。这样的土地制度和地主是封建性的，实在太与事实不相符合。我曾经费过很长久的时间，并竭力排除任何可能存在于我脑子里的成见偏见，去仔细地考察思索，始终找不出中国的土地制度和一般的地主富农的封建性在什么地方。

除了这些关于是否封建性的基本理论而外，我还另有几点意见和事实，要提醒您：

一、新民主主义规定要联络小资产阶级；中国小资产阶级无疑的是以乡间的中小地主及富农为主要部分，除去了他们以外，殆无所谓小资产阶级。现在对于城市的大资产阶级尚没收其财产，反而对于小资产阶级的地主和富农要没收其土地及财产，这是把他们当作敌人，与新民主主义的宗旨完全违背。

二、大战以后，开国之初，最急之务莫如安定秩序，医治疮痍，使人民休养生息，不宜再有摇动人心之举。政府在这方面都是本此宗旨行事，而独在乡间，为推行土地改革政策，正在从事调查及组织工作，准备分掉地主富农的土地。这不啻磨刀霍霍对他们表示：“磨快了就要将你们开刀”，使得凡有土地者（在界线尚未确定之前，凡有土地者均不知其土地是否将被分掉）均惶惶不安。他们不但不能庆太平日子的到来，反而感觉还有大难在后头，这决不是开国时所应有的现象。

三、国家并未废除财产私有及土地私有制度，中共且屡次声明保护私有财产。土地是乡下人的最主要的财产，也是正当的财产，现在政府对于城市富人的一切动产与不动产，和工商业的生产工具都加保护，乃单独没收乡下的土地，而且没收分配之后，依旧准许私有及出租，这样无故夺去一部分无辜人民的财产给另一部分人，不惟不公道，而且与中共保护私有财产之声明不合。

四、新民主主义的土地政策，是以耕者有其田为范畴。平分土地的办法，则是无论自耕与非自耕，都一律平分，又不但自耕的田地也要分，而且分出去仍可以不必自耕。这种办法与耕者有其田的政策两端都不符合。

五、地主富农之所以成为地主富农，除少数特殊情形而外，大多是因为他们的能力较强，工作较勤，花费较省。虽有不少是由于其祖若父的积蓄，然而自身由贫农起家者亦很多。即使是由于其祖若父的积蓄，亦必须其自身健全，否则必然衰败。这即是说，地主富农多半是社会上的优秀分子，是促社会进步的动力，是国家所应保护和奖励的。但这绝不是说，贫农都是低劣的分子，因为在战祸绵亘，百业不振的情况之下，多数人都没有改善他们的境遇的机会。但是，无论哪一个贫农都没有不愿意成为地主或富农的，若说他们之所以没有成为地主或富农，乃是因为他们的道德特别高尚，不愿意剥削他人，则决不足信。国家当然应该帮助这些贫农去改善他们的境遇，但帮助他们的正当办法，是在和平恢复之后，努力发展生产建设，多创造就业的机会，使大家都有工作，能够赚到丰富的进款，而不是分给很少几亩土地，把他们羁縻在小块的土地上面，使他们继续留在农人已嫌太多的农村里面讨生活。他们耕种那样小的一块土地，终年

劳苦的结果除去了粮税及各项开支以后，根本还是不够维持最低的生活。

六、历来政府的税捐多是以地亩为主要根据，今后政府本可以利用土地所有多寡不同之现状，推行累进税率，将重税加在大富人身上，而减轻贫民的负担。若是将土地一律平均的细分了，则每一户有一小块土地的人家，都须平均负担国家的开支，不但他们会感觉繁苛，发生怨恨，同时政府收税的困难也会增加。

七、中国的耕地，本已分割过分零碎，于经营上颇多妨碍，再要人人平均细分，不问有无农事的经验和兴趣，亦不论经营能力的大小，都同样分给一定面积，必致减低经营的效率，减少农业生产。

八、有一些人说，土地改革之后，因农民生产情绪提高，结果使产量显著增加。我们对于这话不能毫无保留的接受。究竟这生产的增加，（除去天时等原因而外）有几分是由于共产党员的鼓励督促，有几分是由于农民因分到土地而激起的情绪，是不容易分判的。换句话说，假使没有土改，只要共产党员能同样的去督促号召，或许也可以得到同样的结果。还有不可不注意的，所谓情绪，只能是暂时的，久了就会降低，由于一时情绪提高的增产，是不能希望其支持长久的。在另一方面，这平分土地的办法，不论人的勤惰及能力的大小同样分给面积相等的土地，因而勤快的及能力强的，或许嫌不够做，懒惰的及能力弱的，或许还做不好。这种情形显然是不会使生产增加的。不特如此，待和平完全恢复之后，许多人都会嫌他们的土地太少，不够耕种，也不够维持生活，因而他们会纷纷出外做生意，或别谋职业。他们的田地不是出租，便只好留给不能外出的老弱妇女耕种。到那一天，农业生产更非减少不可。

九、横在分地政策的前面，还有一个很大的危机。分地是既定的政策，不过在新解放区暂缓实施，而先推行减租。即是说，土地是决定要分的，但是因为准备工作还没有做好，所以还要等待一些时间。究竟等多久，没有说明，不过大家都以为不久。因此无论是土地的所有者或耕种者，都在那里转念头了：现在我的地，转瞬就会变成别人的地了，今年是我所种的明年就许分给他人耕种了。那么，我何不趁早从地里面多拿回来一

点是一点,少花费一点是一点呢?管它池塘沟渠淤塞也罢,堤岸田埂崩垮也罢,何必去挖掘,何必去修补?田地随它瘦下去,何必费力气去下肥料,更何必花钱去买肥料?甚至于平时应留还土地的谷秆豆根之类,也通通割回来或扯回来作柴烧吧。这样下去一两年,土地会变坏到什么样子,生产会减到什么地步,是足够令人担忧的。还有地上的树木,如桑茶油桐乌柏,以及各种果树和杂木等等,它们的命运尤其危险。地快要分出了,地上值钱的东西还不赶紧搬走吗?在四川解放以前,我接到好几个朋友由四川来信,不约而同地问我:“地是不是真的要分,树木是不是趁早砍了的好?”另外我又曾经从几个其他地方的朋友得到消息,乡下许多人都在那里考虑砍树的问题,并且已经有很多树被砍掉了。有一些人还不肯相信土地真会被分掉,有一些以为地政策还有改变的可能,所以还在那里观望。但是时间稍久,大家看清了分地政策势在必行,就会不约而同地实行砍树。这些树木是民族的重要资产,需要多年的保蓄,一旦大批地摧毁了,再等重新栽培长大,要到何年何月?

最后,让我向您献议一个办法,请您考虑:

新民主主义不是还要更进一步转变为社会主义吗?耕者有其田的制度不是还要转进到土地社会化和农业集体化吗?那么,何必多此分地一举呢?现在像割肉似的将土地从地主和富农身上割下来,已经使他们很疼了,割下来分给贫民之后,不久又要从他们和大家身上再割下来,那恐怕困难更多了。何如现时不必分,待将来真要实行社会主义时,直接把土地连同他种生产工具一齐社会化呢?

假使您赞同我的意见,请您立即下令停止分地,并将土地政策提出修改,另行规定限地办法,逾额者限期出卖,或由国家给价征收,转卖与自耕种者,令其分年偿付地价。老解放区已经分配的土地,虽可不必交还原主,但亦应令分得土地者补缴地价,(不妨稍低廉)不愿者可以将土地退还。这样,不但土地被分去者万分感激,不会要求追算旧账,即是分得土地者亦没有抱怨的理由。本来谁也不会想把邻人的土地无代价夺归自己,现在补缴地价,确定所有权,他们也会感觉心安理得,释然于中。

我对于土地改革的问题,曾经用过不少的心思。我也曾经读过好多篇主张分地的文章,然而总觉得他们的理由牵强,持论偏歪,根据也不可靠。不见于文字的民间舆论,一般都认为这种办法不公,不合理。我相信我自己是没有成见偏见的,更不是因为个人的利害关系而寻找借口来反对土地改革。外间曾有人说我是一个什么“大地主”,那完全是瞎说。我既不敢当这个头衔,也不能受这个诬枉。我不瞒你,我办得有一个果园,有一百多亩瘠薄的山坡地,为整个国家的关系,我何在乎这一点小小的地皮,何况政府对果园及新式农场的土地早已宣布不分了呢。我之所以不惜屡次反复辩论,此次更不顾冒犯您的危险,乃是因为我感觉我对于这土地问题了解得比较深刻,比较正确;假使不将我的意见尽量发挥出来,我会永远感觉对不起自己的良心,对不起中国,对不起无辜被夺去土地的人民。我想您是爱好真理,并能服从真理的,当您发觉政策有错误之时,您一定是能勇于改正的。

董时进在他 1951 年在香港出版的一本书中讲到写这封信的缘由和经过:

“在北平的时候,我就想写一封信给中共当局,详详细细说明他的土改理论和土改办法的错误,劝他们修改。我认为共产党和城市社会的一般知识分子,对于这土地问题,都是成见和偏见太深,非说得透彻一些不能使他们明白。所以我费了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去思索整理,才完成了那一篇给毛泽东的长信。”

“这封信是一九四九年十二月间寄出去的。我将这封信印了几百份,同时寄发给中共的若干要员,各党派的领袖,和若干关心或研究此问题的朋友,及教育学术机关。刚好把致毛氏的一封信交邮之后,不记得是过一天或两天,报上就发表了他已抵莫斯科的消息。他这一去差不多就是两个月,耽搁了两个月回来,政务丛集。哪里还有工夫来理会我那一封早成明日黄花的旧函。”

“此信后段提到土地社会化问题,劝他不要没收人民的土地,等到以后真要实行社会主义时,再行社会化。很明显的,我并不是主张社会化的(实际我是反对社会化的),我的意思乃是要他先行停止目前的所谓土改政策,等待将来再说。”■

(责任编辑 杨继绳)

立陶宛的农业集体化

○ 蒋华志

本文根据有关材料,拟对1944~1950年立陶宛的农业集体化做一个简略的描述,通过立陶宛的农业集体化折射出整个苏联农业集体化的悲剧。

一、立陶宛农业集体化的背景

立陶宛农业集体化的动因与整个苏联农业集体化的动因颇有类似之处。

第一,最大限度地榨取农民,以获得工业化必需的粮食、原料和资金。国家利用对价格市场的垄断,扩大工农业产品的价格剪刀差,尽可能地榨取农民,这是农民为实现国家工业化必须缴纳的“贡税”。同整个苏联一样,立陶宛的发展重点在工业,工业需要的资金不能从别的地方取得,只有从农民身上获得。

第二,加强对立陶宛的政治控制。1940年,苏联占领了立陶宛,后被德国占领;1944年,在希特勒江河日下的情况下,苏联第二次占领了立陶宛。立陶宛人组织起抵抗运动——“森林兄弟”,反对苏联占领当局。最大的游击部队战斗在立陶宛的森林中。大约5万名战士包括一些妇女,联合起来组成“抵抗区”,控制了森林和边远地区相当部分领土。为了打破立陶宛人的反抗,苏联加强了对立陶宛的全面控制。而实现集体化就是苏联控制立陶宛的措施之一。通过集体化,剥夺农民的财产,让农民处于苏联国家的有效控制下,切断农民与立陶宛游击队的联系。

第三,增加农业产量、将农业置于国家控制之下、将土地和农业财产从所谓的“富农”手中转到农民集体组织。

第四,为工业发展提供廉价的劳动力。工业是苏联政府的重中之重,所以,一切都要为工业让路。苏联是一个人口相对稀少的国家,所以为工业获得劳动力成为一个紧迫的任务。按照最初

的设想,提高了农业生产率,对农业劳动力的需求自然减少,这就为工业发展提供了合适的劳动力。

二、立陶宛农业集体化的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最初的温和阶段(1944~1946年底)

1944年7月13日,苏联红军占领了立陶宛首都维尔纽斯。到1944年秋,立陶宛的大部分已经处于苏联统治之下。苏联指望立陶宛通过提供兵员、粮食及交通为战争作出贡献。虽然对遍布农村搜寻新兵员加入红军的保安部队未作限制,但苏联政府采取了温和的政策以刺激农业为军队及城市工人提供粮食。农业改革的步子比1940~1941年缓慢些。对粮食和其他农产品的强制征收量是很大的,苏联当局要求按时、按量完成。对土地及其他农场收入来源的税收虽然相当高,但还是可以容忍的。没有发动大规模的所谓没收富农财产的运动。要求加入集体农庄的高压政策容易受到抵制。国家对个体农民的贷款容易得到。土改在继续。虽然到1946年底苏联政府仍拥有较多的被剥夺的土地,但个体农民得到了被剥夺的土地的50%。农民可以在当地市场上出售自己的产品。农业生产逐渐上升。

土改、粮食和其他农产品的征收成了头等大事。1944年9月30日,立陶宛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最高苏维埃通过了一项《关于肃清德国占领对农业的影响》的法律。为了达到重新进行1940~1941年土改的目的,该法律命令说,属于德国殖民者的土地或人民敌人的土地,或者超过了规定的最高限额的土地,均应该充公并交给急需土地的个人或国家机构。这一改革很快得到实施。到1945年1月1日,土地储备达到54万公顷(超过农田总面积的1/9)。到1945年8月1



立陶宛首都维尔纽斯

总播种面积、谷物及马铃薯每公顷产量、饲料及技术作物的生产达到了战前水平的 80%~90%。1947 年的情况还要好得多。因为补充大批死亡的家畜需要时间，所以畜牧业的恢复缓慢些。因此，牛奶及肉类产量仍然不到 1939 年的 50%。

第二阶段：运用高压阶段（1947~1948 年）

到 1946 年底，政策开始变化。在理论上，政府依旧表示要支持贫农和中农。在实际上，政府实行了使私营农业更加困难

日，被充公的土地达到 196.5 万公顷。

土改的重要内容是没收土地，分给个人。土地的来源大致有四种：第一，“人民公敌”的土地，占 31.8%；第二，难民的土地，占 27.4%；第三，30~30 公顷以上农场的土地，占 31.2%；第四，其他来源的土地，占 9.6%。

起初，苏联当局为了笼络人心，把被没收的土地中的相当部分分给了农民。

为了保证粮食供应，苏联当局不仅要求农民交税，而且也要强制交售粮食。强制交售粮食相当于以实物形式征税。因为，与当地市场价格相比，强制交售粮食的价格是极其低廉的。尽管税收及强制征收量很高，但这种负担并不重。实际上，比 1940~1941 年的征收量少得多，对经济较为富裕的人的压迫也不太重。

税率并没有阻碍经济的恢复。殷实的农民通过在当地市场上出售剩余物而处于抵消较为沉重的税收负担的有利地位。因为当地市场价格高。1945 年，在维尔纽斯，1 公斤小麦或牛肉可以卖到 40 卢布。因此，出售 80 公斤就可以交付 25 公顷农场所应交的税。虽然维尔纽斯的市场价格是个例外，但即使绝大多数农民在当地市场上获得的较低价格对生产也是一种刺激。

粮食市场的存在、反富农的低调宣传、对富裕收入征收的适当的附加税、土改的温和步伐以及不强迫加快集体化的步伐的决定减少了人们对前景的忧虑。农业生产稳步上升。到 1946 年底，战争所造成的最严重的影响已经被消除了。

的政策。被没收的土地的较少部分分给了个体所有者，中农得到的帮助较少了，对富农的敌视更严重了，富农承担的附加税是他们所交税款及交售限额的两倍。这些变化没有立刻影响农业生产。虽然 1947 年谷物总收获量及每公顷产量都接近战前水平，但是农民的信心已经动摇。因此，立陶宛的农业开始滑坡，这就导致了 20 世纪 50 年代初立陶宛农业的崩溃。情况在 1948 年开始恶化。成千上万的农村居民被驱逐了。对富农农场的税收被充公。政府要求加入集体农庄的高压政策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从苏联统治的最初时候起，苏联政府对贫农及中农的支持成了党的宣传的主题。关于德国影响的法令强调建立 10~15 公顷地产的必要性。在 1945 年的立陶宛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上，苏斯洛夫极力主张土地应分给已经占有土地 13 公顷的农民。为了宣传的需要而做出的声明并没有指导实际政策，至少在 1946 年以后是这样。因为，这以后政府的土改政策发生了急剧变化。直到 1946 年底，约 50% 的可耕地分给了个体农户。尽管由于逮捕、驱逐以及一定程度的遣返及农场的荒废而使土地储备经常可以得到补充，但是，分配给农民的土地越来越少。1947 年 2 月~1948 年 3 月，被没收的土地为 10.04 万公顷，而分给农民的土地只有 2.07 万公顷，只占 20.6%；而从 1948 年 3 月~1948 年 11 月，尽管被没收的土地为 21.38 万公顷，但是分给农民的土地只有 2.91 万公顷，只占 13.6%。

土改最显著的结果是贫农数量的大大增加和富农数量的大大减少。在 1930 年和 1948 年,不到 5 公顷和 5~10 公顷的农场比例由 49.5% 上升到 67.7%。同期,10~20 公顷、20~30 公顷、30 公顷以上的农场的比例由 50.5% 下降到 32.3%。

整个 1947 年,虽然赞成集体化的宣传紧锣密鼓,但是,其结果令人沮丧。1947 年底,只建成了 20 个集体农庄,合并的农场土地不到 300 块。政府决定:需要采取更为严厉的措施和发动一场猛烈的反富农运动(这场反富农运动完全效法了苏联在战前那些年对富农的所作所为)。

对富农之战正式开始于 1947 年 12 月 12 日。当时,立陶宛中央委员会及立陶宛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内阁通过了一项决议,确定了把农场划分为富农农场的条文。政府也通过立法,增加了对富农的税收,无论是投资于固定资产的农民,还是雇佣一个男子耕田的寡妇均不免被划入富农之列。同时,条文保证了从前殷实的农民受到不久就强加到他们头上的各种惩罚。1948 年 7 月 1 日,富农农场平均有耕地 16 公顷,马 2 匹,奶牛 2 头,猪 3.5 头。随着压制程度的增长,甚至这难以理解的定义也越来越少地使用,因为“个人选择”的原则变得重要了。只有赤贫者可以摆脱富农的名声,但他们的命运未必与富农有什么不同。因为他们可能被当做富农的走狗而受到惩罚。镇压的增加和新的富农的发现同步进行。1949~1951 年有 1.1 万多名农民被赶出了集体农庄。尽管 1947 年首次由官方编辑的富农登记册仅列有 9135 个富农农场。最终有 3 万多家家庭被当成富农而受到了惩罚。

政府对富农使用了强大的经济压力,胁迫富农放弃他们的土地。对富农农场的征税远远高于非富农农场。征税是按照农场规模进行的。1947 年,以应税收入为 1.5 万卢布的农场为例,非富农农场交税 975 卢布,而富农农场交税 1663 卢布,后者是前者的 1.7 倍;而到了 1948 年,这两个数字分别为 1535 卢布和 7975 卢布,后者是前者的 5.2 倍。1948 年,应税收入为 2.2 万卢布的农场非富农农场交税 4075 卢布,而富农农场交税 18425 卢布,后者是前者的 4.5 倍。

1948 年 5 月 22 日,成千上万的农民及其家

人被驱逐。这些驱逐既不是第一次,也非最后一次。别的驱逐已经发生在 1945 年 9 月、1946 年 2 月 18 日以及 1947 年 12 月 17 日。而更多的驱逐发生在 1949 年 3 月 24~27 日及 6 月 27~28 日。这种情况 1950 年 3 月也发生过。但是,1948 年 5 月 22 日的驱逐是范围最广的。

驱逐未能达到农业集体化的目的。1948 年 7 月 1 日,仅有 1.4% 的农场实现了集体化。政府继续煽动阶级仇恨,反富农的宣传运动在 1948 年 12 月的集体农庄庄员大会上达到了顶点。立陶宛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斯涅奇库斯主张不应该让富农成为集体农庄庄员。他把富农比作可以蜕皮但决不会丢掉毒牙的蛇。他说:集体农场的工作之所以失败,最大可能是富农及其朋友的破坏活动所致。一些代表要求采取最严厉的措施,他们主张通过一个决议,要求不仅要驱逐富农,而且也要驱逐所有拒绝加入集体农庄的人。

第三阶段:强迫集体化阶段(1949~1950 年)

立陶宛农民顽强地抵制农业集体化。尽管受到了巨大的压力,但是集体化的成果令人沮丧。到 1948 年 1 月 1 日,只建立了 20 个集体农庄,实现集体化的农场只有 296 个,只占农场总数的 0.8%。到 1948 年 7 月 1 日,只建立了 227 个集体农庄,实现集体化的农场只有 3554 个,只占农场总数的 1.4%。而到 1949 年 1 月 1 日,也只建立了 614 个集体农庄,实现集体化的农场也只有 15160 个,也只占农场总数的 3.9%。

对于上述情况,莫斯科当然无法容忍。因此,到 1948 年底,莫斯科已经决定强迫加快集体化的步伐,并特地安排了一个人为的运动,以造成当局正对来自下面的压力作出反应的假象。

参加 1948 年 12 月立陶宛第一届集体农庄庄员大会的代表要求驱逐富农。

1949 年 2 月,立陶宛共产党第六次代表大会强调尽快实现立陶宛的农业集体化的必要性。3 月底,在三个波罗的海共和国发生了大规模的驱逐。预期的目的达到了,1949 年一年差不多 58% 的农场实现了集体化。到 1950 年 12 月 1 日,89% 的农场实现了集体化。

在 1949 年 3 月的驱逐中,来自城市的鼓动家和积极分子受到内务部和军事小分队的保护。

他们带着建立集体农庄的计划突然来到各乡村。建立集体农庄的计划十分详细。这些计划预定了谁将被任命为主席、司库,甚至生产队领导人也被任命好了。村民们被召集起来开会,并被留下来,直到他们写出参加集体农庄的保证为止。桀骜不驯的农民会受到哄骗、吓唬和威胁,几天不许回家。如果需要的话,还会采取更严厉的措施。官员们没收农具、家畜及其他有价值的东西。而顽固不化的人会受到短期监禁。

在村子里建立了集体农庄以后,对私人农场的压力并没有缓和。集体化通常伴随着土地的重新分配。那些没有加入集体农庄的人们的土地被分配在远离其家 10~12 公里的地方。在某些情况下,不允许他们收割田里的庄稼、干草和三叶草。另一些人被告知:他们仅能得到 0.15 公顷的土地而不是先前曾经被分配的 0.6 公顷的私营土地。不太走运的人们认识到:政府已经把他们的土地交给了集体农庄。最后,甚至最执拗的农民这次也认识到:与别的时候不同,政府的高压不会停止,自己应该加入集体农庄而同时还可以拥有自己的家畜与存货。

集体农场拥有的全部牛的 47.1%、全部猪的 46.4%和羊的 54.4%都是从富农那里没收来的。那些被驱逐的人不得不留下他们的财产。

建立机器拖拉机站是立陶宛集体化的重要内容。一方面,机器拖拉机站是为集体农庄提供机械服务的机构。因为,按照苏联政府的设想,要以现代技术武装农业,提高农业生产率。另一方面,也是更为重要的,机器拖拉机站是国家对集体农庄进行政治和经济控制的权力机关。在机器拖拉机站都设有政治部。

但是,立陶宛机器拖拉机站的发展情况也令人沮丧。

机器拖拉机站效率低下,通常不能履行合约。1947 年,机器拖拉机站完成了私营部门计划的 117%。那一年(1947 年)春耕计划仅仅完成了 53%,秋耕计划只完成了 59%,休耕犁田计划完成了 78%。整体的结果似乎给人深刻印象。但这只是因为“别的工作”计划,例如运送货物,完成了 255%。

吸引农民加入农业合作社也没有达到预期的目标。党相信通过让个人认识共同劳动的好

处、提高生产率、提高生活水平,合作社运动将加速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但农民并不买账。1940 年至 1941 年期间,消费合作社有 35 万人,这是独立的立陶宛合作社运动的遗产。而在 1945~1948 年,消费合作社只吸引了上述数目一半的成员。1945 年 5 月,立陶宛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人民委员会通过一项决议,鼓励建立这些萌芽状态的集体农庄。但在 1946 年 1 月 1 日,立陶宛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抱怨说,连这样萌芽状态的集体农庄一个也没有建立起来。1947 年,属于这些生产合作社的农场不到 1.2 万个,虽然真正需要他们的服务,因为大约有 9.4 万个农场没有一匹马和需要租用役畜犁田和举债来获得种粮。1947 年 3 月立陶宛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过决议敦促大规模加入生产合作社。到 1949 年初,它们将包含立陶宛所有农场有的 61%。

但是,无论是胡萝卜还是大棒,都没有消除农民的恐惧,即这种合作社只不过是建立集体农庄的第一步。1949 年初,只有 13%的农场加入了生产合作社。而当局并没有掩饰他们对这种缓慢步伐的失望。新的鼓励加入合作社的计划正在制订的时候,突然开始了强迫集体化的决定。大多数的农业合作社变成了集体农庄。

三、立陶宛农业集体化的后果

立陶宛农业集体化是一个悲剧性的历史事件。

农业集体化的实质是国家通过暴力对农民的残酷剥削和压榨,这是一场苏联国家对农民的真正战争。在这场战争中,农民是最大的受害者。农民不仅失去了财产和自由,一部分人还失去了宝贵的生命。

立陶宛的农业集体化是苏联政府无情地剥夺农民的过程。立陶宛农民被苏联政府剥夺得一无二净,农民被迫在集体农庄里劳作。他们的劳动成果绝大部分被苏联政府夺走。历史是很有讽刺意味的。沙皇解放了农奴,而苏联政府又把农民再次变成了农奴。所以,立陶宛农业集体化的过程,就是立陶宛农民农奴化的过程。

另一方面,立陶宛农业集体化的过程,也是

立陶宛农民变成苏联国家工业奴隶的过程。被剥夺了一切生产资料和生活来源的立陶宛农民,被安置在条件恶劣的流放地,从事极其繁重的劳动,而他们得到的是十分可怜的回报,他们连最基本的人类生存条件都得不到。他们的劳动成果被苏联政府无情地剥夺而去,用于出口以换取资金、技术。他们成了真正的苏联国家的奴隶。

立陶宛的农业集体化的后果是灾难性的。

第一,生产力的大破坏。立陶宛农业集体化的目的原本是要提高农业生产力,但是,由于农业集体化,粮食生产灾难性地下降了。1947年,粮食产量为每公顷11.7英担,而1953年每公顷仅为4.3英担,几乎下降了2/3。给集体农庄庄员的报酬低得可怜。1952年,2935个集体农庄中只有1439个设法以某种货币支付的形式给其农庄员工作日以报酬。那一年(1952年),集体农民收入只有19.2%是在社会主义部门劳动挣得的。1954年的情况也不更好些。当时年均收入的75.2%来自私营土地。立陶宛科学院所编的权威著作简要地提到:直到1958年,来自社会主义部门的收入“实际上不够集体农庄家庭的最低限度的需要”。事实上,“如果没有自留地的话,集体农民不可能活下去”。

畜牧业也遭受了重创。牛、奶牛、猪、绵羊和马在1951年比1939年分别下降了43.3%、40.6%、32.3%、38.1%和30.2%。直到1962年,只有牛和猪的数量超过1939年的水平,而奶牛和绵羊数量依然低于1939年的水平。

第二,生命的大量毁灭。对那些不愿意将自己的财产交给集体农庄的人,苏联政府给予了无情的镇压和打击。监禁、驱逐、流放、处决、瘟疫、超强度的奴隶般的劳动,使立陶宛人大量死亡。特别是妇女、老人和儿童的死亡率更是高得惊人。到底有多少人死于立陶宛集体化过程中,很难有非常准确的数字。但是,大致情况是明确的。

立陶宛总统瓦尔达斯·阿达姆库斯曾经指出:35万多人,即立陶宛人口的1/10被监禁、被驱逐到古拉格或者在立陶宛被屠杀。当人类历史上最残酷的战争正式结束后,这样的罪行还在继续。立陶宛的名字从欧洲地图上消失达50年之久。或许在立陶宛找不到一个家庭逃过了损失和恐怖。

在立陶宛,根据某些估计,1944~1951年间,红色恐怖导致20万~35万男性和女性(整个人口的12%)被监禁、驱逐或死亡。

33万多立陶宛公民成为苏联统治的牺牲品。2.15万游击队员被杀,3.5万人死于集中营,2.8万被驱逐者死于恶劣的生存条件,军事机关及克格勃处死了大约5000人。

1947年末,大约有7万人被驱逐;1948年5月,7万人被驱逐;1949年,大约8万人被驱逐。

第三,民主法制荡然无存。立陶宛农业集体化的过程,就是充满哄骗、胁迫和暴力的过程。这是苏联赤裸裸地对立陶宛人民的迫害。

第四,政治上的离心倾向增长。本来立陶宛就是两度被苏联征服的地区。如果苏联政府采取一些怀柔的措施,立陶宛人的怨恨与愤怒必定会少一些。然而,苏联政府并没有这样做。相反,苏联政府长期地、公开地对立陶宛人使用暴力。这就更加刺激了他们的民族情绪。所以,一旦时机来临,立陶宛人对苏联政府的离心倾向必定会表现出来。当20世纪50年代“波匈事件”后,立陶宛人的反苏情绪一度高涨。1956年11月2日到3日的夜间,在立陶宛考纳斯市无名士兵烈士墓地发生了大规模的城市居民反对苏维埃的活动。参加者包括老年人,年青人,特别是这个城市高等学校的一些学生。他们高喊反苏口号:“匈牙利共和国万岁,我们应该以匈牙利为榜样”,“立陶宛人!立陶宛是属于立陶宛人的,俄罗斯侵略者,赶快滚出去”。到了20世纪80年代末,包括立陶宛在内的波罗的海三国首先举起了独立的旗帜,动摇了苏联帝国,成为苏联解体的先导。

直到二战结束后60年,立陶宛人对苏联曾经给他们造成的伤害还耿耿于怀。2005年,立陶宛总统瓦尔达斯·阿达姆库斯拒绝了俄罗斯总统普京邀请其参加纪念“胜利日”60周年的活动。

第五,人民生活困苦不堪。

1956年立陶宛工人的月平均工资是706卢布,也就是低于苏联工人月平均工资的10%。农民生活更加困苦。■

(蒋华志,副教授。主要研究中苏关系史、中国近代史、政治学。)

(责任编辑 杨继绳)

读者来信摘登

《炎黄春秋》到了大户陈家村

山东省招远市金岭区大户陈家村是革命老区。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涌现过不少英模人物。曾任华野9纵81团1营代理教导员的陈挺,就是这个村的知名人物。淮海战役中,在一营4个营级干部都牺牲或负重伤的情况下,他带领全营歼灭了国民党新5军的137团。战后,一营荣立了一等功。后来,陈挺被调到解放军总政治部工作。然而,在上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陈挺两次被遣回村里监督劳动。老乡们都不知他犯了什么事。今年春节后,在大户陈家村当过教员的陈和裕,接到他订阅的《炎黄春秋》,看到今年第2期上《1955年肃反扩大化的教训》一文中有这样一段话:“当年解放军总政治部组织部副团职少校陈挺,只因对肃反中的问题提出实事求是的批评,那时他就提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应从运动的实践和运动的效果去考察’。结果在1957年‘反右’运动中被作为主要罪状打成右派分子,撤职降级,剥夺军衔,开除党籍和军籍。”陈和裕看到这篇文章后,兴奋地在村民中奔走相告,并特地告诉曾在银行工作的陈挺的侄子陈守堂。陈守堂一家都非常兴奋,马上打电话给在青岛的陈挺,高兴地说:“叔叔,您过去犯的什么事,怎么平的反,俺都不清楚,这篇文章为您彻底平反了。”

(文扬)

编辑部:读了贵刊2010年第10期《恐怖的“红八月”》和11期《道县“文革”杀人遗留问题处理经过》后,使我回想起那段不堪回首的往事,我们一家未被赶尽杀绝并于1978年后得以平反获得新生,真乃不幸中之万幸。

1966年8月28日,一伙“红卫兵”十几人以“破四旧”为名到我家抄家,翻箱倒柜,搅得鸡犬不宁。因我家和我姥姥家都是书香门第,存放了一些老书,我父母任教多年,教科书、课本、工具书,以及我和我哥读过的书,备课本、作业本、杂志、照片、日记、家谱等通通被弄去付之一炬。

我父母都是建国前日寇投降后那段时间参军或参加教育工作的,1957年初划成“右派”。就在抄家的当天晚上,一伙人来我家强行把饭碗夺下,把我哥和我父亲绑架到村办公室前的广场上进行批斗毒打,1966年8月30日我父竟被活活打死,时年49岁。就在他遭到人身侮辱批斗毒打时,仍然高呼“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这大概就是那个时代的特色吧。东光县找王中学(注:校名)教师李鸿基1967年8月被学生打死,时年才39岁。事后我们多次上访无果,每次上访都会进一步遭到迫害。十一届

三中全会后我母亲得到复职,1983年办了离休;我父亲1979年得到平反。我要告诫年青一代一定要居安思危,警钟长鸣,不要忘记新中国历史上那段最黑暗的日子,珍惜现在的和谐太平时代,防止“文革”悲剧重演。

阜城读者 孙英平

2011年第1期第40页杨继绳文章中说的“陕西陇南事件”应为“甘肃陇南事件”,陇南是甘肃的一个地级市。37页倒数第4行最后一字似应为“工”,而不是“权”。2011年第1期所刊登的《“瞿秋白冤案”的起源与平反》一文中P21右上角的“中国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中国文联副主席周扬”这句话中的“中国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应该是“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

《炎黄春秋》2011年1期,《潘复生晚年一席谈》67页“相关背景资料”第一、二行:“以吴芝圃为第一书记的河南省委把潘复生、杨珏、王庭栋当做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大加批判,”

实际情况是,吴芝圃1949年5月起一直担任河南省政府主席、省长,1952年11月任中共河南省委第二书记。潘复生1952年11月任中共河南省委第一书记。1958年7月,省长吴芝圃在“大跃进”开始后以“反右倾”为名,斗倒了当时的省委第一书记潘复生。1958年8月,吴芝圃当了省委第一书记,成为第一把手。

江西读者 黄蜀井

贵刊今年第1期贾巨川的《习仲勋冤案始末》,在第9页末尾中说到:1965年,将彭德怀、习仲勋专案组合并,在西北局成立调查组,由西北局一位副书记任组长。我觉得这里有点小错误。

西北局并没有副书记这个职务,西北局的书记们都称为第一书记(刘澜涛)、第二书记(先张德生,后胡耀邦),再就是书记处书记、书记处候补书记。

读者 李建

《炎黄春秋》已成为国内最权威的刊物,十分令人欣喜,特向你们致以万分谢意。今年第1期第22页右栏(二)上第三行提到的“陶成章、杨哲、沈由智”三烈士墓,其中的杨哲系杨哲商之误,少了一个“商”字,杨原系我的丈公,他的夫人是我祖父的姐妹。

沈启伦

更正

2011年第3期第35页右栏倒数第5行“成为工农兵……”此处有误,应为“成为叛徒、特务、走资派……”;2011年第3期第62页右栏第三自然段原文“其中,私人住宅5384户,房屋3025所、24321间。”应为“私产被接管需要处理的5384户,房屋3025所,计24321间。”



全国免长话费咨询
400-668-0650

愿人人都有作品传世

北京天禾佳诚国际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是国内一家从事图书合作出版的文化公司，公司成立以来与多家出版社建立了密切业务关系。

业务范围：

- 个人出书：诗歌、散文、小说、生平专记、学术著作等。
- 老人出书：回忆录、自传、诗词、散文、思想理论著作、书画图册等。
- 家庭出书：家庭照片画册、家史档案、家谱族谱、先辈遗文、家族音像等。
- 学生出书：优秀作文集、书画作品集、学生纪念集、孩子成长图册等。
- 学校出书：教学经验谈、教研论文集、名师纪念集、名校成就图册等。
- 博客出书：个人博客作品集、网络专题作品合集、社区网文合集等。
- 旧书翻印：旧书急用少量翻印、书刊资料整编重印等。
- 电子音像：音乐、戏曲、录像摄影、光盘复制、磁带复制等。

另有：合作出书 常规出书 宣传推广 合作教材 录入排版设计 著作署名/挂名/编著

出书类型：

- A类：国内出版社出版，国家标准书号，可在中国新闻出版总署备案查询。可在国内主渠道（新华书店等）发行销售。
- B类：无书号出版，用于交流与赠送，不进入书刊发行渠道，数量一般在300册以内。

基本价格：

- 大32开本：封面用250克铜版纸，赠送勒口，内文用70克蒙肯纸或胶板纸。200页出版100本三千元，300页出版100本四千元；排版、设计与增加彩页费用另行计算。
- 16开本：封面用250克铜版纸，赠送勒口，内文用70克蒙肯纸或胶板纸。200页出版100本4千元，300页出版100本五千元；排版、设计与增加彩页费用另行计算。

（注：A类型出版的书，1000册起印；所有书籍无论开本印量越大越便宜。）

服务流程：

作者来说明书稿详情（如需要公司寄送参考样书）→公司报价→签约支付定金→电脑录入编排校对→报送出版社（如需正规出版）→出版社三审三校（如需正规出版）→邮寄样书→作者终审签字付款→回邮样书→印刷送书（附赠成书光盘）。

欢迎“组稿代理”与“项目合作”

目前，中国中产阶级不断发展壮大，传统文化精神逐步回归，民间文化、家族文化的搜集、整理与出版渐成热点：本公司大力开拓民间文化、家族文化的网络数字传播与纸质书出版业务。尤其自（学生出版网）（老人出版网）（人人出版网）（出版发行网）开办以来，深受离退休老人与各地文联、作协、民间作者、学校老师和家长的欢迎，每月编辑合作出版作品近百部；为方便作者就近洽谈与交稿，我公司设立“地方组稿代理”与“编辑出版分站”，请有写作经验与组稿能力的单位或个人洽谈合作。

出版服务热线：010-58608407 82057551 58608409

传 真：010-58608409 投稿邮箱：5805191@163.com

登陆网址：（老人出版网）www.lrchuban.com（学校出版网）www.xxchuban.com

（人人出版网）www.rrchuban.com（出版发行网）www.chubanifaxing.com

公司名称：北京天禾佳诚国际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邮编：102218

联系地址：北京市朝阳区立汤路188号北方明珠大厦三号楼1509室

作品展示



老人出书, 历史见证 ; 家族出书, 文化传承!

家史·家谱·传记

专业书店开业! 本月出书优惠!!

出书范围

- 1、个人文集: 诗文、小说、杂文、随笔等单集或合集。
- 2、回忆自传: 革命、受难、创业、怀旧等回忆录、自传。
- 3、先辈遗文: 先辈遗文集、先烈纪念集、家族先贤传、家史档案。
- 4、家史传记: 家族百年史、家族大事记、家族老照片、家谱族谱等。

服务流程

作者来电说明打算→编辑部寄发参考样书→作者寄送稿件图片→公司核算成本价格→协商签约支付定金→电脑录入编排校对→寄送大样作者初审→专业编辑审改→协商设计封面插页→排版设计制作样书→作者终审签字付款→出版印刷送书。

基本价格

“个人文集、回忆录、自传”一般32开本, “家史传记、家谱族谱”一般16开本, 封面与照片铜版纸彩印, 内文黑白胶印, 胶装或线装; 二百页出版50本三千元起, 设计、排版与加印彩页费用另行计算。

相关说明

所出书一般没有书号, 只用于交流与赠送; 如需国内出版社出版, 办理国家标准书号的另行协商。

开业优惠: 本月来书店咨询赠送样书、出书签约优惠10%!

服务电话: 010-68920114 68920399

单 位: 北京时代弄潮文化发展公司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图书城25号 (家史·家谱·传记书店)

登陆网址: 《个人出书网》(www.grcsw.com) 《家族出书网》(www.jzcsw.net)



炎黄春秋

1.

高瑜：新大社怎样破坏党内民主
对现代中国的不利影响及其后果
公安工作“大跃进”
共产党与工人阶级的三次分离
胡耀邦是怎样被解职的

炎黄春秋

2.

田纪云：追忆关于改革的四点建议
历史机遇是走向正途的第一步
改革重点：建立现代新闻制度
我一生中难忘的时刻
胡耀邦的文笔与政治理想

炎黄春秋

3.

“国进民退”的隐忧和根源
胡耀邦和我谈下台后
个人主义与公民社会
中国历史上知识分子的地位
车路博克访华记

炎黄春秋

4.

对历史的一次民主大评议
李锐：向胡耀邦老人学习
胡耀邦与邓小平的较量
中国改革进程的回顾
从改革开放到当代中国

炎黄春秋

5.

文件宣读：在报刊上展开批评
科学家与农民究竟“谁是”
何方：全球化的几个问题
世博会与奥运会的争办权
李锐：国家领导人的政治教育

炎黄春秋

6.

朱厚泽：当代中国新闻制度
田纪云：我认识的几个问题
“胡耀邦”也曾在胡耀
李锐：胡耀邦与邓小平的较量
李锐与邓小平的较量

炎黄春秋 杂志

2011年 再度扩版

独立 权威 真实 厚重

全年 96元

邮发代号：82-507

订购热线：010-68532048 68539058

全国邮局网点均可订阅 也可以通过邮局或银行直接向本刊订阅邮购

炎黄春秋

7.

“以党治国”的困境
从“胡耀邦”到“胡耀邦”
罗隆基和他的政治理想
中国政治的“王”与“马”
胡耀邦与邓小平的较量

炎黄春秋

8.

杜光：西部的目标模式
王飞：李锐与毛泽东的较量
“一厘米主义”与胡耀邦的生死
曾彦朴：我认识的胡耀邦
1959-1960年胡耀邦的日记

炎黄春秋

9.

胡耀邦的全面改革主张
中共与安土“反党集团”的较量
胡耀邦与邓小平的较量
李锐：王元化与胡耀邦
“胡耀邦”的由来

炎黄春秋

10.

胡耀邦：我们从哪里来 到哪里去
总编的“王八”
李锐：王元化与胡耀邦
田纪云：胡耀邦的“王八”
我们为什么会如此

炎黄春秋

11.

中国改革的路径及其走向
王元化：胡耀邦的政治理想
胡耀邦与邓小平的较量
田纪云：胡耀邦的“王八”
我们为什么会如此

炎黄春秋

12.

公民权利与人大代表选举权
李锐：胡耀邦与邓小平的较量
李锐：“王八”
李锐：胡耀邦与邓小平的较量
我们为什么会如此

《炎黄春秋》杂志十年精选本 (共二辑) 隆重推出

《炎黄春秋》被誉为“中国当代历史第一刊”，在国内读者群中有着广泛的影响

十年精选本是2000年—2009年10年“亲历记”专栏所刊文章的精编集

著名历史学者吴思主编，为你揭秘鲜为人知、触目惊心的中国当代史

精选本分为两辑：《走向1949》和《1978纪事》，时间跨度从抗日战争之初到改革开放前后，所记录的内容偏重平凡人的视角，但也有对重大人物的审视；既反映出了当时普通人的家庭生活，也展现了许多关键的历史事件；不仅有原汁原味的纪实成分，更有还原历史的解密文字。



文章都是当事人自己亲历的活生生的历史，其中包括我在延安被“抢救”、随毛泽东进京赶考的日子、不能忘记本原的开国大典、我看守被监护的彭德怀、毛家湾服务员披露林彪家庭生活内幕、宋庆龄到底是不是共产党员、胡耀邦向我们三鞠躬等许多著名篇章。

《亲历记：走向1949》定价29元 邮费6元
《亲历记：1978纪事》定价29元 邮费6元

炎黄春秋杂志社发行部
邮购地址 北京西城区月坛南街69号 邮编 100045
咨询电话 010-68532048 68539058

评地方政府的公司化倾向

亲历“《解放日报》事件”

我国高校发展的三个问题

娄烦土改及纠偏

对主粮转基因的忧虑

董时进致信毛泽东谈土改

ISSN 1003-1170



国内统一刊号：CN11-2817/K

国内邮发代号：82-507

定价：8.00元